

**主 管**

中共中央党校

**主 办**

中共中央党校图书馆

中共中央党校函授学院

**总编辑 / 社长** 陈高桐

**常务副总编辑** 周 慧

**副总编辑** 张 莹

**副社长** 武志国

**编辑部主任** 史小平

**本期责编** 李 虹

**封面设计** 关小雷

**设计制作** 崔金杰

**责任校对** 苏彰秦

**封面题字** 权希军

**编辑出版** 《党政干部参考》杂志社

**杂志社地址** 北京市海淀区大有庄100号

中共中央党校综合楼

**邮编** 100091

**电话** (010) 62805451

**传真** (010) 62808900

**E-mail** dzgbwz@sina.com

**国内统一刊号** CN11-5922/C

**国内发行** 北京市报刊发行局

**邮发代号** 2-490

**广告经营许可证** 京海工商广字第0301号

**印刷** 北京市凯鑫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零售价** 6.00元

**协办单位** 中国国际工程咨询公司  
山西国际能源集团有限公司

**要论**

3 习近平：为“十二五”开好局提供坚强组织保证

**学习与研究**

4 未来五年，中国如何从容应对挑战 / 张晓晶

6 正确处理新时期人民内部矛盾 / 邢贲思

8 现阶段社会矛盾呈现四大特征

9 人民内部不同群体的利益矛盾及其协调

/ 刘昫献

11 论中国的海外利益 / 刘新华

**高层言论**

13 薄熙来：给人民群众办好事，得有本领

13 徐守盛：严审批、控规模、不攀比“约法三章”  
精简节会

14 王正伟：查处腐败要真严 用正规则遏制“潜规则”

14 孙春兰：绝不能做违背民意劳民伤财的事

**经济纵横**

15 通胀逻辑的中国答案

18 CPI 分层编制更加符合国情 / 马涛

**共同关注**

19 谁在“挥霍”珍贵的土地？

21 中国能源可持续发展的一些战略思考 / 杜祥琬

23 1.2个地球才能维系中国式生存

25 增温6℃是人类存亡的临界点

26 国际碳交易怎么结算？ / 韦起

**民生看点**

28 落实体面劳动是实现包容性增长的关键

/ 秦建国

- 29 实现体面劳动存在的问题 / 许振华 赵秀莹  
30 劳动者报酬偏低的不良后果 / 陈文通  
31 四管齐下解开医患疙瘩 / 杨红兵  
32 我国将建立健全基层医疗机构补偿机制  
33 日韩农民医保全覆盖的时机选择  
    / 杨红燕 叶小舟

### 观察与思考

- 34 干部人事制度亟待解决的硬伤 / 李永忠  
36 当前公务员管理现状调查 / 翟校义  
38 “一对夫妇生育一个孩子”政策由来 / 田雪原  
40 当前独生子女研究的六大命题 / 风笑天  
42 国民体质连降十年 青少年运动能亚洲第三  
    / 吴键

### 百家言

- 43 领导干部要多学点传统文化 / 黄惠勇  
45 官员的道德评价的标准和方法 / 靳凤林  
46 潜规则是如何产生的 / 朱力

### 军事与国防

- 47 美国，六十年前朝鲜局势之误判 / 张长江

### 最新书摘

- 50 中国在梁庄 / 梁鸿

### 文史苑

- 53 中国历史上的人口观 / 姜涛

### 信息窗

- 55 “十二五”我国人均 GNI 进入中高收入国家  
    行列  
55 中国公民科学素养水平落后日本欧盟 20 年

- 55 财政部下拨 38.89 亿元完善校园安保  
56 政府应积极、理性、依法应对网络舆情  
    ——“网络舆情与政府作为”理论研讨会综述  
封三 论点摘编

### 撷英咀华

- 封二 品泰山 / 刘功业  
封底 征订广告

如有破损、漏页、模糊、影响阅读的，请与本刊编辑部申继红联系调换

**特别提醒：**本刊登载的署有作者姓名的文章或文摘均有报酬，请作者与本刊编辑部联系或直接与北京市版权局稿酬收转中心联系。

地址：北京朝阳区和平街 11 区甲 24 号  
邮编：100013  
电话：(010) 84251823

习近平：

## 为“十二五”开好局提供坚强组织保证

在2010年12月召开的全国组织部长会议上，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家副主席习近平发表讲话强调，2011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是“十二五”时期开局之年，是省市县乡四级党委集中换届之年，做好组织工作具有不同寻常的重要意义。

习近平指出，从2011年起至2012年上半年，全国省市县乡四级党委将自上而下集中进行换届。通过这次换届把干部选好、把班子配强，关系“十二五”时期目标任务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奋斗目标的实现，关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继续发展，关系我们党执政地位的进一步巩固。各级党委要增强政治责任感，认真贯彻德才兼备、以德为先用人标准，真正把政治坚定、实绩突出、作风过硬、群众信任的干部选拔上来。特别要注意把那些一心为民、埋头苦干、坚持原则、敢抓善管、为人正派、作风过硬的优秀干部，把那些长期在基层及生产一线努力工作和长期在条件艰苦、情况复杂、困难很多的地方努力工作的优秀干部，把那些思想解放、实事求是、勇于创新、锐意进取的优秀干部选拔上来，杜绝品行不端、心术不正、作风不实的投机钻营者谋到好处、占到便宜，鲜明体现党的干部路线和党的用人标准、用人导向。

习近平指出，换届中要充分发扬民主，提高干部民主推荐、民主测评的科学性和真实性，坚持把民主推荐结果与年度考核、日常考核、任职考核结合起来，重视干部一贯表现，既充分尊重民意，又不简单以票取人，做到全面、历史、辩证地评价干部。要坚持五湖四海、任人唯贤，放开选人用人视野，切实做到唯贤是举，使选拔出来的干部真正能够让组织放心、群众满意、社会认可。要着眼于增强领导班子整体功能和合力，进一步优化班子结构，既要考虑专业、能力结构上的合理性，又要考虑个性特点和工作阅历、工作经验上的互补性；既

要大力选拔优秀年轻干部，又要科学使用好其他年龄段干部。

习近平强调，从严治党，关键在于从严管理干部。要防止重选拔、轻管理和失之于宽、失之于软的现象，建立健全干部经常性管理机制，认真落实干部民主生活会、谈心谈话、巡视、审计等制度，确保对干部身上出现的苗头性倾向性问题能够早发现、早提醒、早纠正。对省市县乡党政一把手、执法执纪、管人管钱管物等关键岗位的干部，要重点配备、重点教育、重点考核、重点监督。

习近平指出，各级党委要继续抓好新一轮大规模培训干部的工作，加强对分级分类培训的管理，指导各级党校、行政学院、干部学院强化基础、发挥优势、突出特色、互相学习，推动形成特色鲜明、优势互补、功能完备的培训格局和有机联系的培训链。在继续抓好中高级干部教育培训的同时，要充分发挥市、县级党校和其他培训机构的作用，充分运用农村党员干部现代远程教育网络，加强对基层干部的培训，提高他们的综合素质特别是做好新形势下群众工作的本领。

习近平强调，要把创先争优活动作为基层党建一项经常性工作，同做好抓基层、打基础的各项工

作结合起来，健全创先争优长效机制，推动基层党组织履职尽责创先进，促使广大党员立足岗位争优秀，为基层党建工作注入新的动力和活力。要把联系服务群众、做好群众工作作为基层党组织的核心任务、基层干部的基本职责，改进和创新基层党组织工作思路、内容、方式，把基层党建工作成效落实和体现到推动科学发展、解决群众疾苦、化解基层矛盾、维护社会稳定、密切党群关系、夯实执政根基上来。要重视基层干部队伍建设，为他们解除后顾之忧，把中央关于真正重视、真情关怀、真心爱护基层干部的要求落到实处。

（摘自2010年12月18日《人民日报》）

# 未来五年，中国如何从容应对挑战

张晓晶

总体上，“十二五”仍将是机遇与挑战并存、中国经济可以大有作为的5年；但就决策层而言，应更多关注转型之紧迫及转型之艰难，从而需要非凡的勇气与魄力来推进改革，完善体制机制，使转型工作取得实质性进展。

## “十二五”的机遇

从国内形势看，“十二五”期间，中国经济仍能保持较快的发展。一是劳动力优势。尽管面临人口老龄化的压力，但“十二五”期间，人口红利对经济发展的支撑仍不会消失。二是资本优势。未来5年高储蓄的局面不会发生根本改变，因此，仍然有充裕的资本供给。三是工业化城镇化加速发展，为增长提供强大的动力。如果说过去30年，工业化是中国经济的主要推动力量，那么“十二五”以及未来的更长时间，城市化将是主力。四是市场化不断推进，开放水平进一步提高，这些都会使经济焕发出更大的活力。

从国际形势看，尽管遭遇到金融危机，全球化的发展出现曲折，但全球化的大方向不会改变，和平与发展仍是当今世界的主题。值得重视的是，由于受到危机冲击，发达经济体与发展中经济体的复苏呈现出不同步的情况，二者的相对力量也在发生变化。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测算，按购买力评价，到2014年，发展中经济体占世界产出的比重将首次超过发达经济体。这给发展中国家特别是中国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遇。那就是，中国可以积极地参与全球化的治理与区域性的合作，参与全球游戏规则的制定。与之相应地，中国可以加快人民币国际化的步伐，逐步改变全球的货币体系，这些无疑都给中国提供了巨大的机遇。

## “十二五”的挑战

未来5年，我们面临的挑战也可以从两方面来看。

首先，是外部需求萎缩的挑战。如果说，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所处的外部环境基本称得上是“全球化的黄金时代”，那么，经历了这次危机，全球化的黄金时代恐怕要告一段落。首先，全球范围内的经济再平衡与结构调整、金融部门的修复、实体经济活力的重新获得，以及新增长点的发掘，都需要相当长的一段时间。而金融危机之后所产生的财政危机，也会拖累复苏的步伐。2010年的美联储年会后，一份集合了多名央行官员与经济学家智慧的最新研究认为，后危机时代将有“10年过渡期”。也就是说，始于3年前次贷危机所造成的经济颓势还将持续大约7年。这意味着未来几年全球潜在增长率将会有所下降。而且，根据历史经验，在面临增长下滑的时候，贸易保护主义必然会抬头。这表明，中国所面临的外部需求的萎缩并不是暂时的，而是一个会持续较长时间的“新常态”。外部环境的改变，使得“十二五”规划的制订与之前有了很大不同，我们必须要把扩大内需放在重要的位置。

其次，是传统发展方式不可持续的挑战。过去30年中国增长奇迹值得欢呼，但也付出了巨大代价，特别是增长失衡问题非常严重。这包括城乡之间、地区之间发展的失衡；投资与消费的失衡、制造业与服务业发展的失衡；内外需之间的失衡，增长与分配之间的失衡等等。增长失衡问题导致未来中国增长面临自然与社会方面的双重约束。一方面，经济赶超与要素价格扭曲，导致结构失衡以及资源浪费和环境破坏；另一方面，只注重增长速度而忽视增长分享的做法，也导致了经济增长与福利改进之间的不匹配。可见，无论是资源环境所形成的自然方面的约束，还是教育、医疗、社会保障以及收入差距所形成的社会方面的约束，都意味着传统发展方式不可持续。

“十二五”期间，中国的工业化和城镇化还在加速推进，资源环境方面的压力会进一步加大。西欧早期工业化时期，涉及的人口只有1.3亿，而中国当

前的工业化与城市化,则要涵盖13亿人口。这样巨大的规模和体量,将会给资源能源与环境带来空前的压力。这无疑会对过度依赖投资、过度依赖工业特别是重化工业、过度依赖要素投入的增长模式形成自然方面的约束。

与此同时,社会方面的约束也在增强。这里特别要提到的是收入分配问题。其一,中国目前基尼系数在0.46左右,已经超出了0.4的国际警戒线标准。其二,从统计数据上看,城乡收入差距在3.3倍左右,但考虑到城市隐性补贴以及社保等因素,城乡差距还要大得多。其三,过去较长一段时间,在政府、企业与居民三者之间大的国民收入分配格局中,居民收入增长相对缓慢;在资本与劳动之间的分配中,劳动报酬占国民收入的比重处于一个逐步下滑的过程。这些表明,收入分配问题值得高度关注。收入差距过大不仅成为扩大内需与转变增长动力的瓶颈和障碍,也是影响社会稳定的一个重要因素。

### “十二五”的对策

面对诸多严峻的挑战,“十二五”期间我们该如何应对?

首先,政府要转型,特别是要减弱增长过程中的政府性驱动。政府转型是指要从经济建设型向公共服务型转变。当前来讲,紧迫的任务是要减弱增长过程中的政府性驱动。首先,政府性驱动不利于发挥市场在配置资源中的基础性作用。其次,对国有经济或地方政府的依赖尽管直接效果明显,但会带来财政风险。因为无论是国有企业,还是地方政府的负债风险,最终都由中央财政承担。比如这次的地方融资平台风险。第三,政府性驱动还会致使经济结构进一步扭曲,出现效率不足,寻租腐败等问题。

其次,改变政绩评价体系。目前对于政府的政绩考核,主要还是经济指标,特别是GDP增长率。尽管加上节能减排指标,但还不足以对地方政府行为形成约束。值得指出的是,即便中央一直强调科学发展、经济转型,但与此同时,地方政府在竞争中又面临着“速度不减,指标不降,排名不跌”的挑战,使实质性的转型很难推进。因此,只有弱化经济增长指标,考虑更多的社会性指标(比如居民

收入增长率,就业水平,社会保障水平,环保水平等),才可能从根本上改变政绩评价体系,从而转变地方政府行为。

第三,更加注重发挥价格、财税机制的作用。发展方式转型是极为复杂的系统工程,政府在掌握大方向的同时,要注重发挥价格信号与财税激励的作用。只有资源、能源价格合理了,资源税、环境税到位了,才真正有利于节能减排;只有劳动力、资金成本不再被压低,才会激励企业注重研发和技术创新;只有逐步增加直接税的比重,才会使地方上不会只注重规模扩张与工业发展,从而有利于产业结构的转换;只有理顺中央地方财政关系,使地方财政有新的支撑,缓解地方财力、事权不匹配的问题,才不会出现地方单纯依赖土地财政、畸形发展房地产的问题。另外从根本上,只有打破垄断,促进竞争,价格信号才可能更加准确,从而更好地引导资源的优化配置,提高供给的效率。

而所有这些,都需要改革来实现或保障。

(摘自《半月谈》2010年第22期)

### 征订启事

为便于读者和订户连续收藏本刊,我编辑部已将2009年度《党政干部文摘》杂志全年12期装订成册,欢迎新老读者和订户订购。另外,我编辑部还有少量2001年,2003年—2008年《党政干部文摘》合订本。每年定价60元(含装订费和邮资)。

订购方式:

从银行、邮局汇款,请在留言条中注明《党政干部文摘》2001年、2003年—2009年合订本。

开户行:北京建设银行海淀支行

账号:2613000507

户名:《党政干部参考》杂志社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大有庄100号

中共中央党校综合楼

邮编:100091

款到即开发票。

# 正确处理新时期人民内部矛盾

邢贵思

## 新时期人民内部矛盾的特点

人民内部利益矛盾凸显,是新时期人民内部矛盾的基本特点。人民内部利益矛盾表现在许多方面,当前比较突出地表现在收入分配问题上。我国现行的是以按劳分配为主、多种形式并存的分配方式,因此,社会成员的收入分配必然会出现差别。如企业内的劳动者、管理者、工程技术人员,非公有制企业的企业主和其他人员,由于分工和在生产中的地位作用不同,也由于除按劳分配外,还存在按生产要素分配,加上市场经济中的竞争和其他因素,人们在收入分配方面不可能没有差距。这种情况在改革开放前我国所有制比较单一的历史条件下是没有的,那时分配方式基本上是平均主义大锅饭,社会不同成员的收入分配基本持平,但这种分配方式严重束缚了生产者的积极性创造性。我国目前表现在收入分配上的人民内部矛盾之所以比较突出,从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是我国实行体制转轨的必然结果。解决这类矛盾,只能通过持续发展经济,继续深化改革,决不能回到改革开放以前的老路上去。

社会成员之间的收入分配存在一定差距在现阶段虽然不可避免,但这种差距不能过大,否则就会加深人民内部矛盾,影响社会和谐稳定,也不符合社会主义的公平正义原则。当前我国城乡之间、区域之间、行业之间、不同人群之间收入分配的差距,并没有因为经济发展而有所缩小,反而趋于扩大,这种情况必须引起我们的高度注意。邓小平同志晚年十分关注分配问题,从1990年4月到1993年9月,他曾多次在不同场合谈到分配问题,强调富裕起来以后要解决好财富分配问题,解决这个问题比解决发展问题还要困难。他说:“少部分人获得那么多财富,大多数人没有,这样发展下去总有一天会出问题。分配不公,会导致两极分化,到一定时候问题就会出来。这个问题要解决。”

当前,群体性事件多发频发是人民内部矛盾的突出表现。随着我国经济发展,部分城市扩建以及一些大型建设项目如铁路、机场、高速公路、大型水库等的兴建,在征地、拆迁、移民安置等过程中出现的矛盾日益增多,成为新时期人民内部矛盾的突出表现,也是一些群体性事件发生的重要原因。城市扩建和大型建设项目的兴建,虽出于经济建设的需要,也符合人民群众的长远利益,但毕竟损害了部分群众的暂时利益,如果补偿不合理,安置又不到位,加上基层政府的工作人员方式简单、作风粗暴,就容易引发群众的不满情绪,甚至出现严重对立。卷入群体性事件的多数群众是为了表达自己的利益诉求,维护自己的正当权益,我们应该按照党的政策和法律法规,严格区分矛盾性质,予以正确处理。

## 正确处理新时期人民内部矛盾是促进社会和谐稳定的前提和基础

社会和谐稳定不等于没有矛盾。矛盾无时不在,无处不在,不论世界怎样变化,社会怎样发展,矛盾依然存在,改变的只是矛盾的性质和表现形式。人民内部矛盾也是这样,不但过去存在,现在存在,将来也还会存在,它将贯穿于整个社会主义历史时期,即使将来到了更高的社会发展阶段,可能也不会完全消失。因此,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是我们必须长期面对的历史课题。人民内部矛盾虽是人民群众根本利益一致基础上的矛盾,其根本性质属于非对抗性,但如果我们处理不当,也会激化,以致发展到对抗的地步,成为社会不稳定因素。因此,我们对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既要有信心,又不能掉以轻心。

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要研究人民内部矛盾的特点及其发展规律,要探索新时期群众工作的方法,要把对群众的教育说服和为他们解决实际问题更好地结合起来,要在体制机制的创新上下工夫,最根本的是要端正对人民群众的立场和态度。要真

正做到情为民所系，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多做顺民意、解民忧、得民心的事。只有这样，才能提高人民群众对党和政府的信任感以及对自己生活状况的满意度，从而从根本上消除人民群众同党和政府的隔阂。人民内部并无根本的利害冲突，党和政府同人民群众一直是同甘共苦、同兴伟业。30多年的改革实践充分证明：我们正在做的事无不以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为出发点和归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不但惠及了我们这一代人，而且还将惠及我们的子孙后代。人民群众对我国社会制度、党和政府的方针政策以及自身的生活状况总体上是满意或比较满意的，这是我们能够处理好人民内部矛盾的最根本条件。群众的某些不满主要表现在一些具体问题上，只要我们提高认识，改进作风，扎实工作，创新机制，这些问题是可以解决的。

### 当前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要着力做好的几项工作

当前，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要着力做好以下几方面的工作：

第一，进一步推动经济平稳较快发展，不断提高经济实力。经济发展了，实力增强了，就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打下了牢固的物质基础，许多利益上的矛盾就比较容易解决。比如，在经济发展、实力增强的情况下，就可以增加投入，加大对收入过低群众的扶持力度；就可以进一步解决好“三农”问题，缩小城乡差别；就可以增加就业岗位，扩大就业机会；就可以加大对西部地区的开发力度，进一步消除西部地区和东南沿海地区之间的发展不平衡，以及由此产生的不同地区群众在收入分配上的不公平，等等。没有经济实力的提高，什么事都难办。只有首先把蛋糕做大，然后才谈得上合理分配。

第二，调节不同社会群体之间的利益关系，兼顾不同方面群众的利益。调节利益关系的出发点是以人为本，使社会不同利益群体都能享受到改革发展带来的成果。这种调节不是“抽肥补瘦”，而是通过经济、法律、政策、行政等多种手段，逐步理顺不同社会群体在收入分配上的关系，使这种关系保持在一个相对公平、相对合理的范围内，防止因分配失衡而使利益矛盾激化。调节利益关系，必须对我国现行分配结构进行适当调整。我国目前实行的

分配方式，普遍存在劳动报酬在分配比例中偏低的现象。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企业的经营管理者特别是部分“高管”，收入有了大幅度增加，而普通职工收入的增幅则较为缓慢，造成了很大反差。因此必须提高劳动报酬在分配中的比重。另外，还要特别关注低收入的困难群众。低收入困难群众一部分在城镇，大多数在农村。一些农民因失去了赖以生存的土地，得不到合理补偿，流入城市后又没有得到市民待遇，因而陷入了困难境地。改善低收入困难群众特别是改善农民的生活状况，是调节利益关系的重点。

第三，认真倾听人民群众合理诉求，切实维护人民群众合法权益。在对待征地、拆迁、移民安置这一类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上，一定要慎之又慎。党和政府的各级组织，特别是在第一线直接面对群众的基层组织 and 工作人员，一定要耐心细致地做好工作，设身处地多为群众着想，要看到他们利益诉求的合理方面。我们的干部做工作时一定要有正确的姿态，不是站在群众之上，而是站在群众之中，不是站在群众对立面，而是站在群众一边。处理群体性事件，还要有正确的政策，必要时还要立法。例如在征地问题上，要区分公共利益与商业利益，以确定征地的合理性；要先补偿后用地，解除农民因拖欠拿不到补偿款的后顾之忧；要按市场评估价给予补偿，使农民真正获得到位的补偿。

第四，在发展经济的基础上切实改善民生。改革开放以来，人民生活有了显著提高，但仍有大量工作要做，特别是城乡之间、区域之间、行业之间、不同人群之间的不平衡不协调问题，亟须认真解决。改善民生不仅要提高人民群众的物质生活水平，还要提高人民群众的精神生活水平。增加教育和医疗卫生的投入，特别是增加农村教育和医疗卫生的投入，进一步解决农村群众入学难、看病难的问题。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和推动慈善公益事业发展，使需要帮助的群众能及时得到帮助，使因重大自然灾害而蒙受巨大损失的群众能得到及时救助和妥善安置等。民生工程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政府主导、各方配合、互相协调、共同推进。只要我们始终把改善民生作为工作重点之一，并且不断有所改进，亿万群众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热情就会进一步高扬，人民内部的团结就会进一步巩固。

（摘自《求是》2010年第22期）

## 现阶段社会矛盾呈现四大特征

中国现阶段的社会矛盾问题呈现以下趋向，值得引起人们的重视。

其一，社会矛盾问题呈现出一种“并发症”的状态。别的国家和地区同等发展阶段所面临的各种社会矛盾问题在中国几乎一应俱全，同时中国还出现了不少别的国家和地区同等发展阶段所不曾有或不多见的矛盾问题，如强行征地拆迁问题、“农民工”问题、买断工龄问题、大学生就业难问题等等。

其二，社会矛盾问题的连带性很强、波及面十分广泛。这些社会矛盾问题之间往往是相互影响、相互叠加，从而使得社会矛盾问题从总体上看更加复杂化；而且在某个特定的条件下，原本属于个案化的社会矛盾问题有时会演变为整体化的社会矛盾问题。

其三，特别集中在与基本民生密切相关的部位。虽说中国现阶段社会矛盾问题种类全、数量大，但这些社会矛盾问题各自对于社会整体的影响度及影响面是不一样的。大量社会调查几乎都一致地显示出这样一种情况，中国现阶段的主要社会矛盾问题多集中在同民众日常生活有直接关系的部位，比如就业难问题、收入差距过大问题、社会保障滞后问题等等，而被人们比喻成“新的三座大山”亦即“买不起房、看不起病、上不起学”的问题，更是对工薪阶层、农民阶层的生存状态和发展前景产生了十分广泛的不利影响。

其四，劳资纠纷和矛盾迅速上升。随着城市化进程的迅速推进，农业人口比重迅速降低，被劳动关系覆盖的人口在迅速增多，于是劳动关系所影响的社会面也越来越大。同时由于中国处于市场经济的初期阶段，劳动关系双方在解决相互间矛盾时，往往是无章可循，“强资本弱劳工”的现象不可避免

地会出现，这就必然地会引发种种劳动纠纷和矛盾。从1997年到2006年，全国受理的劳动争议案件迅速增多，每年的增幅在20%以上。2008年，当期立案的劳动争议案件比上年增长98%。

社会矛盾问题如若解决得不好，则会对中国发展的全局造成严重的负面效应。这至少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危及社会的和谐稳定。就一般情形而言，一个社会的矛盾问题越多，社会就越加不稳定、越加动荡，严重者甚至存在着很大的社会倾覆的可能性，从而使发展失去必要的前提条件。如果我们观察一下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贫富差距状况就会发现，凡是基尼系数过高的发展中国家往往都存在着社会不稳定甚至是社会动荡的情况。其二，使发展进程变形走样。社会矛盾问题如果得不到有效的化解，社会各个阶层各个群体之间必然会产生大量隔阂和不信任的因素，进而影响到社会共识的形成。在这样的情形下，各种目标迥异的行为取向不可避免地会曲解误读现代化的具体目标。比如，贫富差距问题如果得不到有效控制而愈演愈烈，民生问题如果长期得不到应有的改善，势必会使为数众多的贫困者和少数富人在政治体制改革方面难以形成共识，从而使政治体制改革陷入某种“夹生饭”的状态。

显然，我们不能回避而应当积极主动有效地应对并化解社会矛盾问题。就此而言，应当从标本兼治两个方面着手。从治本的角度看，应当特别注重从源头上着眼，也就是十七届五中全会公报所提及的那样，要“更加注重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只有这样，才能最大限度地化解社会矛盾问题、消除社会的不和谐因素，最大限度地增加社会的和谐因素。

（摘自2010年11月16日《济南日报》该报评论员文章）



# 人民内部不同群体的利益矛盾及其协调

刘昀献

## 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利益群体及其差异和矛盾

群体的划分标准是多维度的，但利益的同异无疑是更具分析力度的划分群体的标准。不同利益取向的人们形成不同的利益共同体。目前在中国社会人民内部主要存在管理干部、企业主、科技专家、一般公务员及垄断行业职工、个体经营者、工人、农民、农民工、下岗失业职工及城镇无业人员等群体。

利益本身是多样化的，但其中最基本的是经济利益、政治利益和文化利益。

1. 不同群体经济利益的差异和矛盾。经济利益的差异突出表现为贫富差距的拉大。财富过多地向占有经济、政治、文化资源的群体集中，使在改革初期获得了一定利益的工人、农民等社会群体日益成为改革代价的承担者和相对利益受损者。突出表现为占有资本的企业主群体与劳动者之间的不平等交换，使企业收入过度向企业主和企业高管倾斜。

2. 不同群体政治利益的差异和矛盾。政治利益的差异主要体现为政治参与和利益表达权利的不均衡。在公职人员的选拔任用方面，一些群体往往比另一些群体拥有较多权利。近年来的“公开选拔、竞争上岗”作为干部制度改革的重要举措而深受欢迎。但公推公选仍是“公开”之“公”，还没有完全做到“公众”之“公”。工农群体的话语权在干部选拔任用上依然不足。

在利益表达上，强势群体的话语权增大，工农群体的话语权有所缩小。私营企业主及各类大中型企业的经营者力量不断增长，由于话语权增大，他们的意见和建议容易引起注意，从而使他们的利益能够较多地得到满足。而工人、农民等，由于自身力量比较弱，在“两代表一委员”中的比例下降，自身的意见、建议难以矫正社会利益格局的失衡。

3. 不同群体文化利益的差异和矛盾。文化利益的差异集中反映为教育和文化利益的不平等。在教育方面，国家改革了大学的统招统分政策，有些人则借此主张教育市场化，实行教育高收费，使富有群体的子女受教育机会大大增加，可以上好的大学；贫困群体受教育的机会相对减少，一些工人、农民家庭因送孩子上大学而背负债务，孩子毕业后由于缺乏相关资源及种

种原因又找不到合适的工作，从而使寄希望于“知识改变命运”的贫困家庭的子女对未来的希望降低，导致社会阶层、群体的固化。

在文化方面，一些人把发展文化产业等同于“文化产业化”，一方面大建收费高昂的高档歌剧院、艺术中心等满足高消费群体的需要；另一方面却把本来为数不多的为公众服务的文化馆、电影院、剧院改成了娱乐中心等，特别是作为国家公共财产的文化遗址、公园等收费一再提高，相对抑制了中下层民众的文化需求。

## 不同群体利益矛盾产生的原因及其影响

社会转型在一定程度上就是不同群体利益的分化和重组。问题的关键在于不同群体利益的差异必须控制在适当范围内，如果忽视了不同群体利益的动态平衡，将会对经济社会发展产生不良影响。

改革开放以来，党和政府根据我国经济发展不平衡的特点，实行由“部分先富”、进而达到共同富裕的方针。这一政策是卓有成效的。但在这个过程中，也出现了贫富差距拉大的趋势。

事实上，基于个人能力和公平竞争的效率和收入差距，并非社会争议的焦点。真正的焦点在于，在实施经济体制改革的过程中，由于法制不健全，由于没有形成相对合理的收入分配体制，甚至有行政权力参与市场化分配，产生了社会不公。

近年来，在土地转让、资金信贷以及股权融资等领域，权力市场化的现象时有发生。权力作为个人或群体资源参与市场化，在形成暴富群体的同时，不但侵犯了他人创造社会财富的收益，而且削弱了社会调节贫富差距的能力。由于中国的市场经济规则尚未系统建立起来，企业主群体的发展前景具有某种不确定性，使得他们需要在权力那里寻求保护。近几年我国一些腐败案件中反映出的官商勾结、权钱交易，就是这种负面效应的最好诠释。腐败不加遏制，必然导致公众的利益受到损害，更加造成贫富差距的两极化发展。

不同群体利益差异的拉大，特别是贫富差距的两极化发展趋势，如不加以及时有效的调控，将会导致严重的后果。

一是会使党和政府的公信力流失。工农等群体可能将导致自己不利地位的原因归为社会不公。在这种情况下,不满情绪便会在社会中蔓延,公众对党和政府的信任就会减弱。

二是会引发突发性、群体性冲突。当困难群体的合法权益受到严重侵害,而无法通过正常的手段来维护时,往往会采取群体的方式诉求利益。突发性群体事件的发生会给社会的稳定发展带来极大的危害。

三是会影响经济的健康发展和改革的顺利推进。由于贫富差距扩大,目前,我国低收入者和中等偏低收入者占的比重过大,达到了70%以上,而中等收入者的比重只有20%,在这种情况下,经济内需拉动明显不足,削弱了经济发展的动力。

同时,由于贫富差距扩大,困难群体没有充分地分享到改革与发展成果,教育医疗费用、房价的增长幅度,超过了普通民众的承受能力。这些现象对改革的顺利推进十分不利。

### 不同群体利益矛盾的协调

当代中国不同群体利益的矛盾状况正处于一个关节点上。党和政府妥善应对,则社会公正和贫富差距状况将得以改善;反之,将出现贫富的两极化发展的后果。不同群体的利益平衡与协调是一项庞大的系统工程,需要个人、社会和政府方方面面做出努力,最根本的是要做好以下三方面的工作。

1. 坚持执政为民的理念,增强政府诚信建设。党和政府不仅要在宗旨上明确宣布代表全体人民的利益,而且在实际政策上也要真正把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作为制定政策、部署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历史表明,市场机制不能自然地实现资本所有者、劳动者等不同群体利益的平衡,没有市场之外的力量,资本的统治就不可避免。一个时期以来,广大人民群众对日益凸现的利益问题表示担忧,迫切需要党和政府部门关注他们的利益。党和政府要在发展中协调好各个群体的利益关系,使广大人民能够共享改革发展的成果。

2. 调整相关政策,彰显社会公平。改革开放以来,为打破平均主义对效率的损害,我们提出并实行了“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方针,但在实践中一些人却把效率与公平对立起来,只强调效率而忽视公平,造成了改革利益分配和成本分担的失衡。在政府主导的一系列经济性、社会性改革举措中,如产业结构调整、征地、城市改造、福利保障制度调整等,强势群体成为显性的或隐性的受益者;而困难群体则成为直接或

间接的利益受损者。

事实上,社会公平与经济发展同样是社会主义的目的。早在1992年,邓小平同志就针对贫富差距问题指出,在本世纪末达到小康水平时,就要突出地提出和解决这个问题。目前,中国的社会发展已经达到了小康的发展目标,已经具备了解决贫富差距不断扩大问题的社会基础。另一方面,贫富差距不断扩大已经成为重大社会问题。继续推进经济社会发展,就必须调整社会政策,更加彰显社会公平。如同《建议》所说:“在当代中国,坚持发展是硬道理的本质要求,就是坚持科学发展,更加注重以人为本,更加注重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更加注重统筹兼顾,更加注重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社会公平正义。”

3. 建立和完善不同群体利益表达和矛盾协调、化解机制。一是推进公民有序政治参与,完善不同群体利益表达和权益维护机制。首先,要不断丰富民主的形式,保障更多公民有机会参与政治。应使不同群体在“两代表一委员”中占有适当比例,增加工农群体的代表。其次,要建立各社会群体利益表达的有效机制,做到上情下达、下情上通,使各社会群体对社会发展状况的认知达成共识。再次,要按照《建议》要求,“健全党和政府主导的维护群众权益机制,完善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司法调解联动的工作体系,整合各方面力量,建立调处化解矛盾纠纷综合平台”。

二是建立和完善合理的利益分配机制,化解不同社会群体的利益冲突和矛盾。《建议》明确指出:要合理调整收入分配关系,“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处理好效率和公平的关系,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努力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规范分配秩序,加强税收对收入分配的调节作用,有效调节过高收入,努力扭转城乡、区域、行业和社会成员之间收入差距扩大趋势”。“坚定不移地走共同富裕道路,使发展成果惠及全体人民”。党和政府要坚持把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制定政策、开展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善于从政策取向上找准最大多数人的共同利益与不同群体的具体利益的结合点。通过利益整合,使各个群体公正合理地分享社会利益,同时尽量平等地分配社会合作所产生的利益负担。只有这样,才能达到不同群体利益的动态平衡,促进不同利益群体共存的多元社会的健康和谐发展,顺利实现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

(摘自2010年12月12日《文汇报》)

# 论中国的海外利益

刘新华

## 中国海外利益的内涵和特征

“海外利益”实际上是“境外的国家利益”，是国家利益的海外延伸。一国的海外利益主要包括：海外公民侨民的人身及财产安全；国家在境外的政治、经济及军事利益，驻外机构及驻外公司企业的安全；对外交通运输线及运输工具安全等等。学者们认为中国的海外利益即在中国领土之外的中国国家利益，其内容包括海外政治利益、海外经济利益和海外文化利益，以及为维护这些利益而相伴的海外安全利益。海外经济利益是海外利益的核心。当前中国的商品出口、原料进口、吸引外资、引进技术、国际旅游、工程承包、劳务出口、境外投资和技术出口等方面有了长足的进展，海外市场也拓展了相当的份额。海外政治利益主要表现为维护国家现有的社会制度，维护主权独立和完整，维护国家在国际社会中的地位，逐步扩大自己在世界范围内的影响力等。文化是国家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的海外文化利益是指国家的文化习惯、信仰和价值观念在国家疆域外的客观存在——诸如在世界各地建立的孔子学院就是中国海外文化利益的载体之一。在中国海外利益迅速拓展的时代，必将伴随着中国海外利益的维护问题——这种维护既包括传统安全领域，也包括日益上升的非传统安全领域，前者如近年来日益为国家所关心的海上通道安全，后者如海外中国公民的人身和财产安全问题，这是中国融入国际体系下海外安全利益的新课题。此外，海外有3000多万华侨华人，在必要的时候也要给予帮助。中国的海外经济利益首当其冲，政治和安全利益次之，三者构成了国家海外利益的基本内容。

从地区分布来看，中国的海外利益成发散状从点到面已经从国内、周边扩展至全球，尤以周边国家、发达国家以及能源丰富的地区利益最为集中。中国海外经济利益大部分集中在发达国家，较多依

赖欧美市场和以日本、东盟、韩国为代表的亚洲市场。但从地缘战略角度出发，中国在亚洲和周边的利益，特别是经济利益正日益增加，扩展速度超过世界其他地区。中国与一些资源丰富的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如中亚、中东和非洲）的经济合作近年也快速增长，主要是中国对当地的能源（石油）与原材料（富铁矿、锰、铬、钾、盐、铜、铝等战略资源）需求强烈。

中国海外利益的出现和获得首先源于自身的改革开放政策，以向外部世界打开国门的方式进入世界市场，其获得的方式不具有掠夺性，而选择和平的发展道路；中国既通过争取和平的国际环境来发展自己，又以自身的发展来促进世界和平；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同世界各国开展交流与合作，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中国海外利益的获得与维护与国际社会的规则和程序如联合国宪章、国际组织的规章和制度以及被国际社会普遍认可的国际法和国际惯例等具有内在的逻辑的一致性。中国海外利益把中国的发展与世界的发展联系起来，把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与世界人民的共同利益结合起来，平等参与国际决策，通过合作求得发展，既满足了自身的国家利益，也有利于国际社会的稳定与发展，国际社会的绝大多数成员尤其是广大的发展中国家能够获益，中国的发展已经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撑和拉动力量，从而促使中国为世界的和平和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有利于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建立。

## 中国海外利益的维护

在错综复杂的国际形势下，中国海外利益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拓展，对中国海外利益的维护就成为中国对外战略面临的重要课题。

第一，转变国家利益观念，树立具有全球意识的国家利益观。在中国与国际社会联系越来越密切的形势下，中国的海外利益遍及全球，其内涵、空

间分布、实现方式和手段、与其他国家之间的利益关系等都发生了新的变化，中国需要正确界定自己的国家利益，在维护和实现国家利益方面要有全球眼光，要具有多维性、系统性、战略性和前瞻性，使中国在海外利益的实现、拓展和维护的进程中，不单是一个被动的“刺激——反应”过程，而是一个积极参与的过程。客观上说，只要符合国际法和国际道义，并用和平手段谋取的海外利益，都是合理的国家利益诉求，但是，中国正当的海外利益诉求常常被误解，甚至被不友好地解读。面对这样的舆论氛围，任何试图掩饰正当利益的言论和行为，都无助于澄清迷雾，甚至有弄巧成拙之嫌。因此，对中国正当海外利益的不怀好意的指责，要有理、有力、有节地予以反驳。

第二，制定适当的国际战略。中国的海外利益越融入世界经济全球化，中国的海外利益受国际环境的影响就越深刻，中国必须制定具有世界性、整体性与综合性、预见性的国际战略。单纯从经济层面来说，发达国家的国际战略从来有两个重要的组成部分，一是如何保障外来资源供应满足国内建设的需要，二是如何保障本国庞大的海外经济利益。由于中国和外部世界高度的相互依赖性，中国在这两个方面的需求愈来愈显著，但是，“无论是保护本国的海外经济利益还是从海外获取国内所需要的资源，中国现有的国际战略远远不能够胜任”。这种现象如果不逐步加以改变，中国经济越繁荣，西方经济对中国经济的“巧取豪夺”就越猖獗，中国海外经济与金融的安全系数就越是持续降低。

第三，建立保障和应急机制，为维护海外利益提供制度保证。中国政府要对中国的海外利益建立实质性的保障机制，提供外交、法律、制度等政策层面的支持，建立、健全境外投资管理制度等。为保护中国公民海外安全，由外交部牵头，中国政府已经建立了协调、预警、应急、服务和磋商五大机制。在日益复杂的国际形势下，单纯依靠外交部来维护中国的海外利益显然是不够的，中国海外利益的维护需要中国政府各部门紧密协作。

第四，要有风险意识，加强对海外各类风险尤其是政治风险的评估、识别和预警管理并定期发布，要考虑商业活动背后的非商业因素。评估的主体以政府为主，企业和个人也要了解在境外的风险。评

估的重点是导致有关投资环境突然出现变化的政治力量和政治因素，东道国对外国公司的法律及政策、各个政党的政治观念及其力量对比的消长，各类政策的走向和决策程序，与中国政府的亲疏程度等。与海外利益有关的政治风险即使不能规避，也可将损失减低到最小。

第五，积极推动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旧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是在发展中国家无权的情况下，按照发达国家利益形成的。旧秩序的特点就是不公平、不平等和不合理。按照和平共处五项基本原则建立的新的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有助于世界各国共同繁荣、共同发展，从而有助于中国海外利益的实现和维护。当然，中国走和平发展的道路，融入西方主导的国际体系、依靠现有的多边主义制度解决分歧和争端并从中受益，并不意味着中国认同旧秩序、放弃了自己建立国际新秩序的主张。中国将以渐进的、非对抗性的和积极的方式推动国际秩序朝着更加民主、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

第六，建设一支能够维护海外利益的防卫性的强大海军。海军是唯一能在平时走出国门、走到国际公共场合、走到其他国家的国际性军种。海军的功能在平时主要表现为武力威慑、处理危机、人道主义救援、打击海盗、预防等，战时则表现为争夺制海权、远洋护航、保护海上交通线等，它活动的空间应该是在全球海洋，可以有效地利用占地球表面积70%的海洋这一公共物品，由此可见，海军是最能够保护主权国家海外利益的军种。保护遍布于世界的中国海外利益，是时代赋予中国海军新的历史使命。相对于中国海外利益的迅速拓展来说，中国维护海外利益的军事自卫手段仍然严重滞后。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增强，应该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建设一支能够维护中国广泛海外利益的、与世界军事形势相适应的强大的海军。中国不称霸，并不意味着中国不保护自己的海外利益。中国强大海军的建设，是有利于中国和世界经济的繁荣，也有利于维护世界和平。

### 中国海外利益的实现需要处理的两个关系

第一，中国海外利益维护和实现过程中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关系：竞争、克制与合作。中国与西方

发达国家之间在国家利益方面存在着竞争关系，这是客观存在的事实。中国与西方发达国家有着不同的战略利益和战略目标。西方发达国家建立并主导了当今的国际体系，它们拥有极其广泛的海外利益，需要保持西方阵营在世界范围内的既得利益和权力地位，打压可能对自己的利益和地位构成威胁的潜在对手；中国是一个新兴的发展中大国，中国要走向世界，维护自己的海外利益，捍卫国际法赋予中国平等的发展权。随着中国海外利益的增加和扩展，中国和西方国家之间这种结构性的矛盾就可能表现出来。同时也应该看到，中国坚持走和平的发展道路，不会奉行修正主义的外交战略，更不可能以武力的方式去推翻西方主导的国际体系，这种非扩张性的海外利益的拓展决定了中国在与西方国家打交道过程中会采取克制的态度。所谓克制，就是中国在海外利益的实现与拓展过程中，有保留地使用自己的权力，不会挑战西方国家的核心利益，并希望自己得到发达国家同样的对待。中国日益广泛的海外利益，只是中国根据国际法赋予中国平等发展权合乎逻辑的必然结果，中国在世界任何地区不会寻求排他性的战略利益。中国与西方国家之间在海外利益方面应该而且能够建立一种战略上的相容互惠关系，如都需要维护世界的和平与稳定，都希望世界经济的繁荣，而且，中国愿意维持国际社会的现状，在现行的国际框架之内通过对话的方式解决问题，这些都有赖于双方之间，尤其是中美之间的合作。

第二，中国海外利益维护和实现过程中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关系：共赢的合作关系。中国在发展中国家海外利益的广泛出现是在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之后。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一员，中国始终把加强同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团结与合作，作为外交政策的基本立足点。中国在发展中国家的海外利益与发展中国家发展的愿望和要求，在本质上是一致的；中国这种海外利益，更是通过与发展中国家的友好合作获得的。这种合作是一种共赢的合作：中国在发展中国家的海外利益有利于发展中国家的的发展，从而也有利于维护和改善发展中国家的总体利益。多年来，中国与其他发展中国家在国际舞台上彼此给予持续的外交支持说明了这种利益的一致性。

（摘自《当代世界》2010年第8期）

**薄熙来：**

## 给人民群众办好事，

### 得有本领

在最近召开的重庆市委、市政府全市经济工作会议上，市委书记薄熙来向全市干部提出要求：给人民群众办好事，得有本领，一定要加强学习。现在一些干部，用大量时间上网、看电视，眼睛也没闲着，但经典的东西没看多少，脑子里空空如也，只是一堆价值不大的信息。领导一个区县、一个部门，如果脑子里没些系统的知识，缺少真知灼见，说出的话就没有根底，大家就难以服气。

薄熙来说，要把重庆的工作搞好，没有真知是不行的。这两年我们搞林权制度改革、户籍制度改革、分配制度改革和公租房、土交所等，都需要知识，都要学习！我们提倡大家敢闯敢试，要有勇气开拓创新，这都需要建立在科学思维的基础之上，而不是蛮干。有了丰富的知识才会有科学的创意。我们要在全市、首先在干部队伍中提倡学习，要力争让咱重庆成为我国人均读书最多的城市之一。

（摘自2010年12月22日《重庆日报》）

**徐守盛：**

## 严审批、控规模、不攀比

### “约法三章”精简节会

湖南省委书记徐守盛最近针对节会活动过多过滥问题时指出，造成节会活动过多过滥的问题，是我们对节会活动缺乏刚性制度约束，没有硬性纪律规定。对此，我们要“约法三章”。

严把节会活动审批关。要分类审批，按程序审批，明确审批原则。政府部门举办的会议或活动，

包括庆典、招商、外事、论坛、研讨会、评比、达标、表彰等，一律要有年初的计划，不临时动议。不要省委、省政府发文，不要省财政拿钱。不牵扯省委、省政府领导精力的节会活动，采取市场运作的方式举办。

严控节会活动范围。尽可能减少人数，控制规模。不通知同一单位多人开同一内容的会，谁分管，谁开会，并负责落实。尽可能利用视频，控制成本。不层层开会，不开重复的会。不开无具体内容、无人负责、不需落实、不解决问题的会。

严格节会活动规格。部门性的、系统内的、专业性的节会活动，不能随意提高规格，更不能相互攀比，讲规格不讲效果，讲排场不顾影响。凡通知省直、市州党政“一把手”参加的活动，开到县市区党政“一把手”的会议，请多名省级领导参加或出席的活动，经省委办公厅、省政府办公厅协商沟通后，报省委、省政府主要领导同意，由省委统一安排。

（摘自2010年12月2日《湖南日报》）

**王正伟：**

### 查处腐败要真严

#### 用正规规则遏制“潜规则”

宁夏回族自治区政府主席王正伟提出：要加深对工程建设领域突出问题的治理整顿。

制度要真严格，不能大而化之。可以定一条，领导干部不得插手工程，领导干部打招呼的，要依法依纪处理。有些工程腐败是一些人打着领导的旗号实现个人目的。我们要从制度设计上加以预防，及时堵塞漏洞。否则，道高一尺魔高一丈，“潜规则”就会大行其道。

评标要真科学，不能个人说了算。工程的招标、评标过程中，可能存在着非法串标行为。说来说去，最后由领导的加分决定，还是个人说了算，这不科学。工程收尾超预算，造成既成事实。这里就很难

说没有隐藏的腐败。领导在评标中究竟该占多少分？工程概算多少算是合情合理？串标行为应该怎样防范？追加概算是不是该有个合理尺度？一个可行的标尺是请纪检、监察、审计部门和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介入整个流程，投标全过程在网上公布，避免由个别领导拍脑袋决策。

操作要真阳光，不能走过场。制度设计绝不是流于形式，绝对不能搞暗箱操作。

查处要真严厉，不能心慈手软。查处工程建设领域腐败案件，是大快人心的事。心慈手软，就是对党和人民的犯罪。

制度管人、管事，重在管用。没有细化、管用、易于操作的制度规则，“潜规则”就会大行其道；有了规则不去遵守，“潜规则”同样会大行其道。我们必须用正规规则勇敢面对“潜规则”，遏制“潜规则”。

（摘自2010年12月13日《人民日报》）

**孙春兰：**

### 绝不能做违背民意

#### 劳民伤财的事

中共福建省委书记孙春兰最近在福建省委八届十次全会上说：只有在一个物质丰裕、精神充实、生态舒适、社会和谐、政治清明的社会，群众才能真正安居乐业，幸福指数才能提高。要适应社会发展变化，进一步创新社会管理机制，积极化解各类社会矛盾纠纷，为人民群众营造安全有序的生活环境。进一步加强民主法治建设，从各个层次、各个领域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充分保障人民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促进社会公平正义。

推动跨越发展是全省人民共同的事业，必须充分调动和发挥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凡是关系人民群众重大利益的改革措施出台，都要充分考虑广大群众的承受能力，绝不能做违背民意、劳民伤财、增加群众负担的事，最大限度地在全省人民的发展积极性引导到跨越发展上来。

（摘自2010年12月8日《人民日报》）

# 通胀逻辑的中国答案

中国当前的物价突涨，看似来得很突然，实际上是发展模式多年累积后，诸种内外因素集中爆发的规律性结果。

专家分析，引发2010年10月份以来物价突涨的原因很多，既有全球性因素，又与我国长期以来的增长模式和当前所处的发展阶段，以及货币超发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 金融危机 + 美元霸权

对于2010年10月份CPI的飙升，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盛来运就直言“美国新一轮宽松货币政策释放的流动性，已成为国内物价上涨的新推手。”

金融危机后，美联储连续两次采取量化宽松政策。2010年11月推出6000亿美元第二轮量化宽松货币政策；此前截至2010年3月第一轮量化宽松结束，美联储购买了1.25万亿美元的抵押贷款支持证券、3000亿美元的美国国债和1750亿美元的机构证券，累计1.725万亿美元左右。两者合计，给全球市场释放了2.3万亿美元流动性。

上述措施阻止了美国经济“如自由落体般崩溃”，却导致大量资金涌入大宗产品市场，加上新兴经济体率先复苏所引发需求预期，大宗产品价格大幅上涨。据美银—美林证券的估计，在美联储推出第一轮量化宽松政策后，包括原油、铜以及贵金属等商品价格上涨了约15%。此时，极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并未能成功启动发达经济体内部的投资和消费，反而导致本币贬值，过剩资本通过各种渠道加速流入新兴经济体，引发资产泡沫，刺激这些地区的通胀率先回升。在新兴经济体中，中国作为主要的大宗商品进口国和潜在汇率升值国，热钱涌入和输入型通胀的压力尤为明显。

于是，2010年下半年与上次全球性通胀不同，此次“东边日出西边雨”：一边是以美欧日为首的发达经济体复苏乏力，失业率居高不下，持续面临“通缩”风险；另一边则是新兴市场经济过热和资产价格泡沫愈演愈烈，通胀迅速抬头。

不过，在国家信息中心经济预测部的张茉楠眼中，

这只是问题的表面。

“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经济体之所以会成为全球流动性过剩的‘泄洪区’，根本原因在于，美国是全球货币政策的实际制定者，美元霸权的全新模式在驱动全球经济，中国也被完全纳入到美元的全球循环之中，而危机中的美国恰恰在利用美元的霸权地位来转嫁危机。”

她阐述道，一方面，美元不再有黄金储备的束缚，其支柱虚拟化美国提供的债券和金融资产，为美国大规模对外提供流动性打开了大门，造成了全球空前持续性的流动性膨胀。

另一方面，新兴市场地区、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全球化浪潮中被不断地纳入由发达国家所主导的全球分工体系和生产链条中，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经济体日益成为全球生产制造基地和各类制成品出口基地。此时，凭借在全球金融体系中的主导地位，美国在用最低的成本支配和使用全球资源的同时，也将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经济体纳入到美元的环流之中。

“当今的货币制度赋予了美联储以全球中央银行的权利，却没有任何有效的责任制度约束。”张茉楠谈到，美国不负责任的货币政策已经导致全球系统性风险，环流当中的其他国家只能被迫承担通胀的煎熬。

2010年，中国前所未有的地感受到美元霸权的掠夺力量。

## 货币超发 + 经济“泡沫化”

有多位专家强调，此次物价突涨，除了国际通胀的输入和全球资本的流入，中国自身快速增长的广义货币供应量M2也是重要的推手。

“中央政府4万亿美元的紧急救助计划以及与之配套的相当宽松的货币政策，大大地增加了流通中的货币量。这些货币即使完全进入实体经济也不会一下子全部用掉，人们会为暂时闲置的资金寻找用途，这些货币会进入虚拟经济、流通领域、房地产市场，会整体地推高物价。”在有关专家看来，这是一个基本的经济学逻辑。

“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流动性也不是一时累积的。”因此，如果仅将中国市场上过剩的流动性怪罪于应对金融危机爆发的措施，仍有不足，这里有中国发展模式的必然性所在。

“这是一个常年货币超发的累积效果，不是某一个时点货币发多了，也不全是反危机这两年货币信贷膨胀的事。”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经济评价中心主任刘煜辉如此表示。

统计数据显示，自2002年以来中国广义货币供应量M2的年均增长率保持着23%的水平，截至2010年9月底，M2的供应总量达到了69.64万亿元，远超过美国的8.8万亿美元，成为全球第一，而GDP只有美国的1/3。

在西方经济学界，一般采用货币供应量和GDP的比值来衡量货币是否超发。目前来看，西方发达经济体的货币供应量和GDP的比值在1以下，而新兴市场国家则相对较高，货币供应量一般为GDP的1-1.5倍，超过2倍的很少。但到2010年9月底，中国的GDP总量为26.866万亿元，广义货币供应量M2是GDP的2.6倍。以此指标来衡量的话，中国的货币已经属于绝对超发。

那么，中国货币超发为何持续多年呢？在专家们看来，这里面首先是存在一个“货币被动超发”的问题。

“长期以来，中国经济增长对重工业的依赖性很高，我国目前的投资率超过40%，远高于其他国家水平。”张莱楠表示，大量投资的结果就是产能过剩，而过剩的产能只能由国外需求所吸纳，这就成就了“外贸依赖”。

如此一来，庞大的贸易顺差加上外国对华直接投资以及无孔不入的“热钱”，一起汇成进入中国的外汇洪流。在人民币稳定汇率目标的硬约束下，央行不得不动用基础货币大笔购汇，一方面形成巨量国家外汇储备，另一方面就对内转成越来越多的广义货币存量。

“从数据上看，自2003年开始，中国每年市场被注入的净头寸都是大剂量的。尽管这段时期中国央行很忙，但依然无法对冲掉外来之水。我们知道，这个注水泵叫‘外汇占款’。”刘煜辉说。

根据不久前公布的数据，2010年10月份，中国金融机构新增外汇占款高达5190.47亿元，创30个月来新高，环比大增79.27%。

对此，张莱楠直言，外汇占款占基础货币的比重已经达50%以上，成为影响我国基础货币供应最主要的因素，货币超发的外生性风险急剧放大。

不过，从更深层次分析，中国式的“货币超发”是由多年来经济发展的特点所决定的。

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发展迅猛，不仅原有的经济领域体量迅速增大，而且随着技术的发展和原有体制束缚的放松，不断涌现出新的经济增长点和新的市场领域，而这些都需要大量的货币发行作为支撑。

因此，依照西方经济理论所计算出的所谓“货币超发”，并不能完全解释中国经济的实际状况。对中国而言，一定程度的“货币超发”实际上是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而这就解释了为何此种行为虽持续了多年，却并没有必然地引发通胀。

那为何偏偏在此刻通胀压力却急剧加大了呢？

答案还需从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上来寻找。张莱楠分析认为，30多年来中国长期持续的高增长主要得益于“要素红利、市场化改革红利和全球化红利”的巨大贡献。

但是近年来，由于红利的减少，劳动力、土地、初级产品价格的上涨以及过剩产能之间的激烈竞争，使得制造业行业利润率越来越低，不仅靠实业起家的众多民营企业纷纷“逃离”实体经济，一些大型国企也“不甘寂寞”，当这些资产领域产生的预期利润率大大超过或者成倍超过制造业的利润率时，它就会导致制造业的空心化，从而引起大量资金“出逃”制造业。

“这意味着，作为经济植被的制造业和民间实体经济越来越贫瘠，整个经济的蓄水能力下滑，一遇到洪涝灾害，水就没地方去，一旦再挤压房地产，即使一点点的水，也会引发物价的泥石流。”

她强调，“本来，如果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能够顺利实现，经济就会重现健康高速增长的情形，过剩的流动性也会找到新的‘归宿’。但眼下，产业升级的过程并不顺利，超发的货币要么继续吹大泡沫，要么充当投机资金，结果都会加大通胀的压力。”

### 刘易斯拐点 + 要素价格回补

即便没有货币超发，中国依然有持续通胀的可能。

“当前的通胀压力在一定意义上是对长期以来失衡要素价格的一种回补。”张莱楠表示，从全球范围看，发展中国家由于工业基础相对落后，只能主要以原材料和初级加工产品与发达国家的深加工产品交换，而由于国际竞争激烈以及现有国际价格体系的问题，发展中国家产品被迫接受较低的价格，因此发展中国家的企业要想生存，只能寄希望于较低的生产要素价格，而中国也有类似的情况。



“这些生产要素包括成本较低的劳动力、低估的人民币及各种资源类生产要素。”她表示，这些价格被低估的生产要素成为近几年中国投资、出口快速增长的主要原因之一。

然而，情况正在发生改变。

比较流行的说法是，随着中国大规模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接近尾声，曾经的人口高红利时代或将面临终结。在此情况下，中国经济将面临经济学界所说的“刘易斯拐点”：即多数发展中国家要经历一个二元经济发展的过程，其突出的特征是农村劳动力的剩余为工业化提供廉价的劳动力供给，工资增长缓慢；这个过程将一直持续到劳动力从无限供给变为短缺，此时工业若要继续吸纳劳动力，就必须提高工资水平，从而推动社会总体通胀水平的提高。

从目前来看，国内城镇化水平已经接近50%，新增劳动力的减少正使得劳动力价格弹性增大。实际上，近年来工资上升加快正在一波接一波的“民工荒”浪潮当中显现出来，再加上政府对能源、资源价格机制理顺的要求以及节能环保成本的提高，都会对物价上升形成额外的推动力，并最终转变为真实的通胀感受。

“2003年以来，中国物价上涨的一大动力来自食品价格。”刘焯辉谈到，一般人很容易把农产品涨价与短期供求联系在一起，比如气候和自然灾害。

而中国农产品价格上涨的关键是存在趋势性因素——人工，“这就不难理解耗费劳动力大的农产品价格涨幅大，如棉花、蔬菜的价格涨幅远大于谷物的价格涨幅。”

但劳动力成本上升的背后，似乎不仅仅是由于渐行渐近的“刘易斯拐点”，更直接的原因，是近年来资产价格的大幅提高。

“当刘易斯拐点逼近之时，现代工业部门已经不能再用‘不变工资制’来吸收‘无限供给’的劳动力。而常年的货币超发所致的经济泡沫，使得这一切来得更加急促。本来中国的劳动力红利的释放或可以更均匀、更持续一些，甚至我们广袤的国土和区域差异可以使得这一过程有足够的纵深，但当下内地的土地等要素成本也在同时快速地上涨。”他说到，“我们不得不再回望货币泡沫，某种程度确是泡沫吞噬了中国的要素红利。”

### 调结构 + 降速度

从2010年11月中旬起，国家密集出台措施平抑物价，然而，行政手段只是临时措施，因此，为了应

对流动性过剩，经济手段也有了新的动作。于是，存款准备金率上调和加息接踵而至，货币政策正式从“适度宽松”转向“稳健”。

但，管理通胀预期，仍然需要战略性部署。

“我国的流动性过剩问题根基深、治理难度大。从目前对流动性成因和传导机制的分析，流动性尚无‘拐点’。短期内，央行可继续通过准备金率、央行票据、资本管控等手段遏制贷款扩张，抵御热钱，但是货币政策的操作空间和效果越来越不尽如人意。”她说。

更重要的一点在于，此次通胀压力加大的成因，不仅仅只源于过剩的流动性，更与我国长期以来的经济增长模式和当前的发展阶段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例如，当前要素价格上涨以及劳动力成本上涨都是中国经济发展从量变到质变的必经阶段。因此可以预见，中国在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都将面临价格上行的压力，并且这种价格上行可以说是不可避免的，而这也恰恰是国家上调2011年通胀预期指标的根本原因所在。

针对这一状况，有专家表示，要缓解劳动力成本上升给通胀预期造成的压力，就必须对现有的财富分配制度进行改革，让社会财富更多地向提高劳动者收入方向倾斜，这样既可以增加劳动者的收入，提高其应对通胀的能力，又可以在满足劳动力成本提升这一客观要求的同时，不至于推高未来通胀预期。

不过在张莱楠看来，从更长远的角度分析，未来中国要有效控制通胀，就必须重新审视未来宏观经济政策的立场，摆脱治理成本日益加大的对冲操作模式。要以解决内部失衡为主要着力点，化解引发中国通胀的结构性矛盾。

“管理通胀预期要实现由‘需求管理’向‘供给管理’转变。关键是要进行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通过技术创新来提高劳动生产率，提高劳动者在单位时间内创造的劳动价值，从而在真正意义上提高劳动者收入，让劳动者收入的提高跑赢通货膨胀，这才是正道。”

“虽然结构调整往往意味着经济主动地有效减速，但对于未来中国的发展而言，必须要忍受结构调整的阵痛期。”刘焯辉最后表示，“现在的发展速度是违背经济内生规律硬推上去的，若施以重手挤破泡沫，很多棘手的问题会立刻化身为幽灵从盖子下冒出来，在没有把握处理的情况下，只能捂住，但谁又能保证更长的时间内，这些幽灵不会进一步演变成更加难以对付的魔鬼呢？”

（摘自《瞭望新闻周刊》2010年第51期记者尚前名）

# CPI 分层编制更加符合国情

马涛

一个综合的 CPI 指标难以全面反映各收入阶层的真实生活成本和心理感受，应逐步按照居民的不同收入水平分层编制，与综合 CPI 共同构成“立体”的数据体系。这样既能反映总体消费价格变动趋势，也能反映各收入群体的实际情况，使各阶层能更准确地评估自身所处的经济环境，同时为政府制定相关政策提供重要依据

2010 年 10 月份的 CPI 数据引起了各方警觉：同比上升 4.4%，升幅在年内首次超过 4%，创 25 个月来的新高。但是，相对于诸多百姓对物价上涨的直观感受，这个数据似乎还“过于温和”。CPI 与居民感受不合拍，是不是“人为低估”了？对 CPI 真实性和科学性质疑的声音再次响起。笔者认为，分层编制 CPI 更加符合国情。

## 权重设置不尽合理

目前 CPI 的编制有两种理论框架，一种是生活费用指数理论，另一种是通货膨胀理论。我国采用前一种理论框架，CPI 主要反映“居民为维持一定生活水平所必需的消费成本的变化情况”。从 1994 年开始编制的中国 CPI，将商品和服务细分为食品、烟酒及用品、衣着、家庭设备用品及维修服务、医疗保健及个人用品、交通和通讯、娱乐教育文化用品及服务、居住 8 个大类，有 262 个基本分类、600 多个代表规格；8 个大类占 CPI 的权重，根据对 13 万户居民消费情况的实际调查得出。不过，国家统计局几乎不对外公布 CPI 各项构成的权重及其依据，缺乏透明度。

随着人民生活水平提高，消费结构不断发生着变化。为反映城乡居民家庭消费支出结构的变化，国家统计局每 5 年调整一次“篮子商品”，每年按照城乡居民消费调查资料及相关资料调整一次权重。根据年初国家统计局罕有的一次公布，2009 年食品类在 CPI 中的权重为 32.79%，居住类的权重为 14.69%，自有住房购买不计入指数。正因为各项构成的权重设置不尽合理，使得 CPI 与居民的真实生活感受有所偏离，最明显的差异，就是房价“火爆”时，CPI 却表现“冷静”。

## 平均数“削峰填谷”

CPI 数据与人们的感受有差异，更因为居民收

入和消费水平具有多层次性。CPI 是对全国范围内居民消费情况的衡量，是经过加权计算后得出的综合平均数。而我国的一大国情，是不同群体、不同区域的经济状况差异很大。不同收入水平的居民在消费能力、消费结构、消费水平和消费质量等方面有明显差异，物价波动给他们带来的感受是不同的。尽管几大类别的商品和服务的权重分配有侧重，但总不免“大而化之”，平均数“削峰填谷”，往往就把低收入群体的真实情况掩盖了。事实上，一个综合的 CPI 指标难以全面反映各收入阶层的真实生活成本和心理感受。

面对每月 11 日定时公布的 CPI，老百姓往往拿自己购买柴米油盐酱醋等的日常开支来作对比，当数据与感受出现差异时，他们大多相信自己的感受。在物价上涨压力很大的背景下，对 CPI 数据的普遍猜疑，会放大社会对通胀的恐慌，加大通胀预期管理的难度；而通胀预期会影响各类经济主体的市场行为，尤其是居民的消费以及投资行为。所以，如何使 CPI 数据更加贴近老百姓的真实感受，应是 CPI 编制改革的重点。

值得指出的是，CPI 对于宏观调控具有重要意义，它是度量经济状况的敏感指标之一，如果数据不准确，就会使政府出台的经济政策缺乏科学性和有效性。

## 宜推行“分层编制”

中国的 CPI 可望在 2011 年调整权重。针对目前其中消费品类权重过高、服务类权重过低，食品类权重过高、居住类权重过低等问题，理应对各大类商品和服务的权重作适当调整。据国家统计局官员透露，2011 年将启用新的权重方案，居住类、医疗保健类、娱乐教育文化类的权重将提高，食品类权重将下降。这一方面可以更真实地反映居民消费情况，另一方面也能更接近发达国家的 CPI 编制口

我国城镇人均建设用地居世界前列，而土地的产出效率却远低于发达国家水平

## 谁在“挥霍”珍贵的土地？

人多地少是我国的国情，我国人均占有耕地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43.26%，可以说土地资源十分紧缺。为了保障粮食安全，国家定下了守住18亿亩耕地面积的底线。而与此同时，我国城市化和工业化、生态建设对土地资源的需求也在不断增加，这便使得土地资源的供需矛盾日益尖锐。

然而，一个令人尴尬的现实是，与土地紧缺并存的，是同样严重的土地的闲置和浪费。我国在城市化和工业化过程中过多地占用了土地资源，而且土地利用十分粗放。其已经成为我国经济增长方式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的基础性障碍。

### 部分地方政府不切实际地扩大城市边界和规模，浪费了大量土地

内蒙古鄂尔多斯耗资50多亿打造面积达32平方公里的豪华新城，但因无人居住被称为“鬼城”；江西省县级市丰城市为建新城区非法征地损毁国家级商品粮基地耕地近万亩；陕西省扶风县违规圈地上千亩建设新城；内蒙古清水河县60亿违规建设新区……各地风起云涌的造城运动的背后是大片大片的土地被浪费被挥霍。

河南某市的一个区政府，大院里建有几座办公大楼，还有东湖、西湖，大院内外总占地面积上千亩。

而这样的事例在全国并不是孤例。

当前，部分地方政府自行设立开发区、高新技术园区、卫星城等新城，建设之初也并未经过严格的规划管理，由于后续运营和招商等措施的执行不力，造成大量占用优良耕地，严重影响了土地集约利用。

### 工矿及房地产用地规模快速扩张，但大量遭闲置

从国土资源部透露的信息来看，1997～2005年，我国新增建设用地中独立工矿用地比例基本稳定在40%以上，部分地区高达60%，高于房地产开发用地及其他各种类型用地。

然而，与此对应的却是大量工矿用地遭闲置。

2010年11月20日在北京举行的“2010低碳发展与土地复垦政策法律国际研讨会”上发布的《低碳发展与土地复垦政策法律研究报告》称，据粗略估算，目前中国因矿产资源开发等生产建设活动造成的破坏废弃的土地约2亿亩左右，约占耕地总面积的10%以上。

报告指出：近30年来，中国处于工业化、城镇化快速发展时期，工矿废弃地数量又大量增加，但大多数未得到及时复垦利用。这些被破坏的土地

径，便于国际比较。同时，我们也要改进统计方法、统计过程，完善样本数据，增加编制工作的透明度，减少公众对数据的猜疑。

由于收入水平差距较大，不同居民的消费支出权重有较大差异。因而在有些国家和地区，通常区分不同人群，统计和公布不同的消费者价格指数。如美国劳动统计局除编制总体的CPI指数，还编制工薪阶层的CPI指数(CPI-W)；中国香港地区则根据收入低、中、高分层，在综合价格指数外，分别公布CPI(A)、CPI(B)、CPI(C)三类指数。目前，北

京等地在定期发布综合CPI数据的同时，已发布低收入阶层CPI，而按照收入分层进一步细化的指数编制也在研究当中。

我国CPI应逐步按照居民的不同收入水平分层编制，与综合CPI共同构成“立体”的数据体系。这样既能反映总体消费价格变动趋势，也能反映各收入群体的实际情况，使各阶层能更准确地评估自身所处的经济环境，同时为政府制定相关政策提供重要依据。

(摘自2010年11月30日《文汇报》)

70%是耕地或其他农用地，多数还是土地质量很好的基本农田，集中连片，地理位置优越，一般都靠近城镇或村庄，交通便利，水资源等基础条件都比较好。耕地的减少，就导致失地农民的增多，土地利用效率降低、生态环境恶化，必然对农业农村的发展和农民的生存，进而对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造成严重影响。

此外，房地产开发土地利用方面同样存在着严重的浪费现象。

根据调查，到2004年底，全国城镇规划范围内共闲置土地107.9万亩，空闲土地84.2万亩，批而未供土地203.4万亩，三类土地总量为395.5万亩。而国土资源部2010年8月透露的数据显示，截至5月底，全国共上报闲置土地宗数2815宗，面积16.95万亩。如果按照这个数据，目前全国闲置的土地相当于三个澳门面积。而专家指出，还有大量的闲置土地未被查出或者未被公开。

### 我国城市人均用地远高于世界平均水平，土地的产出效率却远低于发达国家水平

记者了解到，我国各类自然资源普遍的状况是总量多，人均量少，但唯有城乡建设用地却与此不同，不但总量多，而且人均量也特别多。

资料显示，我国城镇人均建设用地达133平方米，远高于国际人均80多平方米的水平。

十届全国政协委员、原国家土地局副局长刘文甲接受采访时介绍：无论发达国家地区还是发展中国家地区，城市人均建设用地都少于85平方米。就拿我国来说，台湾省2300万人，城乡建设用地1900平方公里，人均83平方米。香港特别行政区1016平方公里土地，约600万人，城市建设用地为200多平方公里，人均30多平方米。

不仅如此，我国土地的产出效率也较低。

据全国政协委员任启兴介绍，就每平方公里建设用地的投资量而言，美国比我国高出2倍，德国比我国高出6倍，日本和英国则高出数十倍甚至上百倍。

另有数据显示：我国现在单位土地GDP最高的城市是深圳，一平方公里土地的产出是4亿元人民币，而东京是深圳的10倍，新加坡是深圳的4.5倍。

上海作为中国经济发展水平和资源利用效率最高的城市之一，人口密度超过了东京和首尔，仅次于

巴黎，但其土地的经济产出率仅是东京的7%，首尔的27%，巴黎的24%。

### 土地财政是城市扩张和占用农民土地的动力机制

建设用地的利用为什么如此粗放？北京大学土地科学中心主任蔡运龙认为：因为得地容易，所以过多占用土地资源而较少地投入劳动和资本。为什么得地容易？因为在中国征地容易，征地获得的好处大于违规可能承担的风险，以至于采取世界上最为严格耕地保护和土地管理政策的国家却是世界上农用地最容易被征用的国家。为什么征地容易？因为土地产权不明晰，农民对土地的用途没有发言权和决策权。

刘文甲则认为：我国法规上迄今还没有一个严格严密的土地用途管理制度，农用地尤其是耕地转为城镇用地很容易。同时，缺乏强有力的经济手段制约。实施土地有偿使用制度以来，占用耕地搞城镇建设成为当地政府“以地谋财”的财源。

地方政府从新增城镇建设用地有偿使用费中所获收益（主要是农用地与城镇建设用地两种用途的价差，不是利润）是相当大的。农业用地改变为非农建设用地，其地价则可能狂升百倍千倍以上。近几年，普遍施行土地招拍挂之后，获利水平更高。城镇建设用地增加之后，便长久而稳定地提供城镇土地使用税。城镇建设用地是土地财政的重要财源，是城镇政府极力扩大城镇建设用地规模的强大推动力量。

蔡运龙认为，必须扭转当前这种建设用地发展的方式，当前，土地问题的根本出路在于变外延式的粗放的土地利用方式为更集约的土地利用方式。他认为，提高地价能敦促土地使用者更加集约地利用土地。他因此建议，在政策引导之外，需通过建立合理的经济机制促进土地使用者的集约用地行为。土地包含经济产出、生态服务、社会保障等多种功能，需要建立新的土地价值评估体系，在地价中体现出土地的所有功能。在这样的新的评估体系下，总体地价将会有所上升。他认为，如果真正实现了土地的高价，在价格杠杆的作用下，土地利用将朝着更加集约的方向发展，土地需求的冲突就能得以解决。

（摘自2010年12月7日《人民政协报》记者朱奕）

# 中国能源可持续发展的一些战略思考

杜祥琬

我国可持续发展的能源发展战略,可概括为“科学、绿色、低碳能源战略”。“科学”是指在科学发展观指导下,在科技进步的支撑下,实现节能提效基础上的科学的能源供需平衡;“绿色”(环保)是指实现环境友好的能源开发和利用;“低碳”是指明显降低温室气体排放强度并控制温室气体排放的增长。污染排放和温室气体排放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因而,绿色和低碳也是两个有差异的概念,但在中国能源的具体情况下,二者在工作方向上高度一致:走向绿色和走向低碳并行不悖。

中国的科学、绿色、低碳能源战略可概括为:加快调控转型,强化节能优先,实行总量控制,保障合理需求,优化多元结构,实现绿色低碳,科技创新引领,系统经济高效。它由以下六个子战略构成。

## 战略之一:强化“节能优先、总量控制”战略

节能、提效、合理控制能源需求是能源战略之首。对我们这个人口大国,人均资源小国,必须确立“人均能耗应控制在显著低于发达国家水平”的战略思想,实现有控制的健康发展。基于对我国经济结构调整必要性和可能性的分析,对我国单位GDP能耗的分析和结构节能、工业节能、建筑节能、交通节能及社会消费节能潜力深入分析的结论表明,我国的节能提效不仅必要,而且可能。这项战略旨在使实现国家第三步战略目标的总能耗(特别是煤炭石油消耗“天花板”)最小化,以较低的能源弹性系数( $<0.5$ ,并随时间进一步降低)来支撑经济发展。

这里的控制目标,充分考虑了挖掘国内能源的科学产能潜力、可持续发展能力和合理的能源进口。其中,将2020年的总能耗控制在40亿吨标煤左右,

是一个十分困难又十分有意义的战略指标,在此期间,大力调整产业结构,控制高能耗产业,转变经济增长内容,把GDP年增长掌握在7%—8%左右,较为合理并有利于发展的质量、效率和环境友好。实现2020年的能耗总量控制目标,是转变发展方式实际成效的标志,将有力推动结构调整,也是实现我国应对气候变化承诺的关键。

## 战略之二:煤炭的科学开发和洁净、高效利用和战略地位调整

煤炭目前是我国主力能源,煤炭的洗选、开采和利用必须改变粗放形态,走安全、高效、环保的科学发 展道路,它在我国总能耗中的比重应该也可能逐步下降,2050年可望减至40%(甚至35%)以下,其战略地位将调整为重要的基础能源。应尽量降低煤炭消费增长速度,使煤炭消费总量尽早达到峰值,此后,总能源的增量将由清洁新能源补充。要树立“煤炭科学产能”的新概念,即采用先进的煤炭生产和高效利用技术,促进煤炭生产的安全度、煤炭的利用效率和洁净度较大幅度提高。根据科学产能的要求,合理的煤炭安全产能应该控制在30亿吨以内。煤的洁净化利用,不仅是一个战略方向,而且要成为可定量衡量和检查的指标。报告提出了煤炭“洁净化度”的概念和定量描述,可作为该行业的一个考核指标。报告给出了2020年、2030年和2050年应实现的“洁净化度”的参考值。

## 战略之三:确保石油、天然气的战略地位,把天然气作为能源结构调整的重点之一

确保石油在今后几十年的安全供应和能源支柱之一的稳定战略地位。石油国产每年2亿吨(或近2亿吨)可继续保持几十年,但我国石油储采比较低,

对外依存度将进一步走高。石油的战略方针是：大力节约，加强勘探，规模替代，积极进口（消费和战略储备）。

天然气（含煤层气、页岩气和天然气水合物等非常规天然气）是较洁净的化石能源，我国潜在资源较丰富，应该也可能大力发展，应把它放到能源结构调整的重点地位上来，增大其在我国能源中的比重。2030年可达到国内产天然气3000亿方，加上进口可达4000亿—5000亿方，将占到一次能源的10%以上，使其成为我国能源发展战略中的一个亮点和能源结构中的绿色支柱之一。

**战略之四：积极、加快、有序发展水电，大力发展非水可再生能源，使可再生能源战略地位逐步提升，成为我国的绿色能源支柱之一**

水电是2030年前可再生能源发展的第一重点。资源清晰、技术成熟，在国家政策上，应促进其积极、加快、有序发展。2020年、2030年和2050年可望达到装机3亿千瓦、4亿千瓦和4.5亿—5亿千瓦。

因地制宜，大力发展非水可再生能源。资源丰富，可利用的太阳能发电资源约20亿千瓦；风能资源大于10亿千瓦，陆上大于海上；生物质能资源约3亿吨标煤，并有培育的潜力。尽早使风能、太阳能、生物质能等成为绿色能源支柱。2020年前应重在核心能力的创新、技术经济瓶颈的突破，重点解决风电提高经济效益、太阳能光伏和光热发电降低成本、间歇性能源并网和纤维素液体燃料技术等，扎实打好基础，做好示范，逐步产业化、规模化。大力推广已有基础的太阳能热利用、生物沼气、积极发展海洋能、地热能。高度重视垃圾的分类资源化利用。实现我国农村的能源形态现代化。非水可再生能源在2020年、2030年和2050年的总贡献有可能分别达到2亿吨标煤、4亿吨标煤和8亿吨标煤左右。

可再生能源（水和非水）的战略地位将由目前的补充能源逐步上升为替代能源乃至主导能源之一。

**战略之五：积极发展核电是我国能源的长期重大战略选择，核电可以成为我国能源的一个绿色支柱**

经过国产和进口并举努力，铀资源不构成对我国核能发展的根本制约因素，核电的安全性和洁净性可以保证。核能按照压水堆—快堆—聚变堆“三部曲”的基本路线图，可实现长期可持续发展。需要高度重视从核资源—核燃料循环—核电站—后处理到核废物全产业链的配套协调发展。在目前压水堆为主的发展阶段，应充分发挥已成熟的二代改进型的作用，发展沿海和内陆电站，同时积极试验和掌握三代技术，同时，推动中国快堆技术加快发展。2020年核电可望达到建成7000万千瓦，使核能和可再生能源的总和占到总能源的15%以上。2030年核电达到2亿千瓦，2050年达到4亿千瓦以上。2050年，核能将可以提供15%以上的一次能源。之后，核电将继续发展，成为我国未来的主要能源之一。

**战略之六：发展中国特色的高效安全（智能）电力系统，适应新能源的分布式等用电方式和储能技术**

我国的能源结构中，电力所占的比重将逐渐增加，而在电力结构中，非火电的比例将逐步增加，而煤电在电力中的比重将逐步下降，2050年可降至35%左右。

电力发展面临需求不确定性增大，电源多元化，输配电运行条件日趋复杂。建议政府主管部门牵头，多方参与，分析不同方案，通过科学论证，特别是安全性、经济性论证，做好中国电力发展的规划和电网架构的规划；利用信息技术与电网技术的结合，建设信息化、自动化、互动化的智能电网，达到提高电网的效率、安全性，也使电网有效接纳新能源的目标；做好“风、光、储、输、用”示范工程；重视风电和光电的非上网和分布式用电方式；多种技术并举发展储能技术。

（摘自2010年11月22日《科学时报》）

研究报告指出,假如全球都像美国人那样生活,那么需要4.5个地球才能满足人类的消费需求 and 消纳 CO<sub>2</sub> 的排放;假如要像印度人那样生活,则只需半个地球;假如像中国人那样生活,则全球需要——

## 1.2 个地球才能维系中国式生存

- 2007 年全球人类需要 1.5 个地球来满足其需求。也就是说,地球要用一年半的时间来产生当年使用的资源及吸收当年排放的二氧化碳。

- 作为生态足迹的最大组成部分,过去的 50 年里,碳足迹增加了 11 倍。目前,碳足迹占全球生态足迹的一半以上。

- 我国的碳足迹占生态足迹的 54%,其增长主要来自于对住房、交通、商品消费和服务供给等能源相关碳足迹的增长。2008 年,上海、北京和天津这 3 个直辖市以及工业大省山东,碳足迹的比重超过了 65%。

- 2008 年人均生态足迹北京最高,云南最低。1985—2008 年,上海、北京、天津、广东和重庆的人均生态足迹增幅最大。但与 2000—2005 年期间相比,2005—2008 年期间多数省份的生态足迹增长速度有所减缓。

一个来自 IPCC(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的预测告诉我们,假设我们人均需求的能源不增长的话,到本世纪末,大气中的温室气体浓度可能会达到 800—1100PPMV(按体积计算百万分之一,即 1 立方米气体中含温室气体 800—1100 毫升),这个数字意味着温室效应会更强,全球气温大概要升高 6 度。而全球升温一旦达到 6 度,那么就有数据显示,地球上可能会有 95% 的物种灭绝,这将是一场比核战争与化学武器更可怕的没有赢家的战争。

### 目标: 400ppm 和 2 度

为了避免那样一个夏天的出现,两个目标是关键。把地球的温升控制在两度以下,以及把大气中的温室气体浓度控制在 400ppm 以下。换算成一个更容易理解的目标,也就是说到 2050 年,地球上总的碳排放总量应该比 1991 年减少 80%。为了达到这个目标,减少对能源的需求,同时加大可再生能源比例是我们最后的选择。

全球能源消耗现状如何呢?11 月 15 日由世界自

然基金会(WWF)和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CCICED)联合发布的《中国生态足迹报告 2010》指出,2007 年全球人类需要 1.5 个地球来满足其需求,也就是说,地球要用一年半的时间来产生当年使用的资源及吸收当年排放的二氧化碳。

报告同时还指出,人均生态足迹表明,不同国家对生态系统的需求量差别非常大。同样以上面的方法计算,如果世界上的每个人都按美国或者阿联酋国民的平均生活水平生活,那么需要多于 4.5 个地球提供的生态承载能力才能满足人类的消费需求和消纳 CO<sub>2</sub> 的排放。相反,如果每个人按照印度国民的生活水平生活,不足半个地球的生态承载力即能满足人类的需求。

把我国放在这一指标体系中比对,如果全球按照中国人 2007 年资源消费和排放二氧化碳的平均生活水平生活,那么全人类需要 1.2 个地球。

### 中国的未来

这能成为我们乐观的理由吗?虽然与大多数发

达国家相比，中国的生态足迹没有想象中的那么糟糕，但作为一个能源消耗大国，再加上人口众多，这样的发展趋势还是令人堪忧。报告指出，中国要想在继续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同时，实现不透支地球资源的目标，那么，解决碳排放和城镇化问题至关重要。

过去的30年里，随着经济的发展，中国的人均收入增长了50多倍。然而，迅速的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集约化也增加了对自然资源的压力。“人类的生存与发展依赖于自然环境。在社会经济高度发展的今天，环境问题日益成为制约经济发展的瓶颈。”中国环境和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秘书长祝光耀说：“未来20年将是中国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时期。中国政府深知这一点，并以加速建设一个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为目标。”

作为生态足迹的最大组成部分，过去的50年里，碳足迹增加了11倍。目前，碳足迹占全球生态足迹的一半以上。我国的碳足迹占生态足迹的54%。与全球生态足迹的组成相似，我国生态足迹的增长也主要由碳足迹增长引起。并且碳足迹的增长主要来自于对住房、交通、商品消费和服务供给等能源相关碳足迹的增长。2008年，与这些领域相关的碳足迹，在中国29个省级行政区的总体生态足迹中超过50%。其中，上海、北京和天津这3个直辖市以及工业大省山东，碳足迹的比重超过了65%。

特别值得关注的是，如果将生物质产品和工业制成品进出口进行完全生态足迹核算的话，中国不仅是商品贸易净出口国，也是生物承载力净出口国。中国进口包含的生物质生物承载力中只有约20%用于直接消费，35%用于国内贸易再分配，45%用于国际贸易再分配。也就是说，作为世界加工厂，中国为世界承担着巨大的碳排放压力。中国的可持续发展进程面临更加严重的挑战。

除了碳足迹分析，此次报告中还创造性地加入了水足迹分析。我国人均消费水足迹不到全球人均水平的一半，对水资源的消费总体上相对节约和高效。但是，水足迹分布存在地区差异性，我国的水资源压力主要集中在华北、华中和黄河及长江下游

地区。而这些地区也正是人口密集城市集中的地区。

报告还指出，碳排放、城镇化和个人富裕程度成为影响中国生态足迹的主要因素。城乡间的生态足迹差距主要源于收入差距及其导致的消费和能源使用差异。在人均GDP超过人民币3万元（约4500美元）的省份，人均生态足迹与人均GDP呈现非常明显的正相关关系。在我国，高收入人群绝大多数分布在城镇，城镇地区的生态足迹是其周边农村地区的1.4—2.5倍。不同城市之间比较，2008年人均生态足迹北京最高，云南最低。1985—2008年，上海、北京、天津、广东和重庆的人均生态足迹增幅最大。

有积极的迹象显示我国正致力于实现可持续发展。与2000—2005年期间相比，2005—2008年期间多数省份的生态足迹增长速度有所减缓。在北京，这个趋势归功于更稳定的城市化速度、节能措施，以及从制造业向服务业的经济转型。然而，考虑到人均生态资源稀缺、且正处于经济快速发展阶段的现状，我国生态足迹增加的速度仍然远高于生物承载力的增长速度。

### ·相关链接·

**碳足迹：**标示一个人或者团体的“碳耗用量”。“碳”，就是石油、煤炭、木材等由碳元素构成的自然资源。“碳”耗用得越多，导致地球暖化的元凶“二氧化碳”也制造得多，“碳足迹”就大，反之“碳足迹”就小。

**生态足迹：**通过比较人类对资源的需求和地球资源的可再生能力，来刻画人类对生物圈资源的竞争性需求。包括提供人类所消费资源所需要的生物生产性面积、基础设施所占用的土地面积以及吸收废弃物土地面积之和。

**生态承载力：**满足生态足迹需求的所有可用的可再生能力。

**地球生命力指数：**通过追踪将近8000个脊椎动物物种种群的变化趋势，反映地球生态系统健康的变化情况。

（摘自2010年11月23日《中国经济导报》）



## 增温6℃是人类存亡的临界点

《改变世界的6℃》的影片制作人、畅销书《6度》的作者、英国记者、科学顾问马克·莱纳斯，在5年前某个晚上即将入睡时突然想到，如果地球温度继续升高，每升高1℃，会对人类造成什么影响？莱纳斯花了两年时间，阅读数千篇科学论文，走访数个国家。他发现，6℃是人类存亡的临界点，增温6℃，地球就会变成炼狱。

或许我们可以忍受地球增温一两度，但超过两度，人类无法承受；增温五六度，生态系统承受不了，人类无法存活。千万不要以为这很遥远，最糟的状况，或许我们的下一代就会看到。到那个时候，现在的6岁孩童都已60岁了，他们会看到全球变暖失控的局面。

增温幅度必须控制在1.5℃以下，二氧化碳浓度要控制在350PPM以下（目前为385PPM，为65万年以来最高）。我们已在警戒范围内。当地球增温两度，气候又热又干，亚马逊盆地和雨林会崩溃。亚马逊是地球的肺，它崩溃了，地球就会无法呼吸。地球的平均温度升高1℃到6℃，对世界与人类会造成什么影响？以下是莱纳斯预测的结果：

**增温低于2℃**：北极冰帽消失，剧烈改变地球的能量平衡，北极熊可能无家可归。因海水温度上升，热带地区珊瑚礁严重白化、死亡，破坏海洋生物多样性。澳大利亚大堡礁面临死亡命运。干旱蔓延亚热带地区，伴随热浪与森林大火。受影响最大的是地中海周遭、美国西南部、非洲南部与大洋洲。预期在2030年或更早就会发生。

**增温2℃到3℃**：2003年席卷欧洲造成3万人

死亡的夏季热浪，每年都将出现，英国南部的夏季温度将超过40℃。亚马逊雨林跨越临界点，发生大规模森林野火，雨林将被沙漠和稀树草原取代。二氧化碳浓度过高造成海水酸化，摧毁剩余的珊瑚礁，多数浮游生物灭绝，破坏海洋食物链，鲭鱼、须鲸等面临绝种危机。格陵兰冰原消失，海平面上升7米。

**增温3℃到4℃**：高山冰川融化，使得下游城市与农田无水可用，受影响最大的是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秘鲁、巴基斯坦与中国。欧洲、亚洲与美国受干旱、热浪之苦，农作物大面积受损，全球粮食供应出现危机。瑞士夏季温度可能突破48℃，伦敦周遭夏季温度将达45℃。

**增温4℃到5℃**：西伯利亚冻土层溶化，释放大量甲烷（甲烷造成的温室效应比二氧化碳高25倍），加速全球变暖速度。南欧、北非、中东与其他亚热带地区因极端热浪与干旱而不适合农作物生长，人类往极地区迁徙。安第斯山脉、阿尔卑斯山、洛基山脉冰川消失。

**增温5℃到6℃**：地球温度已是过去5000万年最高，北极地区温度高于20℃，全年无冰。热带地区、亚热带地区与部分中纬度地区，热得不适合人居住。沙漠入侵中欧，甚至接近北极圈，海平面急速上升，多数沿海城市成为废墟。

**增温6℃或更高**：全球变暖失控，海洋生物大半死亡，气候难民只能待在高原与极地，全球人口大减，90%物种可能灭绝，情境有如地球45亿年历史中的几次大灭绝。

（摘自2010年11月22日《中国人口报》）

## 国际碳交易怎么结算?

韦 起

**碳交易**:为促进全球温室气体减排,减少全球二氧化碳排放所采用的市场机制。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通过艰难谈判,于1992年5月9日通过了《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1997年12月于日本京都通过了《公约》的第一个附加协议,即《京都议定书》,把市场机制作为解决二氧化碳为代表的温室气体减排问题的新路径,即把二氧化碳排放权作为一种商品,从而形成了二氧化碳排放权的交易。

**结算货币**:世界上认可度高的货币,如美元、欧元、日元、英镑等。2009年7月6日,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首笔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业务同时启动,标志着人民币在国际贸易结算中的地位已经从计价货币升至结算货币。

《京都议定书》正式生效之后,全球碳交易市场急剧扩张。碳交易量从2006年的16亿吨跃升到2009年的87亿吨,交易额达到1440亿美元。据联合国和世界银行预测,碳交易市场有望超过石油市场成为世界第一大市场,碳排放权成为世界大宗商品也指日可待。随着碳交易市场的快速增长,碳交易结算货币的选择成为一个重要议题。

碳交易结算货币是指在全球碳排放权交易中,由于其币值的稳定性、流动性和安全性较好而被交易者广泛接受和使用的货币,具体用于碳排放权的计价、支付等。成为结算货币是一国货币国际化的起点,在一国货币国际化的进程中,货币发行国将会得到巨大的收益和更高的国际地位。正是由于巨大的利益空间,很多国家都为本国货币能成为碳交易结算货币展开了新一轮的博弈。

在这一轮充当碳交易结算货币的博弈中,欧元起步较早优势明显,美元依靠其传统地位也占据了有利地位,二者呈鼎力之势,其他货币如英镑、日元、卢比、卢布等虽然所占市场份额相对较少,但仍具有很大的提升空间。

**欧元**:欧盟是较早开展碳排放权交易的经

济实体之一,从以欧元计价的碳交易额来看,欧元在碳交易结算货币的选择中占有优势地位。主要有几个原因:一是碳排放权资源占有额度较大。根据国际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现状,欧盟市场EU、ETS所拥有的碳排放权占世界总份额的比例相当巨大,巨大的占有量决定了全球超过60%的可用于交易的碳排放权与欧元挂钩。二是具有技术、资金优势。CDM市场中,虽然碳排放权供应国多为发展中国家,但由于欧洲发达国家凭借其在技术、资金上的优势通过CDM项目合同的订立,控制可交易的碳排放权资源,从而使发达国家可以选取对自己有利的货币如欧元进行结算。三是金融市场体系完善。由于碳排放权交易不仅在一级市场进行,同时也在二级市场上进行,且二级金融市场在碳交易中占有的份额较大,一国金融市场的完善程度直接影响了该国的碳排放权交易,金融市场越完善、效率越高的国家越容易使其交易中的碳排放权与本国货币或对本国有利的货币挂钩;此外,碳金融衍生产品的种类和质量也决定了一国是否能在国家碳排放权交易中处于主导地位。欧盟成员国无疑在金融体系方面是比较完善的,因而欧元

成为碳交易结算货币具有较强的金融支撑。

**美元：**美元是目前仅次于欧元的碳交易结算货币。虽然美国尚未签订《京都议定书》，也就没有强制减排义务，拥有的碳权资源也就相对有限，但这并不影响美元成为碳交易结算的主要币种之一，原因如下：一是全球碳交易机制的原因。目前全球发展中国家大都没有减排义务，因而计价结算大多选择美元，这客观上提升了碳交易美元计价结算的比例。二是美元的传统优势地位。在国际贸易中，各国货币地位和货币特性存在着差异，而各国也习惯于选择那些币值稳定、流动性强的优质货币用于本国国际贸易的结算。这种主导货币的“在位优势”或货币锁定现象在碳排放权交易中也存在，使得美元等相对优质的货币成为多数国家在碳交易结算中选择的货币。三是金融市场发达和资金技术实力雄厚。美国毫无疑问拥有全球最发达的金融市场，同时也拥有着最顶尖的金融衍生品研发人员和交易机制，使得美国在碳期权、期货、碳基金等金融创新产品的交易中处于主导地位。

**其他结算货币：**如英镑、日元、卢比、卢布等，也在碳交易中占据一定份额，但不能成为碳交易的主要结算货币，主要原因如下：首先，由于本身有减排义务，碳排放资源占有额度较小，能用于交易的碳排放权很少，所以以这些国家货币进行计价结算的货币份额也就较小，如英国、日本；其次，由于缺乏完善的金融市场和碳交易所，JI 市场中主要的碳排放权供应国俄罗斯、乌克兰等国并没有掌握碳交易结算货币的选择权；最后，金融市场不够发达，碳交易风险不能通过发达的金融市场有效化解，如印度。

在全球碳交易排放权供应国中，中国拥有超过 60% 的市场，但人民币成为碳交易结算货币的时机尚未成熟。究其原因，我国碳金融市场体系的不完善以及减排技术的落后是主要影响因素。

首先，我国金融市场不完善，在二级 CERs

市场上几乎不占份额也没有话语权，使得我国的 CERs 不仅价格较低，也使得我国在国际金融市场上丧失了选择碳交易结算货币的权力。

其次，我国关于碳排放权交易的法律和政策领域几乎是空白，法律和政策上的缺陷不利于保障国内参与碳交易企业的权利，从而使国内碳交易企业在参与 CDM 交易时处于被动地位，买方和卖方地位上的差异不利于我国国内企业选择本国货币作为碳交易结算货币。

再次，我国的碳减排技术跟发达国家相比相对落后，技术上的主导权和选择权的丧失造成了我们碳交易结算货币选择权的缺失。

最后，到目前为止，我国虽然实现了人民币经常账户下的可自由兑换，但资本账户下的交易仍受到较大的限制，从而限制了人民币成为国际碳交易结算货币的能力。

在当前的国际碳交易市场上，人民币如果不能及时赶超其他货币，将有可能失去成为碳交易结算货币进而成为国际货币的机会。助推人民币成为碳交易结算货币，促进人民币国际化进程，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一是完善我国碳金融市场，为我国碳交易提供更多的金融支持，建立全国性的碳排放权交易所，逐步掌控碳排放资源的定价权，鼓励我国金融机构广泛参与国际碳交易，提高人民币在国际碳交易市场中的地位，增强我国金融机构在二级 CERs 市场上的话语权；二是填补我国在碳交易法律政策上的空白，使我国企业在选择碳交易结算货币时有法可依；三是鼓励我国自主碳减排技术的研发，摆脱发达国家的技术垄断，从而掌握碳交易结算货币的选择权；四是适度放松人民币在经常项目上的可自由兑换，通过货币互换等手段增强人民币的流动性，稳定汇率，保证币值，借助国际碳交易扩大人民币跨境结算的范围，帮助人民币成为国际碳交易结算货币。

（摘自 2010 年 11 月 22 日《光明日报》）

# 落实体面劳动是实现包容性增长的关键

秦建国

落实“体面劳动”实现包容性增长是对劳动者的尊重，是人类社会文明发展与进步的体现。结合我国目前的实际国情，做好以下几个方面非常重要：

1. 政府主动转变相关治理社会的理念，为落实“体面劳动”实现包容性增长提供一个良好的社会环境。

政府要把落实“体面劳动”作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战略的出发点，加强政府引导，完善市场就业机制，改善就业结构；改革收入分配制度和规范收入分配秩序，在生产过程的初次分配中就实现公平与效率的统一，增加劳动者收入，让劳动者能分享经济社会发展带来的好处；努力控制失业率和增加新增就业机会，制定并实施有利于扩大就业机会的社会经济政策，努力创造就业岗位，发展就业服务，采取灵活多样的就业形式，促进劳动者就业；完善支持自主创业、自谋职业政策，采取有效措施，帮助非正式经济中的就业人员解决政策、信贷、社会服务、劳动条件等问题；维护就业公平，保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建立和完善社会保障制度，使劳动者在任何情况下，其生老病死问题都能得到基本的保障；建立统一规范的人力资源市场，形成城乡劳动者平等就业的制度。

2. 强调企业的社会责任，全面落实“体面劳动”实现包容性增长。

企业是落实“体面劳动”实现包容性增长的微观主体，它们在为股东谋取最大利润的同时，应该充分考虑社会责任，关心利益相关者的利益：主要包括人权、劳工权益和环境三个方面，其中劳工权益是核心。企业应该主动改善那些处于不利地位劳动者群体的就业环境和劳动条件，提高他们的生活条件，给予他们更多人性化的关怀，让他们充分享受各项权益，体面地劳动。

对此，我们要强化市场惩处机制，促使企业主动地承担社会责任，改善劳动条件和劳工状况；提高企业经营者的劳动保障法律意识和企业管理水平，使得尊重劳工的基本生存、社会和工作权利，营造良好的工作和生活环境，逐渐成为一种

共识。

3. 大力发展教育培训，为落实“体面劳动”实现包容性增长奠定基础。

科学技术的发展需要更高的智力，这使得工作场所中的体力劳动不断被知识工人所取代，并要求我们大力发展高等教育，发展职业教育和就业培训，不断提高劳动者的科学文化素质和思想道德素质，满足知识经济时代对人才的越来越高的要求。通过教育程度的提高，促进劳动者岗位的可获得性、流动性；同时加大劳动者的法律知识教育，提高劳动者的法律和维权意识，帮助劳动者正确判断雇主行为的合法与否，并及时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落实“体面劳动”实现包容性增长。

4. 努力推进就业方式的创新，全面落实“体面劳动”实现包容性增长。

落实“体面劳动”实现包容性增长需要更多的就业机会，对此，我们在产业类型上注重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在企业规模上注重扶持中小企业，在经济类型上注重发展非公有制企业，在就业方式上，注重采取灵活多样的形式。目前还要尽快研究制定与包括劳务派遣、自由职业等灵活就业方式相适应的劳动关系、工资报酬、社会保险及争议处理等政策措施，保障劳动者的合法权益，真正落实就业方式的创新，落实“体面劳动”实现包容性增长。

5. 建立健全完备的劳动法律体系，为落实“体面劳动”实现包容性增长提供保障。

我们应该尽快建立起完备的劳动法律体系，出台并完善专门的调整劳动关系的法律，完善劳动标准体系，使得劳动者的权益得到全方位的保护。扩大劳动法的适用范围，将各种不同所有制经济类型企业的劳动者、事业单位和社会团体的劳动者均纳入劳动法范围，使其在同等条件下平等竞争，无差别地得到法律的同等保护。强化平等协商和集体合同制度、完善劳动争议处理制度、建立健全“三方”协商机制来推动社会对话和解决冲突。

（摘自2010年11月29日《中国改革报》）

# 实现体面劳动存在的问题

许振华 赵秀莹

## 体面劳动包含的基本内容

体面劳动基本内涵有以下九个方面：

一是政治权利。劳动者应得到国家和全社会的尊重，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依照法律被剥夺政治权利的除外），有宗教信仰自由，人格尊严不受侵犯，以及《宪法》等法律法规规定的各项政治权利。

二是劳动报酬权。劳动者付出劳动，应得到相应的报酬，数额应不低于本地区、本行业的最低工资标准，企业应做到不拖不欠定期发放，并且随着效益的提高而增加。

三是劳动保障权。不论国有、集体、个体私营还是外资企业，都要按照《劳动法》、《劳动合同法》的有关规定与劳动者签订劳动合同，为劳动者缴纳养老、医疗、工伤、生育、失业等社会保险。

四是知情参与权。劳动者对用人单位的性质、生产经营状况、发展状况、公司结构、重大事项特别是涉及劳动者切身利益的重大事项等都有知情权，用人单位要定期向劳动者公开通报，并就涉及劳动者利益的决策、制度等重大事项的出台事先征求劳动者的意见。

五是发展权。对劳动者的技能、素质及个人的成长进步，用人单位应提供必要的条件、合理的经费和相应的设施，为劳动者提供成长发展平台，让劳动者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

六是休息休假权。劳动者的工作时间要严格按照《劳动法》的规定不得超时，国家法定的节假日应得到休息，确实需要加班应征得劳动者同意，并按规定发放加班工资或调休。

七是劳动安全保护权。企事业单位应给劳动者提供安全的工作设施、劳动工具和工作环境，劳动者有对自己的劳动环境和工作条件提出合理要求的权利。

八是就业择业权。要创造更多体面的工作岗位，保障劳动者的就业权，充分尊重劳动者意愿，对劳动者提出调整工作岗位应协商满足。

九是文化娱乐权。企业要经常组织劳动者开展丰

富多彩的文化体育活动。

## 当前体面劳动存在的主要问题及原因

当前，体面劳动在我国总体落实是好的，但在一些细节上还存在许多问题，有的还比较严重，引起这些问题的原因主要有以下三方面：

有法不依失去了体面劳动的根基。目前，在我国法律体系中，从《宪法》到《工会法》、《劳动法》、《劳动合同法》、《就业促进法》、《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等法律法规，都明确规定了劳动者享有的各项权利，但不久前我们对辖区内的4家外资企业、5家改制企业、7家民营企业、4家民营医院进行劳动者权益落实情况的抽查，发现各用人单位均程度不等地存在侵犯职工合法权益的现象，主要表现在劳动合同签订不规范、职工工资待遇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加班费不落实、社会保险缴纳不全、工作环境不安全、不卫生等等。

执法不严妨碍了体面劳动的推行。当出现侵害职工合法权益情况时，有的执法部门得过且过，特别是劳动保障执法监察不到位，职工不告不查，有的职工上告反映也久拖不查，有的即使查了，但处理不及时不到位，还有的偏袒资方。一些地方的劳动保障执法监察部门没有建立有效的防范和查处机制，没有定期对用人单位劳动用工情况进行检查，劳动监察力度和对违法行为的处罚力度不够，存在明显的执法不严。

维权不力影响了体面劳动的落实。我国劳动力市场的现状是强资本弱劳力，劳动者在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时不敢积极维权，从而也影响了体面劳动的落实。劳动者不敢维权、不积极维权有多方面原因，主要是害怕丧失岗位、丢掉饭碗。工会组织是职工合法权益的代表者和维护者，但是，当前工会代表职工与企业开展工资集体协商、签订集体合同还很不普遍，工会在协调劳动关系中的独特优势和作用发挥得还很不够。

（摘自2010年11月30日《工人日报》）

## 劳动者报酬偏低的不后果

陈文通

判断劳动者报酬比重是高是低，有一个客观的标准，就是这个比重在同一类国家的平均数值和全世界的平均数值。这个平均数值主要是以资本和雇佣劳动的关系为基础的，因而是市场经济的标准，而不是计划经济的标准。

根据全国总工会提供的数据，我国居民劳动报酬的比重1983年为56.5%，2005年下降到36.7%，下降了近20个百分点；1978年—2005年，资本报酬则上升了20个百分点。根据广东省提供的劳动者报酬比重数据，1978年—1983年在60%以上；1984年—1994年在60%和50%之间；1995年—2003年在50%和40%之间；2004年以来不足40%。2000年、2006年、2008年分别为45.5%、38.7%、39.2%。大体来说，这个比重呈下降趋势，20年中下降了20个百分点左右，和全国的平均数值是一致的。由国际比较可以得出结论：我国劳动者报酬比重在80年代初是适当的，而后来一路下降，目前比国际社会的平均数值低20个百分点左右，这是不正常的。

在国民收入初次分配中，劳动者报酬偏低，意味着固定资产折旧、生产税净额和营业盈余的比重偏高，意味着初次分配向企业和政府倾斜。企业和政府因此而增加的收入，将主要转化为资本积累和新的投资，并形成固定资产。

劳动者报酬偏低必将带来一系列直接或者间接的不后果——

第一，劳动者报酬是居民收入的基本组成部分，由于比重偏低，直接导致居民收入的比重偏低，从而导致居民消费的能力偏低。

第二，居民消费能力偏低，总体上表现为居民消费需求不足，从而导致内需不足和国内市场相对狭小。

第三，内需不足和国内市场相对狭小，一方面导致全社会总体产能过剩和产品库存积压；另一方面必然迫使企业过度依靠出口，社会经济增长过度依赖外需。

第四，企业在技术、创新、质量、管理等方面缺乏国际竞争力的情况下，不得不低价倾销，而要想

获得微薄的利润，就必须进一步压低工人的工资和劳动者报酬。

第五，企业既然可以依赖低工资生存，其落后的技术则免于被淘汰，从而起到了保护落后和助长粗放增长的作用。

第六，在剩余价值规律和资本积累规律的作用下，市场经济国家普遍存在生产相对过剩的问题，从而孕育着经济危机，一旦爆发国际性的经济危机（往往首先会表现为金融危机），国际市场的需求（包括虚假需求）就会大幅度下降，贸易保护主义就会抬头，出口就会相对地或绝对地下降，过分依赖外需就不再可行，经济增长也会因此而大幅度下降。

第七，这时候，要想仍然保持比较高的增长速度，只有一个可能的办法，就是大幅度地增加固定资产投资，以投资的增加弥补出口的下降。但在产能过剩已经普遍存在的情况下，投资主体必然主要是各级政府 and 国有企业，而不是私人投资者；这种新的投资必然主要是投向可以立竿见影的房地产开发、城市建设、基础设施建设和重工业项目。这些项目中的一部分可能是超前的，并不符合科学发展的要求。

第八，“保增长”必须有资金支持。为此，一方面，必须实施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贷款和货币供给必然超常增加，因而，资产泡沫和通货膨胀必然不断加速积累；另一方面，必然忽视代价产生的负效应，放宽对土地占用的控制和降低对环境保护的要求。

第九，从“保增长”的短期目标出发，所有的政策措施，必将进一步向工业、交通和城市倾斜，而农业和一般居民服务业则进一步被削弱。总的结果是，产业结构进一步扭曲，比例关系进一步失调，收入差距进一步扩大，经济秩序也会出现混乱。这是一个从片面追求高速度出发、从压低劳动者报酬开始的恶性循环。

由上可见，努力提高劳动者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将其提高到正常水平，是科学发展的内在要求，是转变发展方式的突破口和关键点。

（摘自2010年11月15日《中国青年报》）

- 健全的国家医疗责任保险制度
- 严格的医生上岗制度
- 建立对医疗机构的评估制度
- 设立专门的法庭审理医疗诉讼

## 四管齐下解开医患疙瘩

杨红兵

医患矛盾一直是令社会纠结的问题，不时发生矛盾升级事件。然而，医患关系并非天生的对立矛盾体。在国外，医务人员是非常受尊重的，医患之间是一种融洽的朋友式关系，医务人员把疾病的发展、转归、预后告诉患者，患者也能理解医学的局限性。如此和谐的医患关系得益于科学、严格的医疗制度。纾解之策就是构建一个刚性的制度性渠道，让利益诉求与表达找到一个出口。

如何建立完善科学的医疗管理制度呢？依笔者之见，可从保险、上岗、评估、司法四个层面来规范：

健全的国家医疗责任保险制度。如果该案例在美国发生，负责解决纠纷的不是政府，而是由第三方保险公司与患者交涉，保险公司派专人负责对事件的责任进行认定。如果属于院方的责任，则由保险公司对患者进行赔偿，鉴于此，患者不会去找医生纠缠。

这种机制也对医生具有很大的约束作用，因为一旦出现事故，医生的保险系数就会降低，明年再投保时，保费就要提高，出的事故越多，保费金额越高，这就迫使医生规范自己的医疗行为。反观国内，尚未建构类似的保险制度，而且患者对解决纠纷的途径与方法不满意，因此一旦发生事故，医生与患者之间的纠葛就没完没了。

严格的医生上岗制度。在美国，高中毕业后要先上非医学类的大学，毕业后才能报考医学院校，医学院校毕业后，要在上级医生的指导下经过5年的在职培养。如果是从事高精尖学科，还要再经过3

年培养，才能成为临床医生。在此之前，是不得单独行医的。

我们一般是高中毕业直接进入医学院，大学毕业后就成为住院医师。对于这样的医生多长时间内不允许独立行医有明确的规定，主要由指导老师衡量，遇到忙的时候，有的指导老师便会放手让学生做。鉴于此，国家应加强统一的考核，规定一定的标准，才可以获得手术许可证。

建立对医疗机构的评估制度。在日本，医患关系非常融洽，病人相信医生，积极配合治疗，医生信心十足，全身心为病人诊治。这主要得益于评估制度监督，它有五大指标，即医疗记录严格管理；对患者实行主治医生责任制；每个病例进行了认真研究；医生进修制度；患者权利有明文规定。每个指标分五个等级。评估结果上网公布，评估合格发给合格证书。患者根据评估结果选择优质医疗的同时，又增加了对医生的信赖。

在我国评估医疗机构往往是由上级主管部门说了算，缺少来自民间的评估声音，评估结果往往是主管部门知道，相关单位明晓，惟有百姓一无所知。譬如患者反馈的信息，也往往是表面文章，缺乏有力监督、评估机制跟进。基于此，我国应加强医疗评估机构的建设，充分开放评估渠道，公开透明评估结果，给予患者和医生充分的信任和宽松的环境。

设立专门的法庭审理医疗诉讼。在美国的法院里，有专门的医疗法庭，法官和律师都既懂医学又懂法律。目前，国内医疗纠纷方面的法律沟通渠道不畅

## 我国将建立健全基层医疗机构补偿机制

最近,《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建立健全基层医疗卫生机构补偿机制的意见》(以下简称《补偿机制》)正式印发。

《补偿机制》首先提出建立健全长效的多渠道补偿机制。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实施基本药物制度后,各地首先按照核定的编制人员数和服务工作量,参照当地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平均工资水平核定工资总额。政府负责其举办的乡镇卫生院、城市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站)按国家规定核定的基本建设经费、设备购置经费、人员经费和其承担公共卫生服务的业务经费。按扣除政府补助后的服务成本制定医疗服务价格,体现医疗服务合理成本和技术劳务价值,其价格将逐步调整到位。

此外,按上述原则补偿后出现的经常性收支差额将由政府绩效考核后从三个渠道进行补助。

一是落实政府对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现有的专项补助经费。基本建设和设备购置等发展建设支出,由政府根据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发展规划足额安排;而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则建立稳定的经费保障机制,按服务数量和质量按时足额拨付到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保障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的全

面开展,2011年将进一步提高人均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经费标准;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承担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处置任务由政府按照服务成本核定补助;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人员经费(包括离退休人员经费)、人员培训和人员招聘所需支出,由财政部门根据政府卫生投入政策、相关人才培养规划和人员招聘规划合理安排补助。

二是调整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医疗服务收费项目、收费标准和医保支付政策。将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现有的挂号、诊查、一般治疗费和药事服务成本合并为一般诊疗费,并适当调整收费标准,调增部分全部由医保支付。此项政策在已实施基本药物制度并已实行医保门诊统筹的地区率先施行。

三是对落实政府专项补助和调整服务收费后,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经常性收入不足以弥补经常性支出的差额部分,由政府年度预算中予以足额安排。实行先预拨后结算,并建立起稳定的补助渠道和长效的补助机制。各地根据政府卫生投入政策结合本地实际制定经常性收支核定和差额补助的具体办法,具备条件的地区可实行收支两条线。

(摘自2010年12月15日《中国改革报》)

通,投诉机制不健全,服务态度不端正,还没有专门审理医疗纠纷的专业法庭,而懂医学的律师也凤毛麟角,这对医疗官司审判的科学性是一个不利因素。

对此,制定一部“医疗事故处理法”,明确审理医疗赔偿案件的法律适用和鉴定、赔偿以及医疗纠纷诉讼的举证责任等问题,统一确定医疗事故鉴定

主体,让医疗事故委员作为社会中介结构出现,修订完善医疗事故赔偿项目和标准。除了通过制度调控权力均衡外,民间还要创建病人权益协会,加大专业医疗纠纷队伍建设,设立专门的法庭审理医疗诉讼,让权利制衡权力,达到兼顾医患双方权益的目的。

(摘自2010年12月15日《工人日报》)



# 日韩农民医保全覆盖的时机选择

杨红燕 叶小舟

作为后发展国家的典型代表，日本、韩国农民健康保险分别于1961年和1989年实现了全覆盖，从最初城市医疗保障立法到农民健康保险实现全覆盖分别经历了34年和26年。比其他老牌资本主义国家实现全覆盖的时间要短许多，如德国花费了89年，法国经历了47年。这一成就与日韩所处的经济、政治、文化、认知等历史背景不无关系。

建立农民医疗保险时的经济状况。农村医疗保险之所以出现，除了与工业化到来人们面临的疾病风险空前增大，家庭内部保障形式弱化有关外，还与各国经济的迅速增长与雄厚的经济基础有关。日韩在建立农民医疗保险制度时，经济高速发展，财政力量雄厚。日本在战后年均GDP增速约为7%，在1961年更达到了9.4%。韩国1985年后的经济增速也维持在8%—9%之间。从换算为2004年同一时点的人均GDP值来看，日本和韩国在建立农民医疗保险时人均GDP产值分别达到了8957.69美元和6478.69美元。并且，两国在建立农民健康保险时都处于工业化和城市化的中后期，农业产值在整个GDP的比重在11%以下，农业人口占劳动力总数的比例都在30%以下，城市化率超过50%。由此可见，高速、稳健发展的经济，较高的财政收入和国民收入水平是支持农民医疗保险制度建立的重要经济保障。

建立农民医疗保险的政治环境。农民医疗保险离不开政府的重视和人民的支持。与政治系统实现契合能够调动资源并引导社会成员去实现目标。在东亚诸国，政府的态度和支持对于社会

保障制度的建立具有重大的意义。农村人口较弱的经济能力与话语权愈发凸显政府在农民医疗保险的建立过程中的举足轻重的作用。日韩两国农民医疗保险的构建验证了这一点。日本针对农民的健康保障制度原是作为配合战争需要的健民政策而诞生的。20世纪中期，国际思潮的变迁、本国经济增长、产业结构调整 and 安定居民的需要使得农民医疗保险制度重新被政府重视，并成为政治家吸引选票的重要筹码。而当时城市医疗保险引致的巨额财政赤字则成为该制度得以建立的直接原因。政府对覆盖农民的国民健康保险提供了强有力的财政支持，国家筹资比率达到50%。此举保证了国民健康保险在短短4年的时间里实现全面普及。而韩国医疗保险的迅速覆盖被认为是“收入的快速增长可能弥补了（农民）发言权的缺失”。与日本情况相同，韩国政府对农民医疗保险的补助（包括国家烟草收入的医疗专项补贴）共计达到50%。这些保证了韩国医疗保险在短期内迅速实现全覆盖。

建立农民医疗保险的文化环境。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中两方思想和文化的传入，使得儒家传统思想的正统地位发生了动摇，人们开始意识到政府主导兴办社会保障事业的积极意义。特别是20世纪30年代，世界性经济大萧条使得日本的农村变得极为贫困，医疗问题成为农民的巨大负担。此时，类似于中国农村的合作医疗形式，通过预先支付防范医疗风险的“医疗组”在日本农村蓬勃发展。这种原始的保险形式，为日后农民健康保险的建立提供了良好的思路和范本。到了20世纪五六十年代，国际社会保障事

# 干部人事制度亟待解决的硬伤

李永忠

我国干部人事制度改革 30 多年来，存在一些制度上的硬伤。

## 政策之伤：一把手

“议行合一”的党委领导体制，使党内的决策权、执行权集于党委一身，造成党内权力配置失衡。党委既是决策机关又是执行机关，同时党内监督机关也在其领导之下，集党内三权于一体的党委，成了一级党组织中的惟一领导机关。在这样一种领导体制下，党内权力实难平衡，党内民主实难发展，党内监督实难进行。

由于权力过于集中，为保证执行的坚决有力，在决策上，多用首长负责制代替民主集中制；在

用人上，多用“等级授职制”取代选举制。于是，党委无论在用人还是治事上，从决策到执行，要对就对到头，要错就错到底。其间，没谁可以叫板，无人能以纠偏。应急的权宜之计却被当作长久之策沿用下来。由此，“议行合一”的权力结构，导致了“一元化”的领导，催生了“一把手”的体制，滋生了“一支笔”的做法，派生了“一言堂”的局面，甚至“一边倒”的状态也随之衍生并不断发展蔓延。

缺乏制衡的“议行合一”权力架构，使一部分掌权者在对待腐败问题上，由思想的心动，转化为现实的行动。

业进入繁荣期，以《贝弗里奇报告》为代表的福利思想深入人心。日韩也以此为契机，进入社会保障发展的快车道。

建立农民医疗保险的认知准备。制度的顺利运行和人们对其主观感受可引致潜在的模式维系。令人称赞的先行制度的运作能够维持价值观的基本模式并使之在系统内保持制度化，对后续制度的建立无论在客观制度准备上还是独立个人的心理预期上都将产生积极效用。农民医疗保险在日韩确立时，两国高水平的城市化和工业化使得建立农民医疗保险体系成为可能和必然；两国加速到来的老龄化也引起了人们对医疗保障需求的重视；两国先行社会保障制度的良好效果对人民产生了积极影响，使人们对农民医疗保险的运行前景满怀信心，做好了充足的认知准备。

综上所述，农民医疗保险的建立和全覆盖必须在经济、政治、文化、认知等关联性因素方面满足如下“制度嵌入性”条件：(1) 强大的经济基础。日韩实践表明，农民医疗保险建立时间基本处于工业化发展的中期阶段，即工业反哺农业时期，年均 GDP 增长约为 7%—8%，此时农民的经济支付能力有所提高，能适应权利与义务相对统一的医疗保险制度。(2) 积极的政治环境。除了大力支持、强力推动外，日韩两国政府对农民医疗保险的资金投入几乎占到了农民医疗保险资金的一半左右。(3) 福利文化的深入人心与充足的认知准备。政府干预，社会福利思想的广泛传播，人口老龄化的现实，其他社会保障项目的成功实践等是农民医疗保险实现全覆盖的重要推动因素。

(摘自 2010 年 11 月 22 日《中国人口报》)

### 策略之伤：年轻化

近些年来，一些地方和单位既没有认真学习过《邓小平文选》中有关“年轻化”的21篇文章，更没有认真领会邓小平同志提出“年轻化”的深层战略思想，在实际操作中，不断出现一些片面理解干部年轻化的机械做法。面对无奈的“天花板”，那些因为年龄问题而升迁无望或由领导职务转为非领导职务的干部，不可避免地会产生“船到码头车到站”的消极思想，事业心、进取心和工作积极性会受到严重挫伤。

30年来，“年龄格”下激励了少数，伤害了多数；有利于少年得志，不利于中年进步；褒奖了锦上添花，冷落了雪中送炭；刺激了“直升机”，压抑了“天花板”；助长了跑官要官买官卖官，疏远了真干实干硬干苦干。

据此，为解决年轻化这一硬伤，当务之急，须以民意为导向，而非以年龄为导向，用不断增量的民意导向，积极而稳妥地解决千军万马过“年龄格”这一独木桥。

### 重点之伤：错路径（政务与业务错位）

扩大竞争性选拔干部在任用干部中的比例，目的是为打破当前委任制一统天下的局面。但是，由于路径错误，造成本该通过竞争性选举而上岗的政务类官员，却继续沿用等级授职制，由上级直接任命或形式上走走选举程序。本该采用等级授职制来任命的业务类官员，却要像政务类公务员那样去拉选票。其实，政务类官员主决策，须以公开公平公正为价值导向，普选为常态，委任为非常态；业务类官员主执行，须以效率为价值导向，委任为常态，竞争性选拔为非常态。

这些年由于担心领导或组织意图难实现，加上政务官权大位重，实际操作上，政务官往往重任轻选。但是，改革要有试点，并要在竞争性选拔中体现民意，重头戏就自然转移给业务官来

扮演。于是，最需要当改革试点的政务官，往往不试改革之水；最不需要作竞争性选拔改革试点的业务官，常常扮演着改革试水之人。其结果完全可以预测：即业务官们不以提高业务水平为正途，而是剑走偏锋，扮演政客广拉选票。

通过这幅图，对照改革开放30年的人才站位及选拔任用，大体出现这样一些较普遍的现象：竞争性选拔出来的业务类公务员，整体水平能力通常高于委任制的政务类公务员。

### 操作之伤：续后备（计划婚姻与市场婚姻）

干部人事制度改革，还必须解决后备干部这一大硬伤。因为，计划式的选（后备干部），肯定比不上市场化的赛（优胜劣汰）。为了能当上后备干部，一些地方和单位出现了“两水现象”（即文凭注水与年龄缩水）和“两量现象”（选用干部权力的含金量和自由裁量）。这种有意或无意的期权用人方式，在固化并削减参选人的同时，客观上也造成公信力的渐失。

### 机制之伤：很难下

改革开放30年，干部“能上”方向的空间已经极小，但“能下”方向的空间却相当广阔。如果能从“能下”方向实施战略突破，“能下”的空间一旦打开，干部队伍的素质就能在流动中不断提高，唯“年轻化”是举的僵局就能顺利打破，改革中的优秀人才就能脱颖而出。据此，在干部“能上与能下”这对矛盾中，“能下”才是主要矛盾！

干部人事制度改革，必须以确立党员和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为目标，以县、市党委直选为试点，以党代会常任制为载体，以领导干部能下为突破口。要通过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真正治好这五大硬伤，必须认真厘清权力与权利的关系。

因为，权力只有来自权利，权力才能代表权利；权利只有制衡权力，权力才能服从权利；权力只有回归权利，权力才能属于权利。

（摘自《人民论坛》2010年第23期）

# 当前公务员管理现状调查

翟校义

最新的一项公共人事制度调查显示,公务员管理在“激励制度”、“惩戒制度”、“责任制度”、“准入制度”等方面还存在一些缺陷——

## 一、公务员管理缺陷调查数据分析

针对公务员管理过程中存在的缺陷,调查题目设计为“您认为当前公务员管理过程中最为缺乏的是……”,具体选项设计了五个确定选项,分别是:“激励制度”、“惩戒制度”、“责任制度”、“准入制度”、“退出制度”,以及一个补充选项“其他”。经过对调研数据处理,得到以下判断:

1. 公务员管理缺陷集中在激励制度、退出制度、责任制度、惩戒制度四个领域。调查显示:公务员管理缺陷主要集中在四个选项上,按照高低顺序分别是:“激励制度”(43.7%)、“退出制度”(42.3%)、“责任制度”(42.3%)、“惩戒制度”(28.9%);排在第五位的“准入制度”的选择比例只有4.9%,明显低于前四个选项。

2. 从不同府级的政府看,省、地市、县政府的公务员管理缺陷呈现出不同的特点。调查发现,省、地市、县三级政府的公务员管理缺陷存在较大结构差异。从选择率最高的两个主成分因子看:省政府缺乏的是责任制度、激励制度;地市级政府缺乏的是退出制度、责任制度;县级政府最缺乏的是激励制度、退出制度。

3. 公务员准入制度存在少量问题,但已经不是关键。认为公务员准入制度存在缺陷的总计只有4.9%,这个比例在总选择比例高达162.1%的区间内,应当说是相当低。从平滑折线图看,代表准入制度缺陷的曲线处在非常低的区间上,说明公务员准入制度在整体上已经得到公务员系统的整体认可,但不排除存在个别性的偶发问题。访谈资料也验证了这一点,某省人事厅一位处长谈及公务员

录用时说:“公务员考试是人事部门把好入口关的关键,……公务员的用人是各种因素综合的结果。当前公务员的选拔基本上是正常的,但还是存在一定的潜规则的。”

## 二、地方政府领导干部对公务员管理缺陷的判断

1. 公务员考核问题较多。考核是调整公务员职位、级别、工资,开展公务员奖励、培训、辞退的依据,在公务员管理中处于枢纽地位,访谈发现地方政府领导普遍认为公务员考核问题较多。

缺乏明确、可行、有效的考核测评办法。绩效考核针对不同的政府部门、不同的岗位很难设计一套令所有人都信服的办法。某省环保局的一个处长直言不讳地说:“各种考核流于形式,没有实际意义。”某市一位区领导则说的更加详细:“我们目前对公务员的考核比较单一,主要是注重群众队伍对公务员的测评,这个制度的产生容易得罪一部分人,……很多人都在反映目前的工资制等于吃大锅饭,干多干少一个样。另外一个就是我们的工资还和群众的打分有联系,这个当然能体现民主,但是也存在一些问题,比如勤绩打分,这个尺度如何掌握?周围同事打分也不合理,群众打分更有不合理的地方,比如一个政策服务部门的公务员不直接与公民接触,你说应不应该参与群众打分?参与群众对他们又不了解,不打分,则造成一部分公务员的考核群众参与打分,另一部分公务员考核群众不参与打分,似乎有失公平。”

对领导干部进行绩效考核更加困难。某省机构编制委员会副主任在谈及绩效考核时说:“作为政府来说,我觉得涉及到党政问题,比如县长决策要听书记的意见,如果他(书记)不同意的话或者不参加会议,县长就没有办法决策,而参加会议的人又

不能决策，这就出现了说了算的不了解，而了解的人说了又不算。……往往是能干事的干部群众基础不一定好，而群众基础好的干部又差点，……所以真正该用的人没有用上，干部考核有问题。……绩效考核总是听谈话不看实事根本就不行，……现在（搞）投票，可是真正有几个人了解被投的人呢？只是凭印象而已。有些事情看似简单，实际上要付出很大的努力，这就无从考核了。”

2. 公务员退出机制亟待完善。《公务员法》规定了辞职、辞退、开除、退休等退出机制，在现实中，除退休外，其他的退出方式极少被应用，形成当前公务员退出机制虚置的现象。某省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局长讲：“公务员岗位对人是最没有压力的，没有规范的绩效考核机制，考上公务员，待遇又可以，进来以后基本不用出去了。”

处理一个公务员，让一个公务员从公务员队伍退出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一位县长说：“我们现在培养了一大堆喜欢抱怨的干部，我最讨厌喜欢抱怨的干部。……根源在退出机制，处理一个公务员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某市公安局局长谈到这个问题，显得很无奈：“实际上没有《辞退法》，你不遵守我要辞退你，这也是守法啊，这个程序我是根据法来说的，没有这个法我是不能让他辞退的。”某省人事厅厅长说：“能‘进’能‘出’方面，‘出’的环节基本上没有；能‘上’能‘下’方面，‘下’的环节基本没有；没有人能下决心做这个事情。”某省交通局的一名巡视员对当下的公务员退出机制状况做了简单而幽默地概括：“公务员……饭碗还是很铁的！”

3. 需要加强责任追究机制建设。在调查过程中，“责任”话题被地方政府领导不断提及，问什么责？对谁问责？是地方政府领导非常关心的问题。尤其是在强化问责制的情况下，地方领导对行政管理活动中的责权不一反应强烈，并认为改进责权体系是建立责任追究机制的关键。

一位街道办主任说：“对一个责任政府来说应该问责，但是到底是问什么责？实际工作中的问责很多都是不实事求是的。比方说，市长管各方面的事，但是一个很偶然的事件，如下大雨，倒塌造成损失，

你说市长有负担多大责任？有多少过错？责任首先就应该通过明确职责来确定，不明确就只是运气问题。权责不统一，认真履行的领导不一定有好的结果。”一个县长在访谈中抱怨道：“最大的问题是有很多人不同意自己是政府的一部分。问题出来了，权力的实际掌握者是局长等干部，但是责任反而是领导的。真正下面出了事之后，处理的是我们。”

某省监察局局长认为责任追究机制是公务员管理的核心，他比较委婉地表达了对建立责任追究制度的期待：“加强公务员制度建设，……首先，我们关于公务员管理的制度规范成形的不多，制度建设、职业道德规范还比较欠缺，不同职业要有不同的职业规范；第二，加强岗位责任制度建设，确立责任追究制度，如果没有履行好职责，必须对其处罚；第三，我们自身必须遵守法律。我是公安过来的，怎样管理公安队伍呢？那就是从早上起床到晚上睡觉都要遵循法律规定，公安部对此做了很多探索，规范得非常好。制度建设的核心是建立公务员的责任制和责任追究制度。”

4. 公务员管理中缺乏真正的激励机制。许多地方政府领导认为当前的公务员管理实际上没有激励，进而导致相关管理机制虚化。某省发改委的负责人谈到这个问题时说：“事业心和责任心是机关公务员的动力所在，如果一件事情对我们省发展有利，对我们的人民有利，那我们就站在政府部门的利益去考虑，而是全力为人民去做。我们的这种事业心和责任心是需要激励机制的，这在企业界里是可以做到的，职位，待遇等，不一定是物质激励。在公务员中也是，提职对每个人都是激励，可是一旦他坐上了某个位置，他就不再像以前一样了，因为没有激励机制了，再往上也不可能了，所以也没有必要再努力了。如果你不能给公务员提高工资，又不能允诺他更高的职位，还要不断给他更高的要求，这可能吗？”

现在公务员的激励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晋升，而晋升的空间又非常有限，导致公务员将晋升的激励功能无限放大，晋升正在取代已经日益弱化的其他激励机制，进而引发其他问题。

（摘自2010年12月13日《北京日报》）

# “一对夫妇生育一个孩子”政策由来

田雪原

2010年是“一对夫妇生育一个孩子”政策提出30周年。理解这一政策的关键和枢纽，是1980年中共中央书记处委托中共中央办公厅连续召开的五次人口座谈会。本文作者是当时座谈会全程参与者和会议报告起草者，他阐述了目前政策实施的效果已经显现，起到了有效控制人口增长的作用。但是，劳动力供给不足、老龄化、社会负担过重等问题也相继浮出水面，人口政策面临着新的抉择。

## 为马寅初的新人口论翻案

1957年7月5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马寅初的《新人口论》，分析了人口增长过快同经济社会发展的矛盾，主张控制人口数量、提高人口质量，曾受到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同志的赞扬。但是，1957年反右派斗争一起来，将适当控制人口增长当作马尔萨斯人口论批判，进而形成了“人口越多、劳动力越多、积累越多、发展越快”——人口越多越好的理论教条，而且将人口质量与种族优生混同起来，造成其后十多年人口问题成为无人敢于问津的“禁区”。

1959年我作为初入北大的一名学子，一踏进校门便赶上第二次批判马寅初新人口论。当时我知少识浅，课余时间找来马老的几篇文章和批判他的文章对照着读，感到马老讲得颇有道理，那些批判文章大都千篇一律。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恢复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我数易其稿，最后定名《为马寅初先生的新人口论翻案》，送到《光明日报》。报社收到稿子后很重视，告诉我准备作为“重头文章”刊用，发表时加了“编者按”，作为该报对过去错误批判新人口论的清算。

## 合作进行人口预测研究

在1979年的一次人口科学讨论会上，我遇到七机部二院的李广元同志，他告诉我说，他们有一个小组在搞人口预测，领导这项工作的是当时七机部二院宋健副院长。几天后，李广元打电话来说，我把你的情况和研究课题向宋健副院长作了汇报，能否约个时间，一起交谈一下。于是我们开始了紧锣密鼓的合作研究。

1980年2月，新华通讯社发出电稿，报道了合作研究预测成果。这个研究结果揭示了由当时人口年龄结构比较轻的基本特点所决定，人口增长的势能比较强，即使实行比较严格的控制人口增长的政策，全国人口还要再增长较长一段时间；同时，由于我国人口基数大，号称世界第一人口大国，每年增加的绝对人口数量相当可观，增加了人口问题严重性和控制人口增长任务的紧迫性、艰巨性。1980年，中国人口政策走到历史的关键时刻。这一年3月下旬至5月上旬，中共中央书记处委托中共中央办公厅，连续召开了5次人口座谈会，经过与会领导、专家学者的反复讨论，最后一次座谈会定下了“提倡一对夫妇生育一个孩子”大计。

## “一对夫妇生育一个孩子”的三大原因

提倡一对夫妇生育一个孩子，当时主要是三个方面的原因：

第一，人口现状和未来变动发展趋势。预测表明，如果一对夫妇平均生育2个孩子，21世纪中叶全国人口要突破15亿人，然后才能缓慢下降，到21世纪结束时，人口总数仍将在14亿人以上。座谈会上发言的人表示，劳动就业困难，“三个人的活五个人干”，严重地阻碍着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人口多，消费大，每年国民收入中很大一部分被新增长人口消费掉了；人口增长快，学校、医院等公共事业的发展跟不上，造成人口数量过剩而素质不高的被动局面等。与会者均认为，应当加大人口控制的力度。

第二，政策和要求逐渐明确，距离普遍提倡“一对夫妇生育一个孩子”只有一步之遥了。1978年10月，中共中央批转的《关于国务院计划生育领导

小组第一次会议的报告》，提出“提倡一对夫妇生育子女数，最好一个，最多两个，生育间隔三年以上”。座谈会召开前一年，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陈云、李先念，先后提出要求一对夫妇最好只生育一个孩子，并对生育一个孩子的实行奖励。1979年6月，五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通过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要订出切实可行的办法，鼓励只生一个孩子的夫妇”。

第三，提倡一对夫妇生育一个孩子有着一定的群众基础。1979年3月，山东省烟台地区荣成县农民鞠洪泽、鞠荣芬（女）等136对夫妇，向全公社、全县育龄夫妇发出《为革命只生一个孩子》的倡议书。天津医学院44位教职员工，也发出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的倡议书。这说明，人民群众中的一些先知先觉者，对一对夫妇生育一个孩子已经有了一定的认识，并且开始行动起来。

生一个孩子会不会引起人口老龄化？座谈会的回答是肯定的：生育率和出生率的持续下降，必然带来人口年龄结构老龄化。对于人口来说，生育率就是定盘星，生育率下来了，少年人口比例下来了，老年板块这一头就上去了。关于老龄化发展趋势，当时提了三种预测方案，对老龄化水平估计最高的一种方案是：从1980年起生育率大幅度下降，1985年一对夫妇平均生育一个孩子并继续保持下去，2000年65岁以上老年人口比例为8.9%，2020年为19.0%，2030年为29.6%。回过头来看，实际情况要比这一预测低许多。

问题是我们怎么对待老龄化。对于可能发生的社会和家庭老年负担过重问题，《报告》主要提出两项应对的策略和措施：一是通过对生育率的调整，将老年人口负担系数控制在一个合理水平；二是有计划地实行社会保险，建立可靠的养老保障制度。

会不会形成家庭“四二一”年龄代际结构。座谈会上有一位领导同志提出：如果一对夫妇生育一个孩子，等到孩子结婚后再生育一个孩子，这个家庭不就成了老年人为四、成年人为二、少年人口为一的“四二一”家庭结构了吗？！一时间，他的话引来热议。我们结合家庭规模的演变，对这个问题进行了澄清。

首先，老年人口为四不可能普遍存在。按照年龄组别死亡率U形曲线分布，每年每个年龄组均要

死亡一定数量人口，老年人口年龄组死亡率要更高一些，二三十岁为人父母者不可能全部活到60岁或65岁以上。那么“二一”呢？只有独生子女结婚后又生育一个孩子，才具备形成“二一”的条件；如果实行独生子女结婚可以生育两个孩子的政策，“二一”也就失去了产生的条件。因此，提倡一对夫妇生育一个孩子在某些家庭可能出现“四二一”代际结构，但不具有普遍性，整个社会是不可能形成“四二一”结构的。

### 如何评价“一对夫妇生育一个孩子”政策

20世纪80年代伊始中国人口问题已经相当严重，不采取果断的政策措施加以解决，让人口盲目增长下去，就要妨碍现代化建设事业的顺利推进，影响人口再生产健康的发展。同时中国漫长封建社会滋长起来的多子多福观念，是传统文化中一个相当顽固的“堡垒”，没有一个大的震动和持之以恒的艰苦努力，是难以撼动和改变的。

1980年9月25日，中共中央发表致全体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的公开信，正式提出“提倡一对夫妇生育一个孩子”。

1982年3月13日，新华社报道：中共中央、国务院最近发出《关于进一步做好计划生育工作的指示》，要求国家干部和职工、城镇居民，除特殊情况经过批准外，一对夫妇生育一个孩子；农村普遍提倡一对夫妇生育一个孩子，某些群众确有实际困难要求生育二胎的，经过审批可以有计划地安排。同年9月，党的十二大把实行计划生育确定为基本国策，随后写入新修改的《宪法》。

30年之后来看一对夫妇生育一个孩子的政策，我认为，它是反映了上自中央领导、下至黎民百姓的愿望，集中了包括专家学者在内的各方面的智慧，是符合实际和切实可行的。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人口多寡并不是目的，目的是让这个国家、这个民族发展得更好，全体居民生活得更好。中国封建社会庶众人口观和形形色色的众民主义，都把人口多寡作为目的本身，而将人口的生存和发展列为其次，这就难免本末倒置。

### “后人口政策”任重道远

近30年的实践证明，当时对人口变动和发展

趋势的判断是正确的，制定的政策是成功的。这样说，并不意味着中国的人口政策已经尽善尽美了，包括人口政策在内的任何政策，总是要不断发展和完善的。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中期中国进入低生育水平阶段后，人口的变动又走到十字路口，人口政策面临新的抉择。

2009年12月，我在《人民日报》上发表署名文章《新中国人口政策回顾与展望》，提出人口政策也应“与时俱进地进行调整”，并给出了三种不同的调整方案：第一，全国不分城乡，夫妇双方均为独生子女者，一律允许生育两个孩子；第二，夫妇一方为独生子女者，允许生育两个孩子；农村现在可以实施，城镇可从“十二五”时期开始实施；第三，在有效制止三孩以上多孩生育的条件下，农村可普遍允许生育两个孩子。

令人意想不到的是，我的文章引起了很大的社会反响，赞成者、反对者均有之。我在这里想说的是，这只是我作为学者个人提出的建议，而且也不是什么新的想法，实际上是希望履行1980年中央座谈会提出的政策承诺，因为当初主要出发点就是控制一代人的生育率。

1980年中央人口座谈会上领导同志在审阅给中央书记处的《报告》时，提出让我以个人名义写两个“附件”：“附件”之一就是《提倡一对夫妇生育一个孩子多长时间为宜》。我的基本观点是：提倡一对夫妇生育一个孩子主要是要控制住一代人的生育率，因为控制住一代人的生育率，也就自然地控制了下一代做父母的人口数量，因而可以起到有效控制人口增长的作用。为什么不能搞两代人、三代人？如果实行两代人生育一个孩子的政策，人口年龄结构就会向着“倒金字塔”方向转化，必然导致劳动力供给不足、社会负担过重等问题，是不能开此先例的。因此，提倡一对夫妇生育一个孩子是既非权宜之计也非永久之计，而是一段时间，具体说是未来二三十年特别是20世纪内的事情。

人口变化的特点是缓慢、累进，但是它的势能很强。我主张瞻前顾后，统揽全局，科学把握。如果不未雨绸缪，适当调整政策，对当代人来讲可能影响不是很大，长远来讲恐怕会有一些不好的后果，纠正起来也会很难。

（摘自《百年潮》2010年第10期）

# 当前独生子女 研究的六大命题

风笑天

命题一：独生子女的心理特征及其发展规律。这一命题的基本思想是，作为整体的独生子女既可能具有某些与非独生子女共同的心理特征，也可能具有一些区别于非独生子女的心理特征。因此，它特别强调要从独生子女“整体上”和独生子女成长的“全过程”这两个方面来进行探讨，以避免现有研究中大量存在的“孤立的”、“个别的”、“单一时期”、“单一对象”的研究视角和探讨方式，以帮助我们更好地从本质上加深对作为一代人的独生子女的心理特征的认识。这一命题涉及的主要内容将包括不同年龄段独生子女心理特征的现状、特点及影响因素；独生子女区别于非独生子女的主要心理特征及其理论解释；没有兄弟姐妹对青少年人格的主要影响；独生子女社会化的新特点与新问题等。

命题二：社会结构视野下的独生子女教育。独生子女的教育问题是中国大量独生子女现象出现以来被整个社会关注最多的问题之一，也是现有独生子女研究中探讨最多的一个方面。但目前对独生子女教育问题的探讨基本是从单纯的教育学学科视野出发，研究焦点通常仅围绕相对具体的教育方式和教育方法问题，忽视了存在于局部教育环境之外的更为广泛、更加



强大的社会结构因素的影响。针对这一现状，笔者认为，需要将目前与独生子女相关的各种教育现象与教育问题放到中国改革开放的大环境、放到中国社会结构转型的背景中去分析和探讨，努力从决定和影响独生子女教育现象的社会结构因素、社会文化因素方面去发现联系和寻找因果关系。这一命题包括的主要内容有：独生子女的家庭教育与独生子女父母的教育问题，中国社会目前的教育分层与独生子女的教育问题，大众传媒对独生子女教育的影响，同辈群体在独生子女社会化中的作用，影响独生子女教育的社会结构因素探讨等。

命题三：发展变化中的独生子女婚姻与家庭。独生子女家庭是中国社会中一类新型的“细胞”，许多与独生子女人口密切相关的问题和现象，都源自于独生子女家庭。特别是由于第一代独生子女已长大成人，伴随着他们的婚姻和成家又带来了一些新的独生子女家庭现象与家庭问题。对这些问题的认识需要从心理学、社会学、人口学等多种不同学科的视野来获得。这一命题的研究内容可大致分为两方面：一是与目前大量存在的、以“三口之家”为主要特征的普通独生子女家庭（或称为第一代独生子女家庭）有关的问题；二是与那些由第一代独生子女结婚成家后建立的新的第二代独生子女家庭有关的问题。如独生子女家庭结构的特点、变化趋势及其对社会的影响；独生子女家庭生命周期与家庭关系的变化；第一代独生子女的婚姻观念及其对家庭和社会的影响；独生子女养育独生子女现象等。

命题四：独生子女的风险与社会保障。独生子女对于家庭和父母的唯一性，意味着其家庭和父母在其成长的过程中将面临更大的风险。成年独生子女的意外伤害将成为这种风险的集中体现。与独生子女家庭结构密切相关的另一些问题将包括“空巢”家庭的增多、家庭的社会支持网络弱化、家庭养老面临更大困难

等方面。因此，研究独生子女家庭的这种风险和保障的现状，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解决办法，无疑是最近一个时期该领域中的一个重要命题。其主要内容将包括成年独生子女意外伤害与独生子女家庭风险，纵向家庭关系与独生子女家庭的社会支持网络，独生子女父母老年生活中的“空巢”现象及其解决办法，农村独女户家庭的养老支持及其面临的挑战等。

命题五：独生子女与国家人口政策的改变。独生子女人口是我国计划生育政策的产物。但作为政策的结果，这一代人在成长和发展的过程中又给中国社会的人口结构带来了巨大的影响。近30年来，随着独生子女人口不断增加、成长，中国人口的结构也发生了巨大改变，而这又必将给中国社会的方方面面带来新的影响。这一命题的内容将包括：“双独家庭”二胎生育的意愿及其影响因素，第一代独生子女的婚姻市场及其婚配结构，“双独二胎生育政策”影响下的中国生育率水平变动，独生子女人口规模及变动趋势的定量分析与预测，中国人口结构的变化与独生子女人口政策的调整方向，独生子女政策与人们生育观念转变等。

命题六：独生子女对中国社会的影响。当这一代特定人口逐步成为社会的主力军时，他们会不可避免地将自己的价值观念、行为方式、追求目标带入到社会生活中来，在他们参与社会生活的过程中影响到整个社会的社会规范、社会关系和社会心理，影响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因此，这一命题的范围更广也更为复杂。它不仅包括独生子女对目前社会的影响，同时还包括独生子女对未来中国社会潜在的影响。其主要内容将涉及独生子女人口变动与各级教育的发展，独生子女文化对中国社会的冲击，青年独生子女的价值观与中国文化传统的关系，青年独生子女家庭生活方式的特点及其社会影响等。

（摘自2010年11月23日《中国社会科学报》）

# 国民体质连降十年 青少年运动能亚洲第三

吴 键

我们是竞技体育的金牌大国，我们也是国民肥胖率、心血管疾病发病率、国民亚健康比率在世界上高居前列的国家。体育的功能是塑造健康优秀的公民，但面对全面素质不断下降的现实，作为竞技金牌大国，我们难道不该反思我们的体育发展战略吗？

## 竞技金牌：世界第1，亚洲第1

2008年北京奥运会，中国代表团以51金成为世界金牌第一大国。

至于亚运会，从1990年北京亚运会到刚闭幕的广州亚运会，在总共六届亚运会上，中国军团无论在主场还是客场，都是金牌和奖牌第一大户。有人戏称，这样下去，亚运会就快变成全运会了。

## 全民体质一直在跌

### 国民体质：世界第32，亚洲第3

再看看我们的国民体质，所谓国民体质就是一个国民在心肺耐力、力量耐力、柔韧性和体成分（脂肪含量）等生理指标的一个均值。从1990年以来，我国也进行了数次大规模的国民体质监测。

在2000年完成的一次监测中，速度素质、耐力素质、柔韧性素质、爆发力素质、力量素质均全面下降。反映柔韧性素质的立位体前屈指标和1995年相比，7—12岁下降0.4厘米，13—18岁下降1.8厘米，19—22岁下降2.5厘米；反映下肢爆发力的立定跳远最大下降2.3厘米；反映耐力素质的800米、1000米跑下降更为明显。13—18岁中学男生女生的1000米、800米跑的平均水平下降9.6秒、12.6秒，大学男女生分别下降20秒和15.1秒。另外斜身引体、引体向上、仰卧起坐等指标也没有一个是上升的。

2010年初公布的一组最新的国民体质报告显示，较之2000年，我国青少年的国民体质再次下降，这里不再列举繁杂的数据，从最能反映体质的肥胖和近视状况就可见一斑。较之2000年，我国青少年肥胖率增长近50%，城市男学生1/4为胖墩儿。较之2000年，青少年近视率从20%增长到31%，可以说，中国即将成为不折不扣的眼镜王国了。

20年来，我国竞技金牌不断“疯涨”，国民体质却不断下降，在2007年公布的一项世界国民体质排名中，荷兰、丹麦和德国排在世界前三，韩国排在第24位，亚洲第一。日本排在第29位，亚洲第二。中国排在第32位，亚洲第三。中国人的体质状况用新华社记者杨明提供的数据就是“两高一超”，1.6亿人患高血压、1.6亿人患高血脂，有2亿人超重或肥胖。75%的国民处在亚健康状态。如果召开各国国民体质奥运会和亚运会的话，我们的奖牌榜可就惨淡了。

## 青少年近视率已达31%。

### 运动能力对比：青少年体质远不如日韩

国民体质的下降，究其原因与生活方式有关，在影响生活方式的指标中，运动健身是影响国民体质最重要的因素。也就是说，我国国民体质，尤其是青少年体质数十年下降，恰恰是我们的全民健身运动，不能满足人们的需要。

据《中国青少年体质健康行为调查》初步调查显示，因城市化的发展，我国60%以上学生的居住环境不具备进行体育运动的条件；在休息和节假日的空闲时间，学生最喜欢做的3件事是：上网聊天和游戏、听音乐学唱歌和看电视，出去运动的不足30%。

再看看我们的近邻日本，日本中小学生的运动量普遍多于中国学生，每天锻炼2小时的日本学生有21.3%，中国学生仅为6.3%；每天锻炼3小时的日本学生有21.3%，而中国学生仅为1.3%。

日本青少年研究所曾经对中日美三国初、高中生课外体育活动的问卷调查显示，参加课外体育活动的初中生，中国为8%，日本为65.4%，美国为62.8%；高中生中国为10.5%，日本为34.5%，美国为53.3%。

中国青少年缺乏锻炼，日、韩的学生勤于锻炼。当这三国的孩子在一起运动时，将发生什么状况呢？一项调查报告描述了2009年我国一所学校中外学生的体质差异。以一次登山活动为例，以日、韩学生为主的国际部全体学生都顺利到达山顶，中国学生

中却有 20 多人因体力不支中途返回。

除了耐力和精力不如日韩学生，中国学生在耐寒能力上也差距明显。进入冬季，中国学生在室内穿着厚厚的毛衣裤，而多数日韩学生只内着一身秋衣裤。在体现协调能力的急停急转的测试上，中国学生时常会摔跤，还有很多学生不能很快地奔跑。

100 多年前，我们被外国人称为东亚病夫。如今我国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竞技体育已经开始跻身世界前列，我们的金牌一次比一次多，但国民体质却是一代不如一代，这样下去既令人感到讽刺又令人担忧。

### 中日韩“比赛项目”

#### ● 身高体重

中国：12 岁男生平均身高 156.38cm，平均体重 51.32kg。

韩国：12 岁男生平均身高 150.93cm，平均体重 43.14kg。

#### ● 肺活量

中国：一年级男生肺活量平均值 923ml，六年级为 1820ml。

韩国：一年级男生肺活量平均值 1450ml，六年级为 3180ml。

#### ● 锻炼时间

中国：每天锻炼两小时以上的学生占 6.3%。

日本：每天锻炼两小时以上的学生占 21.3%。

#### ● 睡眠时间

中国：五六年级学生由于课业增多和各种补习班，睡眠不足 8 小时，六年级半数学生睡眠低于 7 小时。

韩国：每天保证 9 小时睡眠。兴趣班多为体育锻炼，如高尔夫、跆拳道等；课业负担总体较轻。

#### ● 综合体质排名

中国：亚洲第三，世界第 32 位

日本：亚洲第二，世界第 29 位

韩国：亚洲第一，世界第 24 位

#### ● 国民体质监测数据：

立定跳远：5 年下降 2.3 厘米

大学男生 1000 米跑：5 年下降 20 秒

大学女生 800 米跑：5 年下降 15.1 秒

青少年肥胖率 10 年增长近 50%，近视率 10 年增长 11%。

（摘自 2010 年 11 月 30 日《南方周末》）

## 领导干部要 多学点传统文化

黄惠勇

学文化必须学传统文化。那什么是文化？什么是传统文化？许多人类学家和社会学家都给文化下过定义，据统计多达 164 条。人类学家的鼻祖泰勒是第一个界定文化的现代学者。他认为，文化是复杂的整体，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风俗以及作为社会一分子所习得的任何才能与习惯，是人类为适应环境和改善生活方式而努力的总成绩。当然，有很多人对这个定义持有异议。定义文化不容易，定义传统文化就更难。我认为文化是一切知识的综合，传统文化就是关于人类、社会、自然等的历史知识的精髓。学习传统文化就是研究人类社会文明发展的规律性、特异性和时代性。习近平同志提出领导干部要读好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著作、各级领导工作必须的各种知识书籍、古今中外优秀传统文化书籍，就包括了中西方传统文化的内容。

领导干部学习传统文化有利于提高文化素养，传承中华文明，增强民族自豪感、幸福感。中国传统文化的历史源远流长，内容博大精深，是中华民族的精神瑰宝，其成果主要记录和保存在以四书五经、《史记》等为代表的古代典籍中，涵盖哲学、政治、经济、科技、农医等领域，有宫廷正史，也有江湖野史；有御览正批，也有文人歪改；有读者注说，也有学者诠释。学习传统文化，不仅能广泛了解各个历史时期不同阶层的价值观、政治追求，还能学习科技发明、生产生活和家庭婚姻等历史知识，传承中华民族的古代文明，提高自身素质和文化修养，更能借鉴史上治国方略和从政经验，古为今用，解决当今现实问题。如屈原的《诗经》作为我国最早的诗歌总集，是研究我国古代诗歌、乐曲的重要资料。同时，《诗经》对上至西周初年，下至春秋中叶五百多年间的农业生产、社会生活、民俗风情、政治制度等内容都有全面而深刻的反映和记录。司马迁的《史记》采用编年史的方法，记载了从黄帝到汉

武帝历史大事、人物列传以及不同时代的天文地理、自然气候等信息。领导干部学习传统文化，不能只是简单地阅读、肤浅地理解，必须深入研究其思想精髓，认真体会其精神内涵，学以致用，积极推动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伟大复兴。

领导干部学习传统文化有利于加强党性修养，丰富从政经验，树立正确的价值观、政绩观。中国传统文化带有浓厚的民族特色，蕴含着深刻的哲理。学习传统文化要带着感情学、带着问题学，要客观分析历史事件、历史人物，总结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研究问题，尤其是研究当下的问题。尽管中国传统文化从鸦片战争开始，因为西学渐进、新文化运动和文革等特殊历史时期的曲折，继承和发展的障碍不断，但作为中华民族的基本文化，依旧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否定传统文化就是否定我们的民族历史，任何国家和民族都是凭借传统文化的独特气质驻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中国传统文化有着许多值得我们借鉴、学习和研究的思想与内容。作为执政党，作为领导干部，学习传统文化不能搞形式、搞运动，而要认真学习、深入研究、积极思考、真心感悟，通过学习，提高党性修养，提高执政能力。古人讲“以古为镜，可以知兴衰；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要做到学历史，用历史，而不囿于陈规；学哲学，用哲学，而不流于形式，就要不断吸取历史事件、历史人物修身、治国、平天下”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真正赋予中国传统文化更多、更积极的现实意义。

领导干部学习传统文化有利于加强爱国主义教育，培养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坚定历史使命感、责任感。中国传统文化是华夏民族的基本文化，具有独特的精神内涵。孔子推崇“三军可以夺帅，匹夫不可夺志”、“知其不可而为之”的进取精神；孟子弘扬“当今之世，舍我其谁”的浩然之气；范仲淹坚守“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民本思想；顾炎武有“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天下情怀；老子顺其自然，参悟“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的宇宙大智慧；庄子拥有“扶摇直上九万里”的自由豁达心境；六祖禅师惠能心生“运水担柴，皆有妙道”的人生顿悟，等等。今人总结认为，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是“追求崇高的人格精神、刚健有为的进取精神、厚德载物的兼容精神”、“以‘中国结’作为图腾象征的协作精神”等人本精神和礼治精神。千百年来生生不息的智慧传承塑造了中华民族伟大的精神品质。中国传统文化的

博大精深，传承的不仅仅是文化元素，更是民族精神，爱国情怀。时至今日，我认为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就是“心忧天下，爱我中华”的爱国主义精神、“自强不息，振兴中华”的强国富民精神。作为当代领导干部，尤其是中青年领导干部学习中国传统文化，要坚定改造社会、改造世界的自信心、责任心，要有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的民族情怀和追求真理、追求理想的崇高品德。

领导干部学习中国传统文化决不能排斥先进文化，要坚决抵制腐朽文化。中国共产党代表的是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而先进文化是不分时空、不分地域存在和传承的，因此，不论是历史的，还是现代的；不论是中国的，还是外国的，我们都应该学习，都应该吸取。尤其是近代西方文明的文化成果，更值得我们去学习、去借鉴。中国传统文化有很大的包容性，从唐宋到当代，尽管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为基本的准则，但中西方文化的自然融合一刻也没有停止过。因此，学习中国传统文化不能排斥西方先进的文化成果。纵观当今世界，经济全球化大势所趋，文化交流日趋频繁，文化的多样性和文化之间的交汇融合已成为推动世界向前发展的重要力量。从中西方文化体系中吸取一切优秀的成果，为我所用，已成为中国当代文化发展的现实需要。因此，学习传统文化不能仅限于学习中国历史，还要研究世界历史；不能只学习先进的传统文化，还要学习当代世界的先进文化。当然，不论是传统文化，还是现代文化；不论是东方文化，还是西方文化，都会存在一些腐朽落后的糟粕，如果不加以分辨、去粗取精、去伪存真，我们就会“一叶障目”、“瞎子摸象”，难以把握传统文化的精髓。因此，我们学习传统文化决不能被其所束缚，应勇于吸取世界先进文化的优秀成果，积极弘扬中华民族的传统文明，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努力进取。

现在许多领导干部在学习上不愿用功，对传统文化的理解很片面，认为传统的是过时的，也有人认为只有中国才有传统文化。这都是错误的。传统文化是民族的，也是世界的；是历史的，也是现代的。丢掉传统就是背叛历史。恰如列宁所言：“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因此，学习传统文化要用联系和发展的马克思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价值观去思考、去理解、去发挥，去正确地指导我们的工作实际和理论探索，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努力奋斗。

（作者为中央党校第十期中青二班学员）

# 官员的道德评价的标准和方法

靳凤林

## 一、领导干部道德评价的依据

目前,对我国领导干部的道德行为进行考察时,普遍存在着割裂行为动机和行为效果关系的现象,其具体表现形式:一是重利轻德。只看具体工作政绩如何,不看行为动机中的德性成分,某些干部工作和生活作风存在严重问题,但由于其工作成绩比较突出,照样被“带病”提拔,因为在“能力本位论”思想指导下,上级领导看中的是他的才干而非道德,乃至于个别群众也同样以“道德宽容”的心态对待这类干部。二是私德盛行,公德退缩。许多在公共机关工作的领导干部在处理人际关系和彼此进行评价时,看重的是相互之间的“恩恩怨怨”,而不是“大是大非”。从政治伦理学的视角看,衡量使用公共权力好与坏的依据只能是“是非”而非“恩怨”,因为“恩怨”是私德范围内的感情问题,“是非”则涉及公德范围内的正义与否。

## 二、领导干部道德评价的标准

道德评价的根本目的是要做出善恶与否的价值判断,这种判断不仅关涉道德主体的社会责任,而且也影响着个体道德的生成,因此,在善恶问题上始终存在一个划分标准问题。我国现行各种版本的马克思主义伦理学教材,均从阶级标准、历史标准和生产力标准三个维度进行划分,所谓阶级标准就是符合一定阶级的道德原则和规范就是善,否则,就是恶;历史标准是指要把道德行为置于整个历史发展的长河中去考察,看其是否有利于社会进步和绝大多数人的幸福;生产力标准是指看其道德行为是否促进了社会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应当说上述标准集中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论的根本要求,但这些标准具有极大的抽象性,难以进行具体的实际操作,如何根据不同职业、不同阶层、不同群体的具体特点,建立起适合特定人群道德评价的量化标准体系,一直是我国道德评价领域面临的重大难题。就领导干部的道德评价而言,其行为善恶的评价标准更加复杂,它不仅高于普通群众的评价标准,还要充分体现工人阶级和中华民族先锋队的特点。沈跃跃依

照十七届四中全会提出的干部考察要求,主张应当从以下四个方面考察和评价领导干部执政行为的善恶与否:一是从履行岗位职责中表现出的工作动机、工作态度、工作作风、工作成效和团结协作精神来考察和评价;二是在完成急难险重任务中,看其是否冲在第一线、沉着应对、坚忍不拔;三是从面对重大问题、重大政治事件的表现中,看其是否立场坚定、态度鲜明、服从组织、顾全大局;四是看其对待个人名利的态度上,是否心态平和、服从安排、头脑清醒、真诚谦让、辛勤工作。总之,要从其全部的成长轨迹中去把握、从其优缺点的准确认识中去评价、从其工作之余的情况中去了解,要全面、历史、辩证地考察和评价领导干部为官和做人情况。

## 三、领导干部道德评价的方法

对领导干部展开道德评价的过程,同时也是对其手中的权力进行监督的过程,通常情况下对领导干部的道德评价方法主要有以下四种:一是群众评价。人们常讲:“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金奖银奖不如老百姓的夸奖。”领导干部必须树立“口碑”意识,应当将人民群众的真心爱戴视作对自己的最高奖赏。从当前对领导干部的道德评价情况看,群众评价是最薄弱的环节,之所以如此,是因为群众评价不能决定领导干部的升迁和福利待遇的提高,如何从制度层面把“群众公认”确定为领导干部选拔任用的根本标准,而不是把政绩评价权和选拔任用权仅仅局限在个别领导干部或一把手那里,这是根本问题。二是社会舆论。社会舆论对领导干部的道德评价具有重要作用,必须充分发挥党报、党刊、电台、电视台、网络等对领导干部的道德监督和评价作用,通过大众传媒来对领导干部进行道德褒奖和贬损,大力营造有效促进领导干部道德建设的强大舆论氛围,努力消除舆论监督软弱无力和对道德评价麻木不仁的现象。三是组织评价。即上级部门通过组织程序依据干部道德规范体系对领导干部的职业道德状况进行评价,组织评价具有标准明确、结论清晰、效果明显的特点,但当前我国组织人

# 潜规则是如何产生的

朱力

潜规则的形成，开始只是少数人为获取特殊利益而“创造”出来的某些越轨手段，它可以在巧妙回避显规则惩罚的同时，帮助行动者实现行为目标。潜规则迎合、满足了个体内心深处存在的私欲，具有自发的同化机制。初次成功后，行动者在利益的驱使下重复这类行动，并逐渐形成行动者同盟。同盟形成后，行动者遵从特殊路径行事，而受到显规则惩处的概率减少，成功率加大，失范成本得以降低。当潜规则生长到一定阶段，就成为一种公开的秘密，失范者的“成功”行动，慢慢地在周围人中间产生榜样效应，吸引更多的人去效仿，当有相当一部分人对这类行动采取了认同的态度，形成了共识，行动者会自发地对这一类行动进行合理解释，形成某些相互默认的游戏规则。尽管对显规则来讲，潜规则是一种逆向的反动机制，但它有顽强的生命力，会在相当部分的人群中不断地生长、传递、循环。一旦一个空间领域中存在着某种潜规则，它就会对显规则形成挑战，威胁甚至可能会瓦解显规则与社会的良性运行机制。

以公务接待为例，潜规则运行逻辑是这样的：公务接待不光是为了公务，也不是简单的接待，它是上下级之间的一种感情投资，公务接待的级别和规格代表着你对上下级之间关系的认知和对此的重视程度，所以想要讨好上级，接待就必须达到相应的级别和规格。开始的时候，可能只是少数利欲熏心者，对此比较用心，而且居然还真的得到好处了，有人就会想：反正是花公家的钱讨好公家，自己也不损失什么，还能得到好处，何乐而不为？于是，便有更多的干部投入到这种“为接

待而接待”的活动中。慢慢的，什么样的人给什么级别的接待，由谁来接待，就形成一种默认的机制了，成为一种半公开的力量起着作用，干扰正常的公务接待，并对那些不进行这类接待的地方和干部形成压力，迫使他们作出选择。

我国社会生活中整体上还不存在完全按照潜规则行事，排除显规则的社会生态条件。但不可否认，某些领域或地区，显规则与潜规则是同时运行的。我国社会转型时期特有的复杂局面，使潜规则的形成有了适合的生态环境。潜规则的泛滥成灾，说明我们的正式规范还有许多的缺陷、漏洞，我们的社会结构还不是合理的，在社会安排中还没有一种能够确保公平、公正原则实施的完善机制。当有许多人遵循潜规则行事时，说明显规则已经在某种程度上被虚置了起来，形式上的规范对现实生活已经起不到规范作用。显规则如果在实际社会生活中仅仅是停留在形式上，对违反规范的失范者不能惩处，规范只能起“稻草人”的威胁作用，这种规范不仅不会被社会成员认同与接纳，反而会被社会成员轻视，导致更多的人转向潜规则。潜规则的产生是对规范权威性的挑战，说明显规则出现了空洞化、虚置化，沦落为“说”的规范，而潜规则则变为“做”的规范。潜规则具有强大的生存与自我保护的能力，在潜规则的背后，总是有一股以利益链条为纽带的群体势力，在支持着、维护着潜规则，与正式规范进行博弈、抗衡。我们不能轻视潜规则对社会健康机体的侵蚀与对社会秩序的破坏。

（摘自《人民论坛》2010年第33期）

事部门在对领导干部进行任前、任期和换届考核时普遍存在走过场现象，特别是对领导干部道德状况的考核缺乏全面细致的量化指标体系，如何把道德评价的具体内容和方法纳入程序化、标准化、规范化、公开化轨道，将是领导干部道德建设面临的一项重要而急迫的课题。四是自我评价。人们通常把道德评价比作“道德法庭”，如果说群众评价、社会舆论、组织评价是道德“公审”，那么，自我评价就属于道德“自审”，自我

评价是领导干部通过自我裁判实现守望道德良知、加强道德自律的重要形式，在生活节奏不断加快、工作压力日益加重的现代社会，让每位领导干部静心澄滤、反躬自省，已经变得越来越难，但必须看到，惟其如此，才能真正实现领导干部的“自重、自省、自警、自励”，否则，每天都在忙于应酬、疲于奔命、行色匆匆中度过，将永无自我检审之时。

（摘自2010年12月20日《学习时报》）

# 美国，六十年前朝鲜局势之误判

张长江

朝鲜战争对美国而言，这是历史上首次没有决出胜负的战争。从战争爆发之初的迅速介入，到将战争不断扩大的过程中，其一系列决策都伴随着战略上的误判。

## 关于战争性质判断上的失误

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美国政府的判断是：朝鲜战争是由苏联发动、支持和怂恿的，是国际共产主义声东击西的战术，目的是要把西方的力量牵制在远东，然后在西欧发动总攻。基于这个判断，杜鲁门政府迅速作出了全面干涉朝鲜战争的决定。

美国这一战略判断失误的根本原因在于其决策层的浓厚的意识形态倾向。二战后，美国固有的意识形态上的自信被军事上的胜利迅速放大，认为在世界范围内推广民主、自由、人权是美国的责任。而朝鲜战争中美国决策层的核心成员杜鲁门、艾奇逊、布雷德利、马歇尔几乎都对苏联阵营和冷战形势已经有了一个“敌人意象”的预判。他们认为苏联受到一种狂热信仰的蛊惑，这种信仰与美国秉持的民主理念背道而驰，热衷于侵略和征服，没有人性，不真诚，不可信，能做出极端残暴的事情。而且这种“敌意升级”在面临反对意见时，往往以对方不了解敌人的险恶本性为由驳回，使错误本身难以得到纠正，最终使得美国产生了一种脸谱化对手、神圣化自我的倾向，从而难以做到“知己知彼”。

这个错误的判断对美国在朝鲜战争中的一系列决策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一方面，美国政府自始至终是从美苏全球对抗的角度认识朝鲜战争，进而把苏联的意图作为自己决策的决定性依据，忽视了朝鲜半岛军事冲突的复杂根源，从而降低了决策导向的灵活性。

另一方面，这一判断还导致了美国对中苏同盟

的僵化认识，忽视了中国作为一个主权国家的独立性，特别是中国对于朝鲜半岛的地缘政治利益的天然诉求，以及基于历史原因形成的关于朝鲜半岛的独特的国家安全观。正因如此，杜鲁门政府依然基于对旧中国的认识和对新中国成立后面临的困难形势的估计，以及潜意识的民族优越感，没有对新中国予以高度的重视，无法对新中国出兵参战的能力和决心作出正确的判断。

1950年9月，美军在仁川登陆，朝鲜战局发生逆转。直到此时美国政府才意识到这场战争并非他们原先预料的那样，而仅仅是由于朝鲜内战而引发的一场局部战争。但是仁川登陆的意外胜利和政策决策的惯性，推动着美国决策者在原先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 政治遏制与军事遏制的二元分立

二战后期，美国对朝鲜政策的主要目标是通过国际托管进而实现朝鲜的独立。但是到了1947年7月，随着美苏联合委员会会议的破裂，美国开始重新讨论其朝鲜政策。以陆军部和参谋长联席会议为代表的军方认为，苏联拥有一支数量庞大且装备良好的陆军，美国缺乏在亚洲大陆同苏联进行地面作战的能力。因此，在朝鲜保持军队和军事基地并无战略价值，主张尽早从朝鲜撤军。国务院则从全球遏制苏联的政治战略利益出发，主张保持南朝鲜的独立和复兴，进而保持对苏联的压力。两者妥协的结果便是1948年2月出台的NSC8号文件。

这个文件确定了当时美国关于朝鲜政策的一些基本原则。一方面它确定驻朝美军于1948年12月31日前完成撤离任务，排除了美军继续驻留在南朝鲜或使南朝鲜的军事力量能够与北朝鲜进行抗衡的可能性；另一方面，它加大了对南朝鲜的政治、经济 and 军事援助。随着欧洲冷战风云的变幻、新中国的成立，美国确定了在朝鲜实行“有限遏制”的战略，

即政治军事的双重遏制。

政治遏制与军事遏制的二元分立是美国早期遏制战略的显著特点。其优点就是，在战略目标既定的前提下丰富了战略遏制的手段，增大了战略策略的回旋空间。然而其缺陷也很明显。

一方面，由于政治遏制与军事遏制在政策设计上的差异，容易将军事目标与政治目标之间的张力意外放大，增加了政策选择的机会成本。特别是朝鲜战争爆发后，当战局发生迅速变化的时候，军事力量的进退对政治目标造成了很大的震荡。在美军实现仁川登陆之后，美国政府开始盲目乐观，而这种盲目乐观恰好和战争初期的盲目悲观相映照。在朝鲜人民军迅猛推进、李承晚部队溃不成军的开始几天，美国政府和国会内部对战局的前景一片悲观，认为朝鲜必失无疑。及至仁川登陆成功，战局逆转，又被胜利冲昏头脑，在频频传来的捷报中无所作为地浪费了一个多月的时间，无视中国通过各种渠道传递的信息，全然没有意识到自己已经轻率地破坏了一项既定的对话政策，增加了决策的盲目性。

### 行政决策集团与战场 指挥系统之间的矛盾

在朝鲜战争之前，美军头脑中没有“有限战争”的概念。作为统帅的麦克阿瑟也是如此。尽管在二战中立下赫赫战功，但受时代所限，他无法理解原子弹的出现，以及冷战格局对战争形态带来的巨大改变，对西方传统的“武力是解决任何政治冲突最佳手段”的军事信条推崇备至。他认为既然开战就必须取得彻底胜利，为此可以而且必须采取一切手段。因此在美国军事干涉之初，麦克阿瑟就不断要求在朝鲜投入更多的兵力，甚至希望打一场全面战争。“有限战争”并非一个既定框架，而只是受政治所迫，尤其是战场条件以及核对抗背景下，不得已而为之的结果。即便中国屯兵鸭绿江而不选择出兵，也很难断定麦克阿瑟指挥下的“联合国军”会打一场仅限于朝鲜半岛的局部战争。显然，这种战争观念是与当时美国的亚太战略相冲突的。尽管美国行政决策集团默许了麦克阿瑟的北进战略，但前提是中苏不干预。但这却不是麦克阿瑟的前提。可以说，双方在战争理念上的矛盾直接导致了美国对中国出

兵朝鲜战略的误判。

随着中国出兵朝鲜和苏联的暗中支援，美国政府对战争限度立即进行界定。然而，麦克阿瑟在朝鲜半岛企图扩大战争的固执行为，以及他对美国政府及其政策直言不讳的批评，迫使杜鲁门不得不解除他的职务。麦克阿瑟的解职一方面是美国决策层内部矛盾发展的必然结果，另一方面也说明，麦克阿瑟作为一名职业军人，并不理解国家利益的获取不一定都要靠战争的全面胜利才能实现。当然，他更不理解在朝鲜实行有限战争不仅符合美国全球战略的需要，也是冷战背景下美国政府的理想选择。麦克阿瑟的解职，标志着“有限战争”成为美国主导朝鲜战争的既定战略，对战后美国战争观念产生了重大影响。

### 国内政治斗争的制约

二战结束不久，冷战的恐怖气氛又接踵而至。在激烈的共和和民主两党斗争中，孕育了一个全新而又强大的政治毒瘤，这就是麦卡锡主义。

麦卡锡主义对于美国的朝鲜战争的决策影响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在抨击杜鲁门政府的外交战略的同时，挤压了政府外交斡旋的空间，导致政府的对外决策的僵化；二是迫害政府里熟悉中国事务的人士。国务院里的中国问题专家几乎全部被清洗，艾奇逊首当其冲，承受了极大压力，甚至马歇尔也难免受到牵连。在战时和战后参与美国对华事务的欧文·拉铁摩尔、费正清、谢伟思、柯乐布，无一不受到打击排挤，先后离开对华决策圈子。这就导致政府决策层很难对中国事务尤其是中国关于美国不要越过三八线的警告作出正确的判断并予以回应。此后，以艾奇逊为首的国务院不得不时时谨言慎行，免遭共和党强硬派的攻击。作为总统的杜鲁门则更为重视国会的舆论倾向，尤其是对国家的立法和法案的通过起着决定性作用的各委员会主席的态度。

此外，在确定北进战略之前，迫于国内政治斗争的需要，杜鲁门需要前线的胜利服务于国会的中期选举。毋庸置疑，仁川登陆的胜利，使麦克阿瑟对决策层的影响达到顶峰。另一方面，战局的变化，也坚定了美国决策层对最终占领朝鲜半岛的信心，



原因是他们认为仁川之战后，苏中已经丧失军事干预的最好时机，苏联在联合国的软弱提议更加强了美国的判断，这最终致使由中国舆论和中国政府声明所释放出的中国不可能坐视不管的信号被忽略。基于利用战局的进展为国会选举服务的考虑，杜鲁门政府半遮半掩地下达了授权麦克阿瑟可以在三八线以北进行军事行动的命令。至此，美国决策层内部有关是否越过三八线的争论到此结束，军事胜利后的喜悦与自信最终战胜了决策集团所有人对越过三八线可能带来的灾难性后果的顾虑。

### 情报评估的失误

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各级情报系统随即开始对中国是否出兵朝鲜进行情报评估。

以中央情报局为核心的各个情报部门首先对苏联影响下中国出兵的可能性进行了评估，其次对中国参与战争的意图及能力进行了评估，最后以非常不负责任的态度来对待中国政府发出的公开警告。事实证明，美国的情报评估出现重大失误的原因就在于：一方面，美国错误地把中国出兵与否置于苏联全球战略的框架下进行情报评估。尽管中国和苏联结为同盟、苏联的意见在中国的对外决策中占一定的分量，但是，中国在战争爆发不久成立东北边防军直至被迫出兵朝鲜，期间的每一项重大举措都是出自对中国自身利益的慎重考虑。苏联方面的因素并未起到决定性的作用。另一方面，在对中国出兵的能力和意图进行单独评估的时候，美国坚持认为中共由于面临复杂而严重的国内问题，不可能单独出兵卷入朝鲜战争。中情局强调中国糟糕的国内问题对其介入朝鲜的负面影响似乎反衬出美国在军事等方面的优势地位。这种情报评估结果很大程度上是由其冷战思维决定的。美国决策层对情报的判断，没有站在中国政府主要担心国家安全的立场上来考虑问题，没有充分意识到在两大阵营尖锐对立的东亚国际紧张局势下，美国对朝鲜的军事干预对中国领导人固有的安全担忧所带来的严重影响。

战争一开始，美军远东司令部的情报部长查尔斯·威洛比就开始考虑中国参战的可能性，并认为中国也许会向北朝鲜人提供援助。当美国和南朝鲜

军队被压缩在釜山时，威洛比报告说，中共军队正源源不断地向华北调动，并指出如果中国军队参战的话，为了切断它的后方可能需要战略空军的支援。显然，远东司令部预料到此时中国出兵对美军的巨大威胁。到8月底，美军远东司令部的情报评估对中国出兵参战的能力进行了预测，指出中国在东北的兵力几乎达到25万人，如果中国出动增援部队，那么对于釜山周边阵地的任务已经很繁重且为数不多的美韩军队来说，无疑是一场灾难。不过，他们想象中的中国出兵必然导致的釜山灾难并没有成为现实。此后，随着美军仁川登陆的顺利实施，战场形势发生了逆转。在麦克阿瑟和威洛比等美军远东司令部要员看来，中国干涉的威胁似乎正由于中国不会出兵介入朝鲜战争而慢慢消失。这一评估结论深深地植根于麦克阿瑟的脑海中。因此，尽管中国政府不断公开发出警告，美国军事情报部门均置若罔闻。

随着美军越过三八线，越来越多的情报显示出中国出兵的迹象，从10月14日开始，美军远东司令部情报部门再次把中国出兵援朝的情报提升到最优先评估的位置，但这只是为了向杜鲁门总统明示中国不会出兵的论调，并没有改变麦克阿瑟中国不会出兵的看法。威洛比给政府提供的情报只是印证麦克阿瑟的判断而已。

当杜鲁门总统希望从麦克阿瑟那里得到“第一手的情报和判断”，从而搞清楚中国是否会真的“要在朝鲜进行干涉”时，双方于10月15日在太平洋上的威克岛举行了见面会。在会谈中，麦克阿瑟十分自负地向杜鲁门保证，中国干涉的可能性微乎其微。至此，美军情报部门基本丧失了情报判断的功能，他们的工作只是在裁剪情报，为麦克阿瑟的判断提供证据，以保证麦克阿瑟的军队抵达鸭绿江，结束其宣称的圣诞节攻势。

但是，这样的故事并没有因朝鲜战争的结束而停止。起初，是军方在玩情报的游戏，部分军官为了某种意图刻意操纵呈送给处于决策地位的高级军官和政府部门的情报。此后，则是高级文官操纵军事情报。为了实现国内的政治目标，政府会凭极有限的历史和彻底错误的情报去制定重大的外交决策，却根本不去考虑其后果。

（摘自《瞭望新闻周刊》2010年第52期）

# 中国在梁庄

梁 鸿

望着院子前方大片的断壁残垣，我第一次以有意识的眼光去观察村庄，居然惊讶地发现，以我家为起点，往前看，竟是一大片连绵的废墟——荒草和灌木覆盖了这一切。到处是巨大的断墙和残破的瓦砾，断墙角落是倒塌了一半的锅灶，上面还有落满灰尘与泥垢的锅盖、铁铲、锅盖，仿佛昭示着这里曾经有过的生机。有的房屋甚至连屋顶都没有了，只剩下几面墙撑着一个框架。

这里是谁家？树木与杂草遮掩着废墟，充满了凄凉与破败之感，仿佛一个巨大的坟墓。正对着我们家前面的是拐子常家。拐子常，一个好吃懒做的人，父亲和村里的人常常讲他，一家人吃面条，拐子常总是把筷子在锅里一搅，面条全串到自己碗里，老婆和一群孩子就只有喝汤。他家的房子一直是泥坯墙，一到下大雨的时候，那黄泥水就哗哗地流到我家的院子里。现在，只剩倒塌的一垒垒黄坯和一面墙壁了。再往前边，是拐子常的弟弟家，这一家家破人亡，女主人早年离家出走，男主人因偷树怕被逮住坐监狱而自杀，两个小孩儿也不知所终，房子早就倒塌了。

再前方是一个已经呈四十五度角倾斜的房屋，屋前有一个已经破损的抽水井，房屋门上居然还贴着崭新的对联。厨房倒塌了一半，里面的灶台还依稀可见，只不过，灶台上落满了长年累积的泥尘。厨房后面是一大堆散乱的红红绿绿的垃圾。这是谁家？我想不起来。

再往前，连父亲也似乎有些踌躇了，他必须得四处回顾，定定方位，才能说出是哪家的房子。我数了数，这一片绵延着的倒塌了的房屋有十五家，还没有算我们家这个摇摇欲坠的房屋。也就是说，至少有十五个家庭离开了他们原来的生活场地、原来的聚集场地，开始了新的生活。我和父亲在村庄里走了一圈，整个村庄至少有四处这样的大片废墟，

估计约有六十户左右人家。

这些废墟，和公路两旁高大、现代化的建筑是一个村庄吗？在煌煌的烈日之下，在知了不间断的噪鸣声中，我似乎有些迷惑了。我记忆中的村庄与眼前现实的村庄相比，虽然地理位置没变，但其精神的存在依据却变了。蓬勃的中国新时代，正是在这样的废墟中，建构了它的新躯体和新形象。

这些废墟，都是梁姓的几门。宅基地的划分，是依据家族的远近、人口的多少来进行分配的。一个梁姓，既是一个宗族、血缘场域，也是一个生活、文化场域。以一个点为圆心，梁姓人家居住在一起，随着家族人口的增加，地域逐步扩大。大年初一的时候，每家都会做一锅大烩菜，依照辈分的高低，依次相互交换，最后，每一家锅里都是一整个家族的饭菜。然后，才开始吃早饭。这一习俗是什么时候开始，为什么如此，老一辈也说不出一个所以然来。然而，有一个意思是肯定的，即要让这一个大家族团结一心，不分你我。因平时吵架而不说话的同族人，如果愿意和解，这也是最好的、不尴尬的和解时刻。

现在，这一村落文化已经变了。以姓氏为中心的村庄，变为以经济为中心的聚集地。有能力的沿路而居，不分姓氏，形成新的生活场、新的聚集群落。这些人家无疑是村庄的新贵，代表着财富、权力和面子，因为这里的地并不是谁想买就可以买到的。没有能力的，或勉强住在破烂的房子里，进行各种缝补式的修缮，或购买那些搬走的家庭的房子。毫无疑问，村庄的内部结构已经坍塌，依家族而居的生存模式也已经改变。

村落结构的变化，背后是中国传统文化结构的变化。农耕文化的结构方式在逐渐消亡，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混杂的状态，农业文明与工业文明在中国的乡村进行着博弈，它们力量的悬殊是显而易见的。

村庄，不再具有文化上的凝聚力，它只是一盘散沙，偶尔流落在一起，也会很快分开，不具有实际的文化功能。

我不想怀旧，但又怀念一个村庄的人就像一家人的感觉，虽然有争吵，有痛苦，有各种人情的麻烦；我不想认同现在的存在模式，但新的聚集地不正是新一代孩子成长的地方？在将来，不就是他们的故乡吗？或许，这正是他们的文化，他们世界的起点。

第一代打工者还愿意在村庄盖房子，因为那是他的家，在这里，显示自己的财富是确定自我价值的象征。但是，更年轻一代的乡村青年对乡村的感情非常淡薄，他们在家乡待的时间很短，往往初中毕业就出去打工。他们对未来的渴望更为开放，也正因为此，他们的命运与处境也更为尴尬。他们又将在哪里扎根呢？十几岁就离开家乡，在城市打工，但他们没有城市户口，没有任何社会保障，城市不是他们的家；而乡村对于他们来说，也是一个遥远的、没有情感的事物，他们在乡村也找不到归属感。新一代农民工这种双重的精神失落所产生的社会问题该怎样弥补和改变呢？

梁庄有大大小小六个坑塘。小学前边有一个大坑塘，中间有一条窄窄、弯曲的小路把它隔开，这是童年时代我们上小学的必经之路。一到夏天，暴雨过后，这条路便成为一条“魔鬼小道”，坑塘的水往往会漫过小路，只留下断断续续的残面。几个小伙伴手拉手，打着赤脚，走着走着，就会听见“扑通”落水的声音。好在坑塘边的坡很缓，水也并不深，都能顺利爬上来。如果遇到连绵的阴雨天气，那就糟糕了，村里到处都是泥泞，猪粪、鸡屎被泡得到处流，一些碎石头、碎砖块不知从哪儿钻出来，一不小心就硌得脚生疼。

小学前的坑塘仍然留有我美好的回忆。坑塘里种满了莲藕，一到夏天，青青的荷叶铺满整个坑塘，间或有粉红色的花高高地冒出来，随风摇曳。然后，慢慢变成莲蓬，里面的莲子圆圆的，鼓鼓的。等不及到成熟的时候，趁大人不注意，我们几个小伙伴会手拉手，连成一串，蹚进水里，去摘那最近的莲蓬。那莲子，咬一口，满嘴的清香。

还有就是那个有着青石桥的坑塘。青石桥把一个大的坑塘分为两个，左边坑塘进入到村庄里面，右边坑塘往外延伸到公路旁，旁边有一条较宽的土路，也从村子的另一边通向公路。土路往上，就是梁家的自留地，每家约有几分地，种些辣椒、茄子、萝卜等蔬菜自给。路和自留地中间有一棵野生的大桑葚树。每到春末夏初，紫红的桑葚结满一树，女生用土块、棍子打，桑葚落了下来，砸进土里，浸满了灰尘，根本无法吃。那些男孩儿却“蹭蹭”地爬上去，摘满一兜，一溜烟就跑。

左边的那个坑塘是全村最大的坑塘，几乎和小学前的坑塘连在了一起，中间就隔着一条大路，就是村庄的主路。或者，两个坑塘原本就是一起的，有了村庄，有了路，才使得它们彼此隔离。坑塘的前后，相隔着两个大麦场。靠村子里边的打麦场，既是打麦子、晒庄稼的地方，也是村里平时娱乐的地方。红白喜事放电影的、唱戏的、送葬报庙跪哭的，都在这个打麦场里进行。尤其是放电影的时候，那是全村人的节日，虽然电影通常是因为葬礼才有的。在那一刻，死亡与新生、哭泣与喜悦都是真实的，即使是刚才还在为葬礼而情不自禁地流泪，因死亡而害怕，到了电影场上，那神秘的未知世界马上赶走了全部的悲伤与害怕。下午一两点，我们这些小孩儿就搬着小凳子占位，相互换着回家吃饭。夜幕降临，白色的电影幕布拉开，神秘、尊严、光华立即笼罩着整个打麦场。电影开始了，全场安静，只有放映机“沙沙”的转动声和幕布上的奇异世界，所有的人都痴迷地看着。

夏天来临，我们去田地割麦子、拾麦子，傍晚的时候，一群小伙伴就在坑塘里凫水，大人和小孩、男人和女人各自分开。约定俗成，东边是男的，西边是女的，偶有坏小子，在水里乱蹿，经常被一群女人打得抱头鼠窜。

那时候，坑塘里还有鸭子在上面游来游去，有鱼在水中游动，有人在塘边洗衣服，还有鳝鱼在泥里钻来钻去。水浅的地方，甚至能看到水下面的石块和黄泥的颜色。听大人说，这坑塘下面都有泉眼，因此，坑塘才有自净功能。下雨涨水后，我们在坑塘里摸“螺壳”，这是一种大的贝壳类生物，打开后，

中间有一块很大的肉，炒一炒很好吃。

还有一个坑塘位于韩家和梁家连接的地方，中间一条路把坑塘左右分开，路地平面几乎和水面一样高，每到下雨之后，两个坑塘就连成了一个整体。它在村庄的内部，我家往右再走过去三家，梁光升家、梁万虎家、赵嫂家，就到了坑塘边。赵嫂家门口有一大块平地，也是这一片的饭场，吃饭的时候，大家都端着碗聚在这里，谈天说地，打情骂俏。在模糊的记忆中，汉玲嫂子和清明妈经常在这里聊天，虽然我并不明白她们在说什么，但从她们掩着嘴笑、红着脸的神情，也隐约明白，她们说的是那种话，因此，我们总是快快逃走，这是小女孩儿的一种本能。这么多年来，我一直有一种震惊，清明妈是木讷、老实的人，在家也不怎么说话，出去更是那种畏缩、谨慎的农村妇女，但是，当她们说着夫妻间的笑话，那飞扬的、羞涩的、暧昧的神情，有一种女人的美，有说不出的情趣。然而，有谁理解她的情趣呢？即使那个有着某种震惊的女孩子，也是这么多年后才突然有些明白。

少年时代的我，常常在这里洗衣服。那时，我一个人在青石板上蹲着，手里搓着我仅有的几件像样的衣服，看着水中的鸭鹅突然张开翅膀，身子挺直，从水的这一边迅疾地滑向另一边，在水面上留下一道笔直的白色划痕，非常优美……

必须承认，当有回忆加入的时候，当岁月、时间一起来塑造我的回忆时，我有“溢美”的嫌疑。但是，如果你看到今天村庄的坑塘，你就明白，这种“溢美”是因为它今天的“死亡”，彻底的“死亡”，毫无拯救的可能。

梁庄小学门前的坑塘已经成为一小洼死水了，那些黑色的藻类植物上面爬满了苍蝇，曾经淤泥里的莲藕（也许坑塘当年那么干净正是它的作用），还有那荷花和莲蓬都已经消失，变为了地基、房屋。

打麦场及打麦场上的坑塘也不见了。我们曾在那打麦场上翻筋斗、看电影，躲在麦秸堆里看小说，任凭家长喊得声嘶力竭也不回应。而如今一座座崭新的房屋矗立在坑塘的位置，不知填进了多少泥土。而昔日凫水游泳的宽阔水面，也已经只剩下一个可怜的小三角水域。

还有那旁边长着高大桑葚树的坑塘，如今已经成为一片黑色的淤流，静止的、死亡的、腐败的淤流，没有任何生机。如果你在这个村庄长大，怀着美好的记忆来寻找你童年生活的影子，看到这个坑塘，你一定会流泪的。一棵枯树倒在水面上，树干是黑色的，那水面上的树叶不知道是何时落上的，铺满了整个坑塘，树叶都是黑色的，彼此粘连，固定在水面上，没有任何流动。上面扔着塑料瓶、易拉罐、小孩的衣服，还有各种生活垃圾。一走近坑塘，就会被一种臭味熏得睁不开眼。

韩家那连成一片、曾经有鸭子飞过水面、在一个少年心中留下最初的美的痕迹的坑塘，现在，也成为了一个污水坑，潮湿，滋生着苍蝇和虫蚁，那曾经的深度也变为地基，上面矗立着房屋。那传说中坑塘的泉眼呢？自动消失了，还是被地面上的房屋给牢牢封住了？

黑色的淤流，黑色的死亡，黑色的气味，让人莫名地害怕，而在它的周边是一座座新房。我的族人在这里打水、呼吸、吃饭，经历着人生的悲欢离合。

这就是我的村庄。我故乡的人们就在这样的环境中生活，他们挣了一点钱，盖起了楼房，过起了幸福生活，然而，又是在怎样的黑色淤流之上建立起所谓的幸福生活呢？

面对这些，我又能指责谁呢？指责“我故乡的人们”如此破坏环境，如此不注重生态平衡，如此不重视自己的生存质量？似乎有些矫情。他们看到的是，他们的房屋越来越好，哪怕他们不得不夫妻、父子、母女常年分离；他们不再需要忍饥挨饿过日子。他们可以在春节时回到村里，坐在新房子里，招待亲朋好友，这仅有的几天，可以使他们忽略掉那一年的分离，忽视掉一年里的艰辛与眼泪。他们不知道自己是否应该还有别的路，历史似乎规定了他们的生存之路，他们以为这就是全部。他们忍受，并努力从中寻找幸福的感觉。

我又能说什么呢？当面对我的族人亲切和善的笑脸，当倾听他们的艰难人生和悲欢离合时，我又怎能告诉他们，这已死的、肮脏的坑塘，也应该是他们生活的一部分？

（摘自《中国在梁庄》2010年11月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

# 中国历史上的人口观

姜涛

中国传统人口观是与小农经济相适应的，在春秋战国时期就已形成，影响了中国两千多年，在现在仍在一定程度上发挥着作用。研究中国传统人口观的发展及变化，对于我们今天正确认识我国人口政策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华封三祝”——“多福、多寿、多男子”，最早可以追溯到传说中的唐尧时代，反映了古人祈求多子多孙的一种社会共识。

夏、商和西周三代，中国传统的人口观已开始萌芽。史书与考古发掘都表明：当时是以集中大批劳动力的大田集体劳作占统治地位。而从人自身的再生产(即种的繁衍)的角度看，三代之时以男性家长为中心的一夫一妻制已确立。这一时期考古发掘可以判定为夫妻关系的成年男女合葬墓，最常见的葬式是男子仰身直肢葬，女子侧身屈肢葬，且面向男子，表明男子开始居统治地位，女子降居于从属和被奴役地位。三代时的婚姻又有媵妾为补充。殷商王朝所实行的已是以纳妾为补充的一夫一妻制。周代直到春秋时诸侯仍可多次婚娶，而且多有陪媵。

中国传统时代以多生育男子，也即“田力”为美好的祝愿。这一祝愿可以追溯到传说中的唐尧之时。《庄子·天地》篇中，记有华之封人(守边人)与尧的对话，他祝愿尧长寿、富有、男孩多。这反映了当时人们祈求多子多孙的一种社会共识。“华封三祝”后被敷衍为“三多”——“多福、多寿、多男子”，并深刻地影响到后世人们的生育意愿。

春秋时期，各诸侯国为了扩充军备，增强实力，多以行政措施鼓励生育；人丁兴旺以后，孔子“有教无类”的教育思想受到重视。

春秋战国是中国历史上一个伟大变革的时代，也是中国传统人口观的形成期。中国社会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领域都经历了巨大的变化。传统时代，人们的生活资料主要是“食”和“衣”。由于铁器和牛耕，农田的粮食生产不再像以前那样需要劳师动众，而可由“匹夫耕之”；桑在西周时还是大田作物，而到春秋战国也已在房前屋后栽种，并可由“匹妇蚕之”。由牛郎和织女携手组成的个体小农家庭就此登上中国历史的舞台，成了中国传统时代生产和生活的基本单位。

兼具人口再生产和生活资料再生产两大职能的小农家庭，开始在春秋霸权的争夺中发挥出自己的功用。各诸

侯国为了扩充军备，增强实力，多以行政措施强制早婚，鼓励生育。春秋时期的第一个霸主齐桓公曾下令：“丈夫二十而室，妇人十五而嫁。”春秋末年，越王勾践在与吴国的战争中遭到惨败后，也下令早婚并奖励生育。

身为教育家的孔子，对于财富和人口增殖的见解与那些急功近利的统治者不同。他说：“我听说过：无论是诸侯或者大夫，不必着急财富不多，只须着急财富不均；不必着急人民太少，只须着急境内不安。若是财富平均，便无所谓贫穷；境内和平团结，便不会觉得人少；境内平安，便不会倾危。做到这样，远方的人还不归服，便再修仁义礼乐的政教来招致他们。他们来了，就得使他们安心。”战国时期的主流人口思想，可大体归结为“广土众民”；孟子的“不孝有三，无后为大”思想，深刻地影响到后世人们的婚姻观和生育意愿。

战国时期，中国人口有了空前的增长。与此相适应的是严密的户籍管理，尤其是被称为“上计”的统计制度在此期间开始形成。战国时期的主流人口思想，可大体归结为对“广土众民”的追求。一些政治家、思想家提出“徕民”的各种主张，以加强对人力资源的争夺，其中以秦国的商鞅最为突出。商鞅提出：地方狭小而民众多的，叫“民胜其地”，务必开垦荒地；地方广大而人民稀少的，叫“地胜其民”，必须招徕人口。《管子》则提出“三满”的命题：拥有广大土地而不加以开发利用，叫做“土满”；拥有众多人口而不能加以治理，叫做“人满”；拥有强大武装而不知道止息，叫做“武满”。如果听任“三满”的状况持续下去，国家就不成其为国家了。这是后世“人满”之说的源头。

秦汉以降，中国进入了大一统王朝相继更替的发展时期，春秋战国时代业已形成的传统人口观在这一漫长的历史时期中也有着一些新的发展变化。

汉代的人口观中，贾谊的“民本”思想是极为突出的。贾谊所生活的文帝时期，上距汉兴还不到四十年，对秦亡的教训记忆犹新。他大声疾呼：“前事之不忘，后事之师也”(不忘记以往的经验教训，作为以后行事的借鉴)，并写下了《过秦》等政论性文章。他竭力倡导“民本”的思想，指出：人民虽然低贱却不可以怠慢，虽然愚笨却不可以欺凌。自古至今，凡是与民为敌的，人民或迟或早

终将战胜他。他的结论是：人民是“万世之本”，决不可轻忽欺凌。

社会上，一些探讨养生与治病以及论述人之身体素质之类的论著也在汉代应时而生。大约最后成书于秦汉之间的《黄帝内经》，全面系统地探讨了人之生长发育以及疾病的机理，是中国传统医学的经典之作。贾谊在其所撰的《新书》中甚至专门列有《胎教篇》，阐述怀孕的母亲通过自己的行为对子女进行先天教育的重要意义。在西汉后期，已有人公开对早婚习俗提出质疑。宣帝时的谏臣王吉即认为：夫妇是人伦的大纲，人之寿命的长短也由此决定。世俗嫁娶太早，还不懂得如何做父母就已经有了孩子，教育感化不明，所以人民往往早夭。

生活在东汉末年的荀悦，亲身经历了黄巾起义的动乱和战后的萧条，由此得出了“古者人民盛矣，今也至寡”的印象。但他认为：人少也有人少的好处，因为“民寡则用易足，土广则物易生”。曾先后在南朝梁、北齐、北周和隋任职的颜之推，在成于隋初的《颜氏家训》一书中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向子弟讲述立身、治家、处世的道理。他深切体会到南北自然条件的差异对人的素质的影响，认为“九州之人，言语不同”，必须正音、正字，才有利于国家统一思想交流。他主张实行胎教，没有条件的，至少也要从婴儿期教起。他反对溺女婴，可又对当时北朝妇女行动不受束缚，甚至交结官府等等看不惯，主张妇女只可任家务，不可持家政，更不可参加社会活动。《颜氏家训》被认为是传统家训的楷模，对后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唐初，曾任太史令的傅奕对“数盈十万”的寺院僧尼“游手游食，易服以逃租赋”深恶痛绝，主张让这些僧尼还俗婚配，以使国家一下子就可多出十余万户人家来“产育男女”，这样既有利于人口的增殖，也有利于朝廷兵源的扩大。但另一位初唐人士王梵志却认为，如果听任人口增长，就会造成“人满”之患，因此竭力主张少生少养。在初唐人口水平还十分低下的情况下，王梵志的观点确实是很“另类”的了。

作为对人口管理方面的一个补偿，保甲制度于宋代兴起并逐步得到发展完善。而从人口统计的角度看，成丁之由男女兼指发展为专指男子，成丁的统计由男女兼备而演变为只统计男丁，也是始于宋代。北宋教育家、思想家李觏认为：四民之外的“冗者”，也即大量无职业或从事不正当职业的过剩人口以及过量的工商人口的存在，造成了平民生计的艰难；究其原因又是土地兼并使然。因此，他赞成“限田”，并要求取缔那些“冗者”，尤其是取缔僧尼道士。

值得注意的是，自宋代起婚龄较前代已有上升的趋

势。北宋还依唐开元令，规定“男年十五岁，女年十三岁，听嫁娶”；到了南宋嘉定年间已改为男年十六，女年十四。而实际婚龄，男多在二十岁左右，女多在十五到十九岁之间。

明代末年，人们则对“人满”之患有了较多的思考和忧虑。文学家冯梦龙说：如果每对夫妇总是生一男一女，永远没有增减，可以长久维持下去；倘若生二男二女，每一代就加一倍，只增不减，如何来养活他们？科学家徐光启根据宗室贵族人口的增长为依据，得出结论：所谓古代人民多，后世人民少是没有根据的。人的增长率，大抵每三十年增加一倍。如果没有大的战争，决不可能减少。

清代乾隆末年，已届耄耋之年的乾隆帝在一份上谕中表达了他对人口增长太多的忧虑：国家承蒙上天的眷佑，一百多年来太平无事，但人口也比往昔多了十余倍。以一人耕种而供十多人食用，生产的粮食已不可能像从前那样充裕了，再加上庐舍所占土地也在成倍增长，从事生产的人手少，消费粮食的人口多，这与百姓的生计很有关系。倘若再因年成好，随意浪费粮食，民情游惰，田亩荒芜，势必会有粮食不够吃，而经济窘迫的那一天。朕对此十分忧虑！

著名政论家、文学家洪亮吉也明确提出了关于人口增长带来危险的警告：治平的时间长了，天地不能不生人，而天地所以用来养人的资源是有限的；治平的时间长了，国家也不能不让人出生，而政府为人民所能采取的手段也是十分有限的。一人居住的地方，让十个人来住就已不够了，何况让百人来居住呢！一人的食物让十个人来吃也已不够了，何况让百人来吃呢！

活跃于道光年间的龚自珍、魏源等人，对中国之“生齿日益繁，气象日益隘”极为焦虑，对可能到来的大动乱也十分敏感。除“平均”之类古已有之的主张外，他们还主张对社会上大量存在的“不士、不农、不工、不商”的游惰人口实行自愿或强制性的迁徙。

曾亲眼目睹太平天国占领南京的文人汪士铎，把太平天国革命爆发的原因直截了当地归结为中国的“人多”，并提出了一系列超越甚至违背情理的减少人口的措施。他的中心论点是：“世乱之由：人多（女人多，故人多）。人多则穷（地不足养）。”因为“世上女人多，世乱之由也”，他所提出的减少人口的措施中，除了对“乱民”的屠杀政策外，更多的是针对妇女的，如推广溺女之法，施送断胎冷药，严再嫁之律，立童贞女院，等等。中国传统时代的人口观至此遭到了颠覆，终于发生了从“人多为福”到“人多则穷”的转变。

（摘自2010年11月22日《北京日报》）

## “十二五”我国人均 GNI 进入中高收入国家行列

中国社会科学院最近发布的 2011 年《经济蓝皮书》提出,从目前情况看,“十二五”时期中国经济增长速度可能会呈现几个主要特征,其中之一就是人均国民总收入(人均 GNI)开始进入中高收入国家行列,仍处于较快发展时期。

世界银行按照人均国民总收入将世界经济体划分为四组:低收入组、中低收入组、中高收入组和高收入组。1999 年以来,无论是从世界银行的最初统计看,还是从最后修订看,中国一直处于中低收入组行列。2009 年,根据世界银行公布的数据,中国人均国民总收入为 3620 美元。预计在“十二五”时期,中国人均国民总收入将突破 4500 美元,届时将开始进入中高收入组。

(摘自 2010 年 12 月 13 日《中国人口报》)

## 中国公民科学素养水平 落后日本欧盟 20 年

2010 年 11 月 25 日,中国科协发布第八次中国公民科学素养调查结果。结果表明,2010 年中国具备基本科学素养的公民比例为 3.27%。尽管这一比例比 2007 年的 2.25% 提高了 1.02 个百分点,但这个水平只相当日本、加拿大和欧盟等主要发达国家和地区 20 世纪 80 年代末 90 年代初的水平。

据《全民科学素质纲要》及历次调查所采用的公民科学素养测度指标,本次调查从三个方面定量测度我国公民的科学素养水平:一是对了解必要的科学知识的测度;二是对掌握基本的科学方法的测度;三是对崇尚科学精神程度的测度。一个被调查

者只有同时通过三个方面的测度,才被认定为具备基本的科学素养。经综合测算,2010 年我国具备基本科学素养的公民比例达到了 3.27%。其中,了解必要的科学知识的公民比例为 14.67%,掌握基本的科学方法的公民比例为 9.75%,崇尚科学精神的公民比例为 64.94%。

调查同时表明,城镇劳动者和农民的科学素养水平提升速度较快。城镇劳动者具备基本科学素养的比例从 2005 年的 2.37% 提高到 2010 年的 4.79%;农民具备基本科学素养的比例从 2005 年的 0.72% 提高到 2010 年的 1.51%。城镇劳动者和农民科学素养的提升对我国公民科学素质的整体提高起到了重要作用。

(摘自 2010 年 11 月 30 日《中国信息报》)

## 财政部下拨 38.89 亿元 完善校园安保

中央财政最近下拨专项资金 38.89 亿元,对全国义务教育阶段学校的校园安保设备设施给予一次性补助,专项用于支持学校(含民办学校)配置安保、防火等设备设施以及加固改造校园围墙、校门等方面支出。财政部、教育部表示,这一专项资金旨在贯彻落实《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 年)》精神,进一步提高全国义务教育阶段学校安保能力。两部门提出,中央财政补助资金必须专项用于支持义务教育阶段学校配置必要的安保设备设施,不得用于人员经费和偿还债务等支出。各省级财政部门要结合本地区实际,在合理安排中央补助资金的基础上,积极调整财政支出结构,统筹自有财力支持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校园安保能力建设,并优先向周边环境复杂的学校、农村中小学等薄弱学校倾斜。

(摘自 2010 年 12 月 22 日《中国教育报》)

# 政府应积极、理性、依法应对网络舆情

## ——“网络舆情与政府作为”理论研讨会综述

随着互联网的快速发展，网络舆情已经成为具有巨大影响力的社会力量，渗透到社会发展与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为进一步探讨网络舆情发展的特点和规律，以及政府面对网络舆情该如何作为，由中共中央党校中国干部学习网主办、中电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协办的“网络舆情与政府作为”理论研讨会，于2010年12月19日，在中共中央党校举行。

中共中央党校图书馆馆长、《党政干部参考》及中国干部学习网总编陈高桐、中电传媒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白俭成主持会议。

陈高桐指出，网络舆情是群众思想、群众情绪、群众观点的反映。要正确应对网络舆情，首先要有群众观点。群众观点是马克思主义最基本的观点，用这个观点来看待历史和现实，不仅要承认历史是人民群众创造的，而且要承认我们所经历的现实过程也是人民群众创造的，人民群众是承载社会的主体，是主导社会进步的主体。作为社会物质基础的财富是人民群众创造的，所有管理社会的大大小小的权力是人民赋予的。我们必须先有这样的认识，才会主动接近人民群众的思想，主动了解民意，主动把人民群众想说的话、想表达的愿望正确反映出来。离开了这个基本观点，我们在面对网络舆情时就很难有正确作为。希望通过举办此次研讨会，引导网络舆情良性发展，同时也为政府面对网络舆情力量应该如何作为提供一些参考和帮助。

陆俊华（国务院应急办主任）认为，互联网的发展对人的思想观念、社会管理及国家安全等都产生很大的影响，也给政府行政方式与方法提出了很高的要求。互联网传播具有自由度大、速度快、覆盖面、影响面广及社会关注度特别高等特点，要求我们的干部不仅要懂得运用，更要善于运用。网络舆情是国家应急部门了解事件发生情况、反映民意的重要渠道，也是我们及时掌握信息，引导舆论，处置突发事件的主要平台。

张毅君（新闻出版总署科技与数字出版司司长）认为，目前微博在我国的发展还不够成熟，但其对网络舆情的影响力呈上升趋势，而且控制难度大。政府部门首先要尽快出台网络信息管理的法律法规，做到依法管理；其次，要加强舆论监督，疏导社会情绪；第三，培养意见领袖，增强正面声音。

严书翰（中央党校科学社会主义教研部原主任）认为，当今社会是网络社会与现实社会的统一，网络社会是现实社会的反映，是虚拟世界的反映。如果执政党未在网

社会里取得主导地位，则最终会在现实社会中失去领导地位。随着社会的快速发展，科技的日新月异，很多领导，特别是地方领导，都感到本领恐慌。其中最大的恐慌就是面对网络舆情该怎么处置。因此，从领导干部到参与网络建设的同志，都要熟悉舆情业务，增强驾驭网络舆情的本领。要改革现行的互联网管理体制，改变多头管理的现状，整合力量形成合力。

官建文（人民网常务副总裁）认为，舆情热点与社会矛盾和社会的关注点紧密相关，社会矛盾的焦点和社会积怨，很容易成为网络热点。因此，要做好各部门之间的互通工作，包括感情沟通、信息畅通、言语连通等。

卓泽渊（中央党校研究生院院长）认为，网络舆情对政府的执政行为提出了挑战，政府的民主建设和法制建设成为被检验的课题，如何真正地用民主和法制迎接这一持久而广泛的检验，将是我们政府不可推卸的责任。政府在网络舆情上的作为可以用三个词概括：积极、理性、依法。积极是指政府回应民众要求和呼声的态度；理性则要求政府的回应合乎社会发展，合乎百姓需求，合乎法律制度的规定；依法就是要保证各种措施和行为依法有据。

方楠（国务院新闻办公室第九局副局长）认为，及时掌握舆情并进行适当调控，有助于提高我们的执政服务水平。

韩保江（中央党校经济学教研部副主任）认为，政府在应对舆情时，要充分考虑民众的社会心理特点，这样有助于把握网络舆情的发展规律，有效地处置舆情。

石慧琼（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吐鲁番地区地委委员、宣传部长）认为，要大力提高政府管理和运用网络的能力，加大队伍建设，包括技术保障队伍、舆情分析、研究队伍和舆情管理队伍的建设。另外，要根据不同情况，加强少数民族网站建设，提升主流舆论在少数民族地区的影响力。

温岩（国务院新闻办第九局舆情组处长）认为，我国正处于经济社会发展的转型期，各种矛盾频发，网络声音的放大效应尤为突出。而以Twitter为主的微博机制，是目前网络舆情监管工作的难点。所以，提高对舆情信息的研判能力非常重要。

王喆（首都之窗技术总监）认为，网络舆情是有规律可循的，可通过与商业公司合作等方式总结出网络舆情的特点，并建议国家建立互联网用户管理中心，更好地引导和控制舆论走向。

宋占军（人民日报海外版海外联络与合作部主任）认为，传统媒体要加速追赶网络化，实现报网融合，达到共同发展。

（执笔：阎荣舟 聂金菊）



# 论 点 摘 编

## 1.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破解总需求结构矛盾与国民收入分配失衡的难题

刘伟、蔡志洲在《经济学动态》2010年第7期撰文认为，近10年来，我国国民收入分配总体结构发生了变化，非金融企业部门、政府部门在全部可支配收入中所占的比重在上升，而住户部门所占比重在下降。分配格局的变化导致国内总需求结构变化。非金融企业机构、金融机构和政府部门可支配收入占国民可支配收入比重的增加以及住户部门储蓄率的增加，导致整个国民经济的高储蓄率和高投资率。同时，国际收支不平衡也使最终需求中最终消费所占的比率降低。要解决以上矛盾，基本途径是促进总量为主带动结构调整的经济发展模式转向以优化结构带动总量扩张的经济发展模式。

## 2. 深化改革，破除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体制性障碍

高尚全12月27日在《北京日报》撰文指出，“十二五”期间经济发展方式转变，要求凝聚改革共识，尊重和鼓励改革首创精神，通过立法，将改革纳入制度化、法制化轨道，建立改革进程评估机制，营造利于改革的社会环境，突破发展的体制性障碍，推动以完善生产要素市场为重点的市场化改革、以政府转型为目标的行政体制改革、以满足公共需求为导向的社会体制改革和以发展低碳经济为目标的综合改革。

## 3. 认清形势，着力解决八大问题

曹立在《理论视野》2010年第10期撰文指出，目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存在八大问题，如何解决这八个问题是“十二五”的重要任务，更是完成“十二五”面临的巨大挑战。这八大问题是：经济高速增长，但结构严重失衡；蛋糕做大了，但分配不公平；完成了工业产品的数量积累，但国际竞争力不强；民生大幅度改善，但公共服务发展滞后；城市化率大幅度提高，但二元结构矛盾突出；节能减排成绩显著，但生态文明建设压力大；市场经济体制日趋完善，但改革任务依然艰巨；国际竞争的硬实力增强，但软实力有

待提升。

## 4. 确立目标，着力推进公共服务均等化

迟福林、殷仲仪在《城市观察》2010年第5期撰文指出，着力推进公共服务均等化是我国为适应公共需求变化所作出的重大战略决策。“十二五”期间应当以城乡、区域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和一体化为核心目标，以农民工市民化为重要突破口，对接制度，调整投入结构，逐步建立起公共教育服务、公共医疗服务、基本社会保障、公共就业服务和城乡基本住房保障服务均等化的体制机制，改变目前公共服务在城乡、区域和群体之间差距过大、财政投入不足的局面。

## 5. “十二五”时期“三农”政策基本走向

韩俊在《中国经济报告》2010年第6期撰文分析到，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我国农业和农村发展面临重要的历史机遇，但农业基础薄弱、农村发展滞后、农民增收困难的局面仍然没有得到根本改变，城乡差距仍在扩大，城乡二元结构造成的矛盾依然突出。“十二五”时期，要从巩固完善农村基本经济社会制度入手，加大投入，夯实农业农村发展基础，提升农业发展的国际竞争力，增加农民收入，提高农村公共服务能力和城镇化水平，提高农民生活水平，建设美好乡村家园。

## 6. 确立目标，推进“十二五”农村综合改革

党国英在《中国农村经济》2010年第8期撰文指出，改革的核心目标是建立一种促进效率、确保公平、维护稳定的社会经济运行机制。按这个要求，“十二五”农村改革的目标应集中于三个方面：一是促进农民变为“城外市民”，以解决公平问题；二是促进中国农业转变为可获得平均利润和平均工资的一个竞争性行业，以解决效率问题；三是促进中国农村变为专业农户生产区和生活区，以解决农村社会稳定问题。为实现这些目标，“十二五”时期应突出农村微观经济组织改革、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城乡一体化配套改革和国家支农体制改革。

(本刊编辑部阎荣舟摘编)

# 品泰山

刘功业

泰山，是我童年里的泰山。我的家乡，隔着一座颜山，隔着一座苗山，还有一座高耸险峻的青石关。路上，有蒲松龄背了书袋的步履。有相向而流的孝妇河的源泉。有泰山行宫和常年的香火。一条向西南的大路，弯弯曲曲，就连接了泰山和童年的许多梦幻。

泰山，是一个沉甸甸的思念。高中毕业后下乡插队，我去沂蒙山里当了三年的石匠。劳累而辛酸。无暇去登泰山，却常奢望泰山。连连绵绵的峰峦里，与泰山既很近又很远。在济南读大学的时候，千佛山到泰山的距离，就是一个星期天的距离。也是积攒了很久、节省了很久的饭票菜票的距离。星期六一下课就出发，赶到泰安天色已晚。从岱庙一路望去，一路走去，是一夜的黑，是满心的明。等那任风任雨任云任雾，依然故我地升起的太阳。看到了日出，是一种幸运。没有看到，也没有失望。

泰山，是一种文化。厚重，而又韵味无穷。直直的一条大道，看似通畅，平坦地铺到天上，软软地垂向人间。又是崎岖的一条山路。汗水和艰辛里，每一步，都是思索和考验。越读，才越觉得深厚。在熹微了很久的归途上，在最疲惫的时候，在即使拄了拐杖，两腿也不知往哪里迈的时候，山上和路旁的那些历代文人的诗词墨刻，一遍又一遍地吸引你的注意，启迪你的心智，越读越觉得新鲜。

泰山，是一种人生的信仰。泰山的永恒，连着永恒的生命，也连着永恒的信念，永恒的感动。

记得陡峭的山路上，曾见到裹了小脚的古稀老太，早已走不动了路，却手拿一玉米皮做的蒲团，用屁股挪了又挪，一磴一磴的石阶，竟渐次低了去，远了去，上到中天门，登上南天门，入了云海，见了日出，就有了满脸的笑容，满心的灿烂。问她，远在几百里外，竟是每年都要来的，小时跟了父母，跑跑跳跳。嫁了随着夫君，相依相随。老了伴了岁月，走走停停。锲而不舍。见了泰山，仍然在海一样的云里鲜活，仍然能驮着太阳像大鸟一样地飞

着，就没有了苦难，没有了孤独，就没有了含辛茹苦中的苦涩，就有了日日劳作的劲头和儿女亲情的甜蜜。

泰山像母亲。看到她，就会想到我的更多品尝了生活的苦难而更少享受了生活的快乐的母亲。想到母亲病中的坚韧和隐忍。依在泰山的怀抱里，能感受中国女性身上独有的柔弱而刚强的品格，温情和广阔的胸襟。女性，母性，她们，在这片土地上，就是一个伟大的词语。

泰山像父亲。在起起伏伏的土地上高大而雄壮，在平平淡淡的辽阔中威武而刚强。向往泰山，能给你一种理想。攀登泰山，能给你一种力量。思念泰山，能给你一种心境。陪伴泰山，能给你一种豪放。

品味泰山，其实就是接受泰山的影响，感受泰山的滋养。就像日月星辰，就像山泉松涛，就像云雾烟雨，不知不觉，潜移默化，便强壮了筋骨，而又融进了血脉。泰山的儿女，走到天边，走到海外，都有了一种品格的标志，一种情怀的默契，一种灵犀的相通。

泰山，是真正的风月无边。品味泰山，是行走中的品味，是攀登中的功课。只有走在路上，只有站到山上，不管风霜，不管雨雪。只有反复诵读，不仅用口，更要用心。无论我们会遇到多少艰难曲折，每天都是太阳的节日，每天都如婴儿诞生般喷薄而出。瞬息而至的辉煌，穿过黑暗期待，从天庭铺满人间，铺满世界，就像我们永远生生不息的希望。

所以，泰山上的人流，永远不断。登泰山是每天的节日，永远的节日。所以，泰山上的诗画文章不绝。风中还是雨中，温暖还是严寒。那是一种永远的膜拜，那是一种永远的向往。只要生命存在，对泰山的品味，就是永远的乡思，永远的慰藉，也是永远不舍的旅途。